炎黄春秋

第 2 期
2011年

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

亲历邓小平南巡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胡耀邦为何要反封建专制主义

宫市模型：重读《卖炭翁》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11/2(总第227期)

目 录

求实篇

1 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 ……………蔡定剑(遗稿)

9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韩 钢

亲历记

19 亲历邓小平南巡 ……………………………李罗力

24 我的右派经历与反思 ……江 平 口述 陈夏红 整理

30《刘少奇选集》文稿的遭遇 ……………………马懋如

33 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 ………………白而强

39 亲历大跃进中的湖北教育革命

……………………刘绪贻 口述 宋雯 赵晓悦 整理

往事录

43 彭德怀和毛泽东对民主的不同看法 …………何 定

49 北平和平解放幕后的苏联身影 ………………徐元宫

54 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 …………叶永和 蒋燕燕

沉思录

57 胡耀邦为何要反封建专制主义 ………………胡德平

59 1955年肃反扩大化的教训 ……………………李维民

62 漫谈"中产阶级"……………………………周有光

人物志

64 邓子恢和六十年代的包产到户试验 …………许人俊

72 刘瑞龙指挥百万"民工大军"…………………庄 重

故纸堆

75 胡乔木1956～1957年的"右派言论" ………李慎之

争鸣录

76 范文澜没有"史谏"大跃进 ………朱瑞熙 王 灿

忏悔录

79 我对不起老师们 ……………………………周继能

古今谈

83 宫市模型：重读《卖炭翁》……………………吴 思

品书斋

87 读《牛汉自述》………………………………管士光

海外事

91 尼尔斯·卡莱比及其功能社会主义 …………高 锋

编读窗

56 来信摘登 ……………………………………祝江白 等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宏遵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 普 李一氓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保育钧
郭道晖 资中筠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副 社 长：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徐庆全
社 长 助 理：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吴 思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刊网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发行部邮箱：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68525374 办公室：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8.00元

本期：终审 吴 思 执行主编 洪振快 校对 英 进

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

○ 蔡定剑 （遗稿）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样，则需要回顾、总结，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我是30年的经历者，同时也是参与者。由于工作机会使我可以接触一些高层信息。1988年、1989年时，我刚到全国人大不久，也参与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后来我被抽调到十三大报告起草组下面的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参与了部分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之后我也参与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包括全国人大一些制度、宪法的修改。我们曾经试图在深圳搞政治体制改革，比如深圳特区立法权的授予，和深圳人大的建立。所以，我说我是30年的参与者、经历者。

一、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

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

1978年是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在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反复强调，从文化大革命得出的经验教训就是要发展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话至今仍然是经典。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些年来支撑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这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确立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没有消失的意义。

此后，我们马上就进入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建设。1979年修宪，县和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将县一级人大代表改为直选。198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政治体制的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克服这些现象，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1981年有一部名叫《苦恋》的电影，这是一个军队作家写的电影，写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华侨画家，他很爱国，但是这个电影的背后问了一句，你爱这个国家，但是国家爱你吗？因为这层意思，这个电影被认为是灰暗、低调的电影，没有上映。这是当时带有文化、政治性的事件。

1978～1982年，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整个社会焕发出一种解放思想的活力，这是一个要求民主自由、政治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的时代。在这个时期，进行了30年来第一次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制度性的，不是思想观念性的。我们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最后总结在宪法里面的我认为有三条：

第一，在选举制度方面实行了差额选举。从人大代表到国家领导人副职都实行差额选举，地方的和中央的正职在法律上也实行了差额选举。还实行了代表跟选民可以联名提名的制度，过去基本上是组织提名。北大和其他一些高校出现学生主动站出来竞选人大代表。北大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竞选人物，在图书馆和饭堂前面有一些演讲，赢得一些掌声。

第二，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增强人大常委会的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成为一个主要的立法机关，而且这个立法权在某种程度上比代表大会的还要大。全国人大制定民事、刑事、国家制度和重要经济方面的基本法律，除此之外的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部分修改全国人大的

法律。二，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我们知道专门委员会对议会的作用，《国会政体》的作者威尔逊有一句话，专门委员会是行政中的国会，没有专门委员会议会不可以做事。

第三，扩大了地方的自治权，设置了常委会。1982 年宪法里很重要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地方建立了一个常设的议会。在西方很多单一制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它有立法权，这个权力是很大的，只要跟国家的宪法、法律不相抵触，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可以制定地方性法律。国家没有列的也可以做。当然我们习惯于中央集权的思维方式，总是看到上面领导有什么指示才立法，这不是宪法制度的安排。其实我们地方立法权比英国、日本、法国单一制的国家的自治权力要大得多。我去英国专门研究过英国地方自治的问题，英国到 1999 年才开始权力下放，原来地方没有议会，没有立法权。

第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解决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就解决了领导人权力转移的问题。1976 年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国家怎么办啊？那年很多人排队买黑纱，整个国家都一片黯淡。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权力交接制度，我们不可能有这 30 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成果，是 1982 年宪法固定和总结下来的。

接下来，由于自由、开放了，有些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包括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人的本性的生活方式，比如穿喇叭裤、跳舞，聚集在一块，这些事情都出现了，包括一些社会治安的问题。1983 年 9 月 2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我们把这个叫做严打。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两种思想在交锋。1983 年 4 月份，发生了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争论。周扬是当时的中宣部顾问，他在中央党校做了“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报告，批评检讨我们过去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太“左”了，后来遭到党内另外一些同志的反对。1984 年，胡乔木针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做了一个报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在 1986 年 9 月 3 日、13 日、29 日和 11 月 9 日，邓小平连续四次谈政治体制改革。他先后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内容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要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是精简机构。1986 年进一步提出，我们要讲民主，但不要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

以上是第一阶段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其背景是反思我们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民主，要法制，要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断的问题，要解决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改革的动机就是要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不应该再有文化大革命那种乱批人、乱斗人、乱抓人的现象，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改革的特点是以传统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观念的变革。比如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实际上是在哲学层面上谈人性、人道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挖掘人道主义的因素，用这样一些东西来启蒙社会。

在前十年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央最高领导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学生、社会、知识分子也在讲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两种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有不一样的内涵。在知识分子、学生看来，更多的是自由、民主、竞选这些东西。但在政治领导人层面上，主要是在我们现有制度下，怎么能够发扬一些民主。人文知识分子强调的观念上的头脑风暴的改革，与权力驱动的改革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没有对权力的要求，只知道民主是好的，西方的一些东西是好的，学生也不了解西方。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在发动、推动，这次改革成功体现在 1982 年宪法里面。改革的普遍共识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

1989 年至今，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

1989 年以后有几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

治上，中国都处于徘徊的状态。1992 年，邓小平南巡打破了这种局面，一下子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到了最前沿，市场经济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期间发生了苏联东欧解体的事件，对中国老百姓，特别是领导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是我们下一场改革很重要的背景。在东欧解体以后，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搞西方的民主，要吸取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我们什么事都干不成；在经济上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发展政策；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在国际上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

蔡定剑先生为著名宪政学者，2010 年 11 月 22 日逝世，终年 54 岁。图为蔡定剑先生在一次学术讲座中。

第二阶段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在第二阶段，每一次十几大（党代会）的报告文件里面也谈政治体制改革，但实质上我们没有看到制度上的安排。整个社会埋头搞经济建设，带来了财富的增加，但我们的价值体系基本上是崩溃的，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瓦解。我们迎来了世界资本，我们产生了一代富豪，但是我们增加了贫富差距和代沟。我们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赶超西方强国的梦想，2008 年的奥运会给中国人长了民族骨气。同时我们也有非常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好的方面，也会伤害一些东西。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清末的义和团就是这样，它打着爱国的旗号，不分青红皂白见洋人就杀，给国家制造了麻烦。民族主义是个双刃剑，不能说因为“爱国”所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

改革带来了政治职能的转变，但是政府本身的利益也在增加，政府本身也是利益主体，跟社会争利益。政府有更强的能力，一方面我们说市场经济改革要转变政府的职能，要缩小、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是由于经济能力和其他管理制度的变革，实际上政府的能力在提升。我们产生了一个富有阶层，但是我们有些富有阶层不太需要改革。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向何方呢？我认为，过去那场靠观念支撑的改革已经死亡了，已经过去了，我们过去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热衷于改革，但是他们没有利益的支撑，是观念性的改革。但是我认为新的改革正在萌生，就是市场经济土壤中产生的，来自社会层面的极力要求的政治改革正在萌生。

总结第二阶段，1989 年以后，（在钱与权结合推动下的） 经济体制改革在 1992 年后单兵突进。张五常先生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县级的竞争，我写了文章批评，我认为最大的东西就是权与钱的结合。地方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用各种政策、优惠办法来创造投资的环境，这个环境不是法律的环境，也不是民主的环境，是一种资源的环境，以劳动力环境、资源、土地为代价的环境。这是权力与资本的蜜月期。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转向。知识分子与政府的联盟出现裂痕，传统人文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一部分强调经济效率的经济学家登上舞台。在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传统的、新中国建立的道德体系和信念也在消失。随着经济改革取得成果，部分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在这期间一些与政治改革有关的行政、司法改革都无果而终，如基层民主自治、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司法改革、公车改革、反腐败等，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渐式微。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了，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却成了一个问题。

二、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判断

我认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是处于一个停滞萎缩的状态。为什么这样说呢？前面已经说到了一个大的背景，还因为高层对政治改革的看法跟当年不一样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搞改革，结果苏联解体了。现在高层最担心的是这个，所以话语也变化了。这里我就简单地引用一下过去领导人的讲话，看看从中能看到什么信息。邓小平在1986年9月3日、13日、29日和11月9日，四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本来是在反自由化很热的时候，邓小平在1986年一下子热衷于谈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当时也觉得不是很好理解，他当时一直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要向前走一步，就会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继续向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们要知道，那一代人，特别是邓小平，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国家富强起来。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达到国家富强的一种手段，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共识。

那么他说到改革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要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到第一位。第二，要权力下放，解决中央跟地方的关系。第三，是精简机构，这跟权力下放有关系，就是把中央政府的权力放下去。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些非常清楚，所以当时改革是以改变党的领导方式为主。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主要谈的是党政分开。当时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党政分开是不是有点儿太保守。那时我在全国人大工作，我觉得党政分开不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党与人大分开，而这才是关键的问题。但是就连党政分开的改革都没有走下去。后来十六大我们也谈政治体制改革，话语是前进了，但内容很少。

十六大谈政治建设，改革主要任务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制度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比如它说，要发展民主，健全民主制度，是改革的内容。具体的是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力。比如说，每次改革都会讲到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在人大工作，很关注这个，到底讲了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没有？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要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意志，就比较空泛。所以我们每次都怀着期望，一看内容又不知道做什么。比如讲要改革党的领导，改变党的执政方式，但具体内容做什么？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的程序使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人选成为国家机关、领导机关的领导人，并对他们实行监督，都是一些比较原则性的东西，这是十六大谈政治改革。

十七大也谈政治改革，也说扩大民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要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执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发展基层民主，落实依法治国方针，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保证政府在阳光下运行，建立问责制。看下来，仔细琢磨这个东西的话，有实质性内容的基本上还是一些政府机构的改革，比如说要实行阳光化，要建立问责制，服务型政府等等。这个是比较实的。

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在2004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就比较全面地谈了政治体制改革，他说："社会主义只有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才能使自己发展"。谈到具体的改革的时候，他说："从我上任的那一天起，就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目标。第一，就是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包括集体决策的制度、专家咨询的制度、社会公示和公证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第二，我们政府还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只有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才能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我们要使政府依法行政,做到合理、合法,程序完备、公开公正、便民高效、诚实守信、责权统一。第三,我们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是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全面的一个观点。他这个改革基本上还是在民主决策机制层面上,主要是政府行政改革。所以温总理上任以后,依法行政纲要的推行是很重要的目标,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实行政府的转型等等,所以温总理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多的是政府改革,而不是在政治的层面上、党的层面上改革。现在,基本上改革还是处于政府的层面上,这是我的基本看法。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前面说的大的背景没有解决,改革会不会带来不稳定问题,会不会带来国家解体等等,稳定问题是最重要的顾虑。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阻力,二是既得利益阻力。

思想的阻力,首先是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中国经济成功了还要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已经证明成功了,中国的道路已经创建了,所以中国的发展道路不需要民主,把经济搞好了,也可以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社会了?因此,到底需要不需要搞政治改革,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

中国经济改革 30 年的成就,被有些人用来证明中国可以不搞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的成就,竟成为不要搞民主的一个理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没错,经济发展不一定需要民主,经济发展有很多的因素。我觉得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观点是对的。他讲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四个很重要的基本要素:第一个是制度资本,法制、民主、管理等制度资本。第二个是自然资源,比如石油。第三个是劳动力资本。劳动力充裕,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也可以创造价值,很大程度上我们就靠这个。第四个是土地辽阔,土地是资源,澳大利亚、加拿大人们也不怎么勤快,也挺富裕的。任何一个要素特别强,都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资本的要素是一个软的东西,不是直接产生 GDP 的,对经济的增长能起到一个持续的作用。比如:新加坡,香港,就是所谓的制度资本比较雄厚,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也能够发展,但是像美国这样的四个要素都具备了,就谁也搞不过。

我们过去 30 年的经济发展靠什么?我们经济发展得怎么样?我们靠的是自然资源,不惜成本、代价地使用我们的资源,把河流污染了,很多土地污染了。我们靠劳动力资源发展,丰富的劳动力、便宜的劳动力,创造很便宜的价值,中国的产品走遍了世界。

我们经济成功了,我们能维持吗?有可持续性吗?我们都知道原来的西方国家搞低端的产业,现在不搞了,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发展了几十年搞不下去,就转移到中国来,中国二三十年还想维持这种生产模式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制度转型,这就需要我们政治、法律环境等软制度提高。我们要提高四个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制度资本要素。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没有土地,也没有自然资源,靠什么发展呢?为什么它们的发展能持续呢?中国香港、日本、韩国靠的都是法制制度的东西。没有这种东西我们能再这样发展二三十年?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历史的经验也充分证明,没有民主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民主制度的大国是不可以成为强国的。30 年时间,只要统治者励精图治,不打仗,让人民休养生息,完全可以创造一时的经济繁荣,古代一朝君王在任时就可以创造所谓的盛世。我国近代也有过。西方国家在战后,东亚四小龙都是用 30 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了经济繁荣。世界历史上,有过不少的国家经济繁荣的大国崛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那些民主制度没有过关的国家,崛起了又趴下了。可见,只有建立起民主的制度并保障人权的国家,经济的繁荣才能持续下来。托克维尔曾说:“在行政集权的一定时代和一定的地区,可能把一个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结集起来迎来战争的凯旋,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的繁荣。我相信民主政府经过时间的推移一定能显示它的实力,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由共和

政府管理一个世纪,那么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它一定会比相邻的专制国家更富有,更加人丁兴旺,更加繁荣。”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不少繁荣和盛世,汉代唐代、清代都有盛世,但都在历史的硝烟中灰飞烟灭。晚清洋务运动中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工业、交通通讯和国防的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但是,由于政治民主化制度没有过关,经济改革的成就毁于一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发展方向大体是并行的,德国民主化落后于工业化,国内危机导致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日本也有相似的情况。历史告诉我们,在威权国家,经过一个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如果不及时进行民主化转型,经济发展势头将很难长期保持下去。

我们既然意识到这个道理,就应该尽早地在时机、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来进行制度转型。近代史给了我们什么教训?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强敌强制打开中国的大门,强制改革开放。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以政府为主导实行经济改革;19世纪末,我们原以为富国强兵就可以达到强国的目的,但是甲午战争我们溃败,这是制度的问题。于是才反思,才有戊戌变法。落后不仅仅是因为经济落后,是因为制度落后。日本战胜,是因为有明治维新,有宪法。所以才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提倡开议会、立宪法。如果不是保守政治势力的阻碍,如果戊戌变法、清末君主立宪改革能够成功的话,清朝也不至于崩溃,中国就没有后来40年的战争了。加上建国以后又搞阶级斗争,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花了整整70年的时间付出代价,国家已经搞得民不聊生。所以我们要在大好形势下,有一些忧虑,有一些危机感,不要以为经济改革取得成就就不需要政治改革了。

思想的阻力,还体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和“国情特殊论”。你一谈政治体制改革,马上有人说稳定压倒一切,免谈,改革就不稳定了。一谈政治体制改革,马上就有人说中国的国情特殊,中国的国情是要中国特色。

稳定能不能压倒一切?稳定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是不可以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这点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稳定,谁也不想动乱,但是稳定也不可能是压倒一切的。

《代议制政府》的作者密尔,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他说,一个政府,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实就两个事:一个是保持秩序,使一个社会有秩序;一个就是推进进步。但是秩序跟进步之间是有矛盾的。如果过分地强调秩序的话,社会的进步可能就会缓慢,或者不能进步,甚至倒退了。如果推进进步的话,可能会给秩序带来一定的危险,但是一个好的政府是能推进进步的,而不单单寻求秩序。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寻求维持秩序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僵化、死亡。这是密尔的理论。他就讲了怎么在秩序和进步之间保持平衡。

稳定不能压倒一切,也不能以牺牲一些人最基本的权利为代价。比如我们拆了老百姓的房子,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你就不要补偿吧,不要上访吧!这种稳定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后果是极不稳定,所以为了稳定只好采取很多的措施,包括奥运期间采取的办法,从中央派了很多干部到各省去接访,然后给钱,多年没解决的问题就给钱,只要不上访就给钱。付得起吗?不管是不是对,也不管公正不公正,司法的秩序就打乱了,这个稳定不是一个长久时期的稳定。所以稳定不是压倒一切的,特别是人的基本权利,还要维护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稳定压倒一切就能牺牲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要求、个人合法的权利,而牺牲个人权利的后果是积压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个道理是那么的简单,老是用控制的办法就能保持稳定吗?这是一个不需要详细论证就能明白的道理。

搞民主会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很多人都觉得搞民主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他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现象,大都是在民主的国家。一会儿讲拉丁美洲,一会儿又是东南亚国家。这些都作为论证民主可能造成不稳定的引证论据,我认为是非常片面的。我只能说,在一个不完全民主的国家向民主过渡的时候,会出现高度的不稳定,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一旦进入民主轨道以后,事实上是稳定的,这个不用证明,真正民主的国家,社会数百年持续稳定。所以不稳定是在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不能把民主和动乱必然联系起来,只能说

向民主过渡会有不稳定的危险，所以我们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解决向民主过渡时怎么避免不稳定的问题。

避免不稳定有很多社会的条件，时机是很重要的。我常常打这个比方，当然历史不能再重演，如果清末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为什么？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当时的清王朝，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还有权力和威信掌控国家，改革完全能在掌控之下来运行；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的社会，包括知识分子精英都非常支持改革，包括像孙中山这样的人都支持君主立宪制，他是在梦想破灭以后才革命的。当时知识分子跟政府是比较一致的，当时的改革是中国民主的一个好机会，中国很可能搞君主立宪制，那时到现在一步一步地发展，一年改那么一点点，恐怕也比现在好多了。没有后来的革命，战争，搞得经济重新建设；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又要重新建设。即便经济建设不是太难的，而一个制度的维持就非常困难。可惜这个时机就错过了，后来到1905年、1908年再来搞宪政，戊戌变法以后知识分子跟政府已经分裂了，而向民主过渡的时机也错过了。所以说不要一说民主就动乱，不是那么回事，关键是我们要正确地总结历史。

再一个就是"国情特殊论"。我们的国情那么特殊吗？我看也没有那么特殊。首先人都是一样的，基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不要把我们跟整个人类社会分开了，都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凡是人类都有基本共同的理念，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人类有一些共同的，包括最根本的哲学价值层面的理念：民主、自由、平等。这怎么不是共同的呢？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还有人说中国公民素质太差了，不适合搞民主。2002年，我出版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是专门批驳这种观点的，当然不是从理论上批，是用调查的结果来批判。首先中国老百姓素质太差了不能搞选举，我就不认同。我们搞了很多调查，去了很多地方，调查结果很明显地显示，对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于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是农村高而不是城市高。你去看看，事实就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城市的选举，选居委会你会去参加吗？我不会去参加，这个选举有什么用处呢？毫无意义的东西。农民为什么选举呢？农民选举是关系到自身的切身利益。到北京来上访，一次又一次，说农民没有觉悟，这些话语都是从想象里边捏造出来的。在利益面前谁都有觉悟，关键是能不能建立一个制度的渠道，能不能真正表达公民的利益？如果能，选举就会有积极性参加了。两百年前美国的那些清教徒，还有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那些罪犯，他们都投票，跟素质没有关系。所以说中国公民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这个说法很荒唐。如果顺着这个荒唐的论调，假设说农村老百姓素质低，城市里的居民素质高，北京市高，上海市也可以吧，上海也跟世界接轨了，大学生、博士生比例比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都高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让北京、上海先民主起来？让上海的老百姓民主起来，选个市长什么的干干，是不是可以呢？

我曾帮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做选举顾问。联合国有个全球基金，这个全球基金出了很多钱，要在各个国家防治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三种疾病。根据全球基金的要求，你这个国家必须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叫做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才可以申请这项经费。中国已经拿了5个亿美金，但是人家要求你必须要有选举，其中5个是政府代表不需要选举，6个是非政府代表，在6个非政府代表里面，人家规定有一个必须是以草根为基础的NGO（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其他都可以找官方的，这个不行，所以要选举，选出一个代表。上次选举闹到联合国去了，说你这个选举不公正，人家就不给你钱，所以要搞一个公正的选举。在一个公平竞争条件下的选举应该怎么来做，这是选举的技术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

很多学者开会时候都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现在的政府官员跟1989年那时候的政府官员完全不一样。这跟文化没有关系，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后上大学的，受的教育都是现代的教育，这个理念都没有问题，但是观点立场完全不一样。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有一次去山东讲课，课后我们七八个同学聚会吃饭，聚会里面有一个同学是律师管理处的处长，有几个同学是律师，我就谈到北京有

35 个律师要求直选北京律师协会的事情。我说起了这个事,那个律管处的处长就说 :“这不行”,他跟我们是同学,原本一样的,而几个当律师的同学都说早该直选。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地位决定观点。接受同样的教育,是利益决定了说什么话。我跟很多当了官的同学在很多问题上都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包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原因就在于官员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有了基于自身利益的立场,因此以前没有什么分歧,现在差距就太大了。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动力

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到底在哪里?

社会还在发展,特别是在 2002 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这个变革以公民社会的出现为迹象。基层公民的维权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改革。例如三个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孙志刚案,还有物业小区维权,村民委员会维权,农民土地问题,城市拆迁问题,不断地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来自公民社会的动力越来越强烈。人民富裕了,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人格的人,一个有经济利益的人,必定要有一定的保障。我们的政府是比较强的政府,一举手一抬足可能就会侵害某些人的利益。例如女生告华硕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女生黄静因“勒索华硕 500 万美金”被海淀检察院批准逮捕,在看守所被关押了近 10 个月),很奇怪的,政府会把一个消费者的事情变成一个刑事案来处理。政府的权力比较喜欢跟资本站在一起,老百姓要告状很困难,但是机关、单位要告老百姓很容易。

而互联网的发展,使公民有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表达的空间,成为对公共政策和政府官员形成广泛的舆论监督的力量。这场改革围绕的是法律和权利的实现,而不是观念和理论的讨论。对法律和权利的解释,使政府权力不断受到来自公民社会的挑战和约束。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件好事。非政府组织,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反政府组织。维权是一种好的事情,不是坏事。西方社会早期的时候,是体制外的——革命、冲突、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自由资本主义后期,民权运动就已经开始在体制内来改造社会。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号召人们革命,马克思的预见没有错,资本主义如果那样发展下去肯定会灭亡。但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会被改造,也会吸收社会主义的东西,也会吸收马克思本人的东西。后来恩格斯主张,我们可以有合法的手段,通过选举、工人运动的方法来取得权利,这就是民权运动,比如西方国家的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使得他们取得政治上的权利。权利斗争的结果是获得了投票权,这就解决了社会最基本的问题——劳资关系的问题。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工人们通过革命的方法,通过破坏机器的方法得到政治权利 ;之后,他们通过选票选举一个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府上台,社会民主党就是这么上台的。

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就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在进行维权运动。比如环保运动、农民维权运动。农民权益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把拖拉机开到华盛顿去,就形成了农民协会,松散的维权斗争组织起来,就形成了对话、谈判。我记得有位英国学者写了篇文章,叫做《有组织的声音》,有组织的声音才能与国会较量,拉入到谈判桌上,这是维权的结果。维权就是在合法的制度下来维护你的法律权利,如果不搞维权的话那就麻烦了。不搞维权,就会有人拿起武器。我们应该承认非政府组织的存在,让他们有一个表达的方式,省得我们面对出租车司机在大街上,不知道找谁来谈判,如果我们找到他们的代表谈判,也不至于一下子就罢工了,这是我们政治管理、治理的方式,是改革的动力要克服的思想障碍。

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不可拖延。持续 30 年的经济改革创造的社会繁荣,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良好时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广大的劳动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被抛弃的感觉。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立加剧,特别在基层。从现在起进行认真的、脚踏实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是好的选择。■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 韩 钢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 年 10 月至 1981 年 6 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

1980 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注 1 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 年 11 月 29 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 年 9 月 11 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 月 14 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注 2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 年 9 月 11 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 月 13 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

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注 3

1999 年 3 月 9 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 月 10 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 月 13 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注 4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注 5 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 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 月 24 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注 6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注 7 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 16 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注 8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注 9

2000 年 5 月 20 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 年）9 月 16 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 月 21 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 月 26 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注 10《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 9 月中旬、9 月 25 日和 10 月 2 日。注 11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 9 月 16 日和 26 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 10 月 2 日、3 日、4 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注 12 耿飚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注 13

10 月 6 日晚 8 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8 年 11 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东兴同

志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是吴德抓的。”注 14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 年 10 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注 15 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注 16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注 17 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决定”，不可能不经过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意。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 1977 年 2 月 3 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

1976 年 10 月 24 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图为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参加庆祝大会的首都百万军民挥手致意。

潴留，于 1976 年 12 月 10 日住进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毛毛称，12 月 14 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 月 16 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注 18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注 19 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

华国锋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劳动

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注 23] 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注 20]

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1977 年 1 月 14 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注 21] 传达华国锋在 1 月 6 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注 22]1977 年 3 月 14 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至迟到 1977 年初，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华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

1977 年 1 月 6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 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注 24] 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注 25] 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

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注 26 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 年 12 月 25 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 “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 1977 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 年 1 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 1977 年 1 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 1976 年 12 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 1977 年 1 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注 27 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 1977 年 1 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 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 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注 28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注 29 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注 30

5 月 3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 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 年 1 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 月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 “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

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注[31]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注[32]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注[33]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注[34]“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注[35]、朱穆之注[36]、李鑫、华楠注[37]、王殊注[38]同志阅办。”但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注[39]据李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审批了。注[40]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

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注[41]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42]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注[43]

毛泽东与华国锋在一起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注[44]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力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注[45]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注[46]王震看望邓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

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注 47 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 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 年 2 月 26 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注 48 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 年 2 月 26 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注 49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 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 年 10 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注 50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 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 年 4 月方出狱。1975 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 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专委注 51 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 1975 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注 52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会没有关系。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国锋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注 53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复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 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注 54 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注 55 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

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华国锋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国锋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注 56 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沿用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注 57 虽然依旧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产"，毕竟与"只革命、不生产"或"重革命、轻生产"不同。对国民生活，华国锋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注 58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注 59 语言虽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 年 2 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 年 3 月全国计划会议，3 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 月到 5 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 月到 12 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 年 2 月到 3 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 月全国科学大会，4 月到 5 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 月到 7 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 月到 9 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述，"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国锋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入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注 60 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 1977 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 月 23 日，复出才一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主席提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注 61 或许应该更多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

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

其实华国锋也在考虑结束揭批运动。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结束清查运动。有人要求把清查运动的时间延长一点，华没有同意，要求还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注62 不知何故，高层并未宣布结束运动，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注63 “底”在哪里？时过九个月，邓小平旧话重提。1978年9月，邓在东北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透出对运动过久的不满：对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么搞下去吧？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疼不痒，没个目的，搞形式主义。注64

邓小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国锋作过沟通。10月9日，华同“毛著编办”几位负责人注65 谈话，提到邓小平经过沈阳时，李德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烦。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注66 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彪、“四人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入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注67 华国锋考虑，就在这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注68 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978年11月5日，华国锋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注69 到1978年冬，在“重点转移”的问题上，华与邓没有根本性分歧。

华国锋唯一有些顾虑的，是如何提政治口号。他的想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提揭批‘四人帮’为纲”，在这个“总口号”之下实现“重点转移”。这种“两张皮”的策略，透出华国锋内心的某种障碍。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注70 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就这次会议而言，大概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华的意见与邓稍有差异。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注71 但华的讲话既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绕开了这个敏感问题。

注释：

本文参考了《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耿飚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大量文献资料，因杂志版面所限，无法全部刊出，需要了解注释具体内容的读者，请上“炎黄春秋网”（www.yhcqw.com）阅读。■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本 刊 启 事

2009年精装合订本100元，简装95元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为了刊发更多读者喜爱的文章，应读者和作者要求，从2011年1月起，本刊正文从88页增加到96页。每期定价8.00元，全年96.00元。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炎黄春秋杂志社

亲历邓小平南巡

○ 李罗力

一、幸运的“接待办主任”

1992 年 1 月，中国发生了在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邓小平南巡”。当时我正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接待办公室主任，小平同志南巡时在深圳的主要接待工作的具体安排、组织、落实都是由我们直接负责。从老人家乘专列到达深圳那一刻起，直到他从蛇口港乘船离开去珠海，他在深圳的所有重要活动我几乎都在场，老人家很多饮食起居的具体事项都由我在现场指挥和安排。

为此，我经常对亲朋好友说，在中国各省市成千上万的“接待办主任”中，我可能是最幸运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我接待了邓小平，而且是在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非凡时刻、在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地点、接待了一位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并亲身经历和参与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二、内忧外患：改革面临严重回潮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都知道，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由于 1988 年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 1989 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都陷入了低谷。而几乎同时发生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瓦解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封锁，更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不少党内人士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担心在中国也可能出现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不少原来就坚持“左”的观点的人们则开始宣传，中国继续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很可能会出现“和平演变”。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以及把“姓资姓社”摆在首位的思潮，重新开始占据思想和舆论的主导权。中国改革开放面临严峻的挑战，随时有放慢、停滞甚至“走回头路”的危险。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度过了十分沉闷的三年。那时人们普遍的感觉是改革开放的前途茫茫。

三、振聋发聩：不搞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

我当时身处深圳经济特区，不但对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而且对“特区”这个“改革开放产物”的命运也深感担忧。

1991 年底，就在深圳市委决定我兼任市接待办主任不久，市委接到“上面”通知，说是要准备接待中央的“大领导”。这个消息一开始是极其保密的，我作为接待办主任也不知道谁要来。但是看到市委书记李灏同志亲自召集会议、周密布置和安排接待工作，心里就明白这个“大领导”肯定非同寻常。因为那时冬天有很多曾经身居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老领导、老同志到深圳来休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为接待工作“闹”这么大“阵仗”的。当时接待办的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就开始猜测可能是小平同志要来，为此大家都兴奋异常。因为小平同志 1984 年第一次视察深圳，就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重要题词，给了深圳特区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再来，无疑是再次给予特区以最大支持、鼓舞和关怀，给大家带来希望和曙光。

这个秘密不久就解开了。因为邓小平办公室副主任孙勇、张宝忠两位将军相继到深圳来为小平同志南行进行“踩点”和布置前期准备工作。

现在不少人一讲到邓小平南巡，往往理解为

1992 年 1 月 19 日上午，邓小平在家人陪同下到达深圳

他是以国家实际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来深圳视察工作，并且在视察中发表了重要讲话。其实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中央办公厅和邓办就给广东省委下达通知，明确讲这次小平同志过来就是“休息”。我也记得很清楚，张宝忠同志到深圳来布置接待准备工作时，也一再向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强调，首长此次就是来“休息”、来“看看”；而且强调了许多“不”：即不听汇报、不做指示、不讲话、不合影、不题字、不吃请、不见报；除了中央媒体的随行记者外，广东省和深圳市只许一家电视媒体和报纸媒体跟随拍摄和记录；另外就是所有陪同参加邓小平活动的人员（包括省市主要领导）一律不许录音，不许拍照，等等。

正因如此，当时我们在接待计划中安排小平同志到国贸大厦楼顶参观时，也纯粹是按照想请他多看看，多了解深圳发展情况的意图安排的，从没有任何要请他讲话，要听他指示的考虑。国贸大厦还是当时深圳市罗湖区（甚至是深圳全市）最高的建筑，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当时发展最繁华的罗湖区的景象，也可以俯瞰深圳大部分市区和对面香港的很多景观。

还有一个情况，当时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由于没有时间向小平同志汇报深圳工作，因此很希望能够趁这次邓小平在国贸大厦上俯瞰深圳全景时的机会，向老人家汇报一下，也能像 1984 年那样再次得到小平同志对深圳经济特区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支持。因此在我们做活动的具体安排时，李灏同志就指示我们要在小平同志坐的地方摆上介绍深圳的一些图文资料，以便于他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

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当邓小平坐到 52 层国贸大厦楼顶的旋转餐厅上，一看到当时深圳繁华的景象时，立即开始激动起来（我在陪同小平同志期间已发现，他平常是一个很寡言，很沉默，很宁静的人）。在李灏同志刚刚汇报了几句有关深圳的情况后，他就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起来，间或有谢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和李灏同志的一两句插话，其余时间都是老人家自己在讲，而且讲得十分激动，不断地用手势来加强自己表达的情绪，手指都在微微发颤。有人在回忆录中说他讲了半个小时，我觉得不止，至少四五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根据我在现场听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并核对后来正式发表的文件，可以肯定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至少六成以上都是在国贸大厦楼顶的旋转餐厅发表的。

小平同志在这里发表了这么重要的讲话，而且讲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大家事先没有想到的。更何况中办和邓办事先宣布过，说小平同志这次来“不做指示”，“不讲话”。这证明，邓小平的这次“南巡讲话”，虽然是他早已深藏心中，反复思考，深思熟虑的思想和观点，而且也是这次南行过程中想说出来的，但是何时何地讲这些话，却不是他本人或其他人刻意安排的。

谢非同志的秘书——曾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建华也回忆说：“我当时担任谢非同志的秘书，按照谢非同志的要求负责小平同志谈话的录音、整理工作。最初，没有安排这个任务，因为一开始说是来休息的，不作指示，不讲话，不听汇报，不题词，不见报。……他到深圳后的第二天，去了国贸大厦。在那里，李灏和谢非同志分别汇报了深圳和广东的改革发展情况。简单汇报后，小平同志开始讲话。当时，很多人感到措手不及，因为没想到他要讲话，事先没有准备。小平同志讲话时，我站在他的后面。他一开始讲，我就按下了录音机的按钮，开始录音，把讲话内容完整地录下来。其他人多数都没来得及做记录”。（参

阅田炳信 :《邓小平最后一次南巡》,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4 年版)

邓小平在南巡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小平同志当时侃侃而的情景，我的感觉仍然是“振聋发聩”,“无法形容”。小平同志那些极为精辟、透彻和重要的话语至今仍然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边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在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都十分低迷,人们思想都十分困惑的情况下,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真是有如 “久旱逢甘霖”、“拨开乌云见青天”,给在场所有人以“茅塞顿开”和“豁然开朗”的鼓舞和力量。

尽管小平同志到来之前,中办和邓办都提出过严格的纪律要求，在邓小平的活动中不能录音,不能拍照,但是当小平同志发表谈话时,包括谢非、李灏等领导同志秘书在内的很多人,都根本不管这些“纪律”和“限令”,立即拿出录音机来录音。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都把这些设备藏在身上或包里。由于老人家的讲话太重要了,于是大家就都把这些“纪律”、“限令”抛到了一边。有意思的是,这次恰恰正是谢非、李灏等主要领导,带头“破坏”了这些纪律和限令。

我和大家一样,屏住呼吸,凝神静气,力争把老人家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心里。晚上回到家后,我立即根据自己的回忆尽力把小平同志讲话的内容记到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上。中央正式公布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对照了一下,我记录的主要观点基本上是完整和准确的。

四、“邓旋风” :掀起改革开放大潮

按照中央规定的接待纪律,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一地视察工作,必须在其离开后的一定时间才可以通过媒体向外公布。但此次小平同志来则不同,他要求不能因他对道路、场馆进行过度戒严而导致扰民,同时也要求见群众。因此他在深圳的几次重大活动(包括参观国贸大厦、参观游览华侨城锦绣中华主题公园、参观深圳市先科集团等) 都没有采取高度戒严和完全隔离群众的措施,基本上都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到现在我还清晰记得,1992 年 1 月 20 日上午，那批早于戒严清场时间来到国贸旋转餐厅喝早茶的群众,在离

场时突然见到邓小平出现在国贸大厦，立即一片欢腾雀跃、激动万分的情景。

正因如此，邓小平还没有离开深圳和珠海，大批港澳媒体的记者就已经“闻风而至”。猜测邓小平会住在哪里，会在哪里出现，一时间成为这些媒体和记者们关注的焦点和最热门的话题。尽管国内所有媒体都按照中央规定没有报道小平南巡的消息，但是“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这条新闻，已经通过港澳媒体传遍世界。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也在国内不胫而走，成为流传于各级干部和广大百姓中的重要话题。很多人奔走相告，当做天大的喜讯来传播。

1992 年 3 月 26 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南巡第一次正式公之于众。3 月 30 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东方风来满眼春》。3 月 31 日，《人民日报》等国内各主要报纸都在头版主要位置转载《深圳特区报》的这篇长篇通讯；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 45 分钟时间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从这时开始，神州大地上刮起了一股“邓旋风”。

邓小平南巡，在世界上也引起了轰动。国外各大通讯社和其他主要媒体，不仅纷纷全文播（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而且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消息和评论。英国媒体发表评论说：“外国投资者再次涌向中国。邓小平和改革家们的经济政策看来正在取胜”。德国媒体发表文章说：“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能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在最近这个 10 年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国家”。日本《东洋经济》发表文章说：“中国正在迎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新高潮。”

我所亲身经历的一个“手抄本”的小故事，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小平南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我的一位老同学——国内某省会城市的主要领导，小平南巡时刚好率团在深圳访问。当时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因此我请他吃饭时他强烈希望能了解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我把自己记录了邓小平讲话主要内容的工作笔记本交给他，并要求他严格保密。没想到他第二天还我工作笔记时，已经悄悄地把我记录的邓小平讲话内容复印了。待到中央正式公布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回去后就向省委主要领导汇报了在深圳了解到的邓小平南巡的情况，并且把我记录本的复印件在省委主要领导中进行了传阅。省委领导还专门召开了常委会传达和学习了这些内容，都感到十分振奋和鼓舞。讲到这里他不无得意地说，他们省的领导比其他地方提早很长时间就看到和学习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如何得到了人们发自肺腑的真心拥护。

五、邓小平南巡：“以开放促改革”

如果分析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从 1978 年 12 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92 年邓小平南巡前的这个历史阶段（我把它定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就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有三个最主要的特点：

第一，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除农村改革和私营经济（多种所有制）改革外，就城市改革主体来说，主要还是来自于“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在没有外力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给予强力冲击的前提下，遇到了顽强抵抗和重重阻力；同时，由于改革者没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也发生了改革措施的重大失误（例如“价格闯关”），使改革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这一阶段的城市改革层层受阻，步履维艰。

第二，这个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以“改革”为主，“开放”还没有上升到主要层面。这不仅体现在“对外开放”当时还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模式（例如外贸进出口体制的自上而下改革），而且体现在“开放”地域还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主要局限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同时“开放”的性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主要是在上述指定的少数地区进行试点等）。因此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就“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来看，其主要特点是“以改革来带动开放”。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步子迈得很艰难，这一阶段的开放也受到很大的局限。

第三，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改革主要还是在中国的内部进行，基本上还是一场“封闭式”的改革。虽然国家已经提出了“开放”的目标，但正如

上面所提到的，国家对“开放”的政策措施还十分谨慎，仍有较多和较严格的各种限制。这种“封闭式”的改革，使得中国的传统体制不能得到外力给予的强力而有效的冲击，不能出现“里应外合”式的大突破，这也成为体制改革总是不能迈出大步和不能取得明显成效的因素之一。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邓小平进行了轰动世界的“南巡”。由于广东珠三角和深圳、珠海特区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最成功的地区，也是思想最解放、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因此邓小平南巡的根本意义，就是要打破当时笼罩全国的沉闷、困惑、僵化、压抑和“左”的思潮，用这些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呼唤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南巡是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以改革为主”转变为“以开放为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自此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进入了第二个历史阶段——“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一方面通过大开放及与国际全面接轨，中国在社会理念、政府行为、法制观念、经济管理体制、企业行为、劳动力素质水平以及各级官员的管理能力和水平等方面都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另一方面观念转变又使得各方面的传统行为和传统势力在潜移默化中逐步瓦解，因而在实施改革时，原有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阻力大大减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突破和全面深化。同时，大开放带来了资金和资源供给的大量增加，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软硬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大量外资企业（特别是港台中小加工贸易企业）进入后又为亿万中国农民“洗脚进城”提供了就业机会，由此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发展。总之，经济的飞跃发展和中国财政经济实力的大大提高以及外资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冲击和民营企业的刺激成长，都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第一阶段所不具备的空间和能力，从而实现了以增量的飞跃带动存量发展的巨大进步。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在全球产业转移和信息、资金全球化的最佳时机，实现了整个国家的大开放，因而中国成为这次全球化新浪潮中的最大“赢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大大发展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和观念大大进步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中国不仅由于成为“世界工厂”而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所有的历史和现实积极因素都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和发挥，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国家快速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现在回头来看，完全可以说，邓小平南巡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因此邓小平南巡的作用和意义，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会过分。■

（作者为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书屋 2011年第2期目录

湖湘人物	陶澍应是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	夏剑钦
	诸教同理　力行证道	
	——曾宝荪的基督信仰与践履之路	柯倩婷
东瀛志略	我们应当怎样看日本？	
	——《暧昧的日本人》第三版前言	李兆忠
	神社招魂“靖国”难	赵　刚
口述历史	1948：齐鲁大学南迁始末	岱　峻
	风雪兴安岭	裴毅然
人物春秋	金毓黼在五十年代	张晓唯
	记历史学家丁则良先生	散　木
	高振霄：孙中山嘉奖的“甲等功臣”　高中自	王琪琨
	关于“殷海光故家的几件往事”的补正	李文熹
域外传真	对美国小镇文化精神的怀旧	刘剑梅
	四百年来利玛窦	郝　稷
说长论短	都是吃饼惹的祸	眭达明
	话到嘴边透心凉	晏建怀
灯下随笔	黎元洪身世源流考	裴高才
	利国无能但利身	
	——读徐世昌《韬养斋日记》	王学斌
书林折枝	她坚守着诗化精神家园	
	——读《我额头青枝绿叶　灰娃自述》	刘士杰
	《家国天下》后记	杨恒均
思史佚篇	也谈清末新政的失败	
	——与萧功秦先生商榷	李　工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我的右派经历与反思

○ 江 平 口述 陈夏红 整理

有人问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是划右派的经历！"1960年秋，我在北京门头沟大台煤矿劳动改造的时候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当火车轧断小腿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极限伤痛，终究是一时的，而划右派后"撕心裂肺"的那种极限的精神伤痛，却是前后折磨了我22年！

1951年8月，我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中的一员前往苏联学习法律。毕业前使馆教育处征求本人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去高等学校，这样，我就被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我在1956年底带着桂冠回到学校，自以为步入了"天堂之门"，从此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没想到1957年给我开启的是"地狱之门"，我一下子从天堂跌入地狱！

有人要我谈斯大林

1957年的春天，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由于我1951年就出国，对国内政治斗争情况一无所知，其间发生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这些政治运动，与我毫无关系，所以我对即将来到的这场政治运动，既无经验可言，也无任何思想、心理准备。

整风运动开始时，是很和风细雨的，主要是通过座谈会形式，听取教职员工对党委的意见。当然大家都很谨慎，给党委提意见，更多还是提希望。

我因为刚到北京政法学院，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当然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但是，大家对苏联发生的事情，却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刚发生不久的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在座谈会上，有人希望我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和看法。

斯大林杀害和镇压大批反对派人士的事实揭露后，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受到很大震动，一个时期内在群众中影响也降低不少，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退党。

西欧国家共产党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知名度也非常高。他在斯大林事件发生后曾说过，斯大林问题的根源，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当时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的分歧，就在于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个人的缺陷造成的，而陶里亚蒂则认为这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当然，我是同意陶里亚蒂的观点的。我在苏联学习时，从自己的五年经历也感到，这么大的问题，仅用个人品质是无法解释的。我所经历的苏联制度层面的缺陷，正是现在我们党要整风时，需要警惕并克服的。

于是，我就在座谈会上谈了上述想法。后来在揭露我的"反党"言论中，这也就成为一项内容了，尽管这不是我的主要"右派罪状"。批判时，有人以此说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有缺陷"，这当然令我甚感冤枉。——帮助党整风也就是要解决制度中的缺陷，为什么一提制度缺陷，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了呢？

要知道，那时候一讲社会主义，其前提必定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说社会主义制度缺陷是大逆不道的！

我的一张大字报

整风运动座谈会方式冷冷清清，发言不痛不

痒，于是没过多久，就开始进入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阶段了。

当时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参与其中，生怕被形势抛下，我也很积极，于是也就开始琢磨写个大字报。根据大家反映，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的职称评定工作是停止的，以前是什么职称，现在快十多年了，就还是什么职称。具体到北京政法学院，就有差不多20个人，还是1949年之前评定的讲师、助教，连副教授都够不上。于是，1957年5月31日晚饭后，我们住在二号楼、三号楼的一些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议论，大家纷纷表示也要写张大字报，表示我们青年教师的意见。讨论到最后，提出了五条意见，大家推举我主持并起草大字报。大字报共有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认为学校整风不力，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帮助党整风；

第二，认为学校的问题揭的还不够，中层干部都不出来揭发，要求中层干部带头帮党整风；

第三、认为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下落，应当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弄清真相，公布于众；

第四、老教师中有一些在肃反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

第五、现今的工会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现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写完大字报后，我们就开始征集另外一些青年教师签名。许多人都毫无保留地签了名，共有20位。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当然最后也就成了这张大字报的主谋。

第二天清晨，我们将大字报贴在了三号楼门前。因为这是青年教师的第一张大字报，又有20人签名，这张大字报非常引人注目，引来了很多人看。

北京政法学院院党委书记刘镜西，也专程来看了我们的大字报。看完后还夸奖我们，说大字报写得不错。

这张大字报的签名者，以民法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为主。紧接着，我们还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以反映意见的方式正式向院党委做了反映。

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党员代表是林炳煌，他后来去了香港，改名林文，担任香港《镜报》主编，反右中受到了党内处分；团员代表是我；群众代表是姚兆辉。姚兆辉和林炳煌均为归国华侨，姚兆辉因系群众，未受处分，但也被牵连。

我们三人向院党委反映了青年教职工的意见之后，当时还受到了院党委领导同志的表扬，说你们的精神很好，院党委会考虑你们反映的这些问题云云。

所有右派都是领导决定的

6月中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反右阶段后，学校也就停课了，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全校上上下下都转入了对右派的揭露和批判，师生员工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整风阶段，当时的矛盾主要对着院领导、中层干部和师生员工之间的矛盾。现在反过来，领导很明显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那些曾向领导提过意见的人。

7月份的某一天，早晨起来，看到校园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开始揭发我的右派面目和罪行。这张大字报上面，最集中批判的当然就是那张20人签名的大字报。不久前还被交口称赞的大字报，如今却成为"反党"的大字报，翻云覆雨两重天！

当时所有被划为右派的，都是经院党委研究确定的。领导决定了划谁为右派，那下面的积极分子就按照这个目标去揭发、批判。所以每个教研室都有一些积极分子。

这些积极分子，他们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党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比如你要说我是右派，那这些积极分子就看我在整风鸣放期间有没有什么言论或行动；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看我历史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如果历史上没什么问题，那再看我出身是不是好……总之，他们的使命，是向领导证明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右派，证明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

证明了这一点还不算，他们还有批判的重任。他们最后看了我领衔的20人签名的大字报，说这就是右派言行，那他们就都开始批判这个大字报，最后再从这张大字报的字里行间，挖出我的动机。

当时，这样的运动模式是很普遍的，可以说都是这么做的，即右派分子必须是由上面先来

定，而不是下面人来定的。下面的人在领导决策前可以揭发，但最终是不是右派，必须由领导来定，这是很厉害的。没有领导批准，是不可能成为右派的。

有没有对我搞过全校性的批判大会，我记不清了，好像没有。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反右运动中，我是最好解决的一个右派分子，因为我很快就缴械投降了 !最后，大家觉得我态度还不错，自己都认罪了，也没什么特别要再批判的了。

终究说来，我的右派问题并不复杂，而且也不属于院一级的重点人物。反右斗争矛盾的集中点，主要是在有影响的老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中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像民盟、农工民主党这样一些与共产党有过政治纠葛的民主党派，此外还有就是高等学校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而我那时还属于小知识分子，又是团员，只不过是个反右中顺带进去的边缘人物。

批判完了之后，组织上就根据右派分子本人的认罪态度，来进行处理。处理总的原则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原则总的来说还是贯彻了，只有极个别人处理相当重。

那么，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过去参加过地下活动，参加过外围组织，算是有革命经历的了。而且像我这样又留苏的，回来后工作也很认真。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早早就缴械投降了，领导上认为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不久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也下来了，对我的处分算是比较轻的。

作了组织处理之后，我真的就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从天堂之门跌入了地狱之门 !政治上成了人民的敌人，家庭上刚刚从苏联回国结婚还不满一个月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家庭破裂，再加上之后不久在西山劳动时被火车轧断一条腿，可以说人生中所能承受的一切打击和痛苦，全都压在了我的头上，但我要坚决地活下去！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我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反右运动主要针对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实际上是针对知识分子。应该说，在知识分子中，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又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在高等学校里，文科的知识分子又是重点中尤为重要者。而在文科里面，放眼全国，政法界的知识分子又成了最大的"受灾区"。——从全国范围来看，应该说政法战线上的"右派"还是比较多，无论是最高法院还是最高检，甚或一些基层的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等，都成了"右派"的"大户"。

在苏联的时候，我看过小托尔斯泰写的小说《苦难的历程》。这部小说主要就是讲苏联知识分子的经历。那么，从知识分子的经历来看，苏联人特别注意阶级基础，因为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到后来，一直都强调革命中工人阶级的作用。这样的话，苏联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政权里面，就不得不经历一个"苦难的历程"。在苏联，像高尔基这样没有经历大的冲击的作家或者学者，那是非常罕见的。一般来说，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苏联革命的过程中，都经历了长期改造的"苦难的历程"。

当时我就觉得，这一点跟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比如陈独秀、毛泽东等等。而且巧合的是，那些被认为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最后都是有问题的。好像真正革命坚定的，还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大知识分子，这些人在革命之前，更是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原来的家庭也都比较富裕，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

可是中国的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像原来所想象的那样。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针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就是思想改造，紧接着就是院系调整。那时候对知识分子地位的描述，并不像后来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位，一直面临着它依附在什么阶级身上的问题。讲到知识分子，首先就讲他们到底依附在谁身上。最开始，政策制定者认为知识分子可能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后，知识分子

的世界观或者思想体系都还是资产阶级化的，或者说是旧的，就需要对敌对阵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这几乎是思想改造的“法理基础”。

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困惑：一方面，每天都在宣讲革命不分先后，随时欢迎知识分子参加，而且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确实对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可是另一方面，无论是报纸还是意识形态，都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立场，要使贴有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标签”的知识分子，朝着无产阶级的方向，进行自我改造。当然改造究竟怎么进行，究竟是不是改造好了，或者改造好了就是不是无产阶级了，那不由知识分子说了算。

从大的方面说，这是 1949 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

国共政争主要争取民盟

或者再换个角度，当时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反右运动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民主同盟。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右派的划分、打击的对象，民盟都是最多的。

我有时也在想，为什么主要打击对象是章伯钧、罗隆基这样一些核心人物呢？从我们 1949 年前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历来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白热化的阶段，应该说双方主要都是争取民盟加入本方阵营的。

在我的印象中，如果真正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来看的话，民盟在 1949 年前后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其他党派人也不多，影响力也不大，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即便像民革这样的，从人数上来说是个比较大的政党，但是民革毕竟主要是从国民党里面分化出来的一些人组成，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党可能会去拉拢民革，但不大可能重用民革。而民盟在旧政协的时候，是当时国共两党最主要的争取对象。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没有争取到民盟。于是，不能用之便杀之，国民党强令解散了民盟。

后来我们才逐渐了解到，民盟在解散前后，其内部斗争也很激烈，并不是铁板一块。当然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胜利，民盟也逐渐地站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而民盟中原来中间偏右的一些人，也被革命的洪流逐渐分化掉了。所以这给外界这么一个印象：好像民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态度一直很明确，一直很坚决地跟中国共产党走，这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可是实际上看起来，民盟仍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政党。

以前我聊起过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在这本书中，特别讲到了 1935~1939 年内战期间西班牙的政治格局，当时要么是左派，要么是右派，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以走。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情况，可是在当时的西班牙，政治格局恰恰相反，“两头大、中间小”，甚至实际情况比这更极端，只有两头，没有中间了。

1949 年前后的中国，与西班牙的情形很相似。就是这么个情况，已经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了。当时最有可能走中间道路的，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几个民主党派。民盟是最可能走的，而且民盟的力量最强，最有可能走中间路线。所以 1949 年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写了以《别了，司徒雷登》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警告那些有美国民主思想的想走中间道路的人，中国已经一边倒了，别再有什么幻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民盟的这些人中，无论章伯钧也好，罗隆基也好，还有其他比如钱端升也好，这些人都是原来留学美国的，而且这些人脑子里面，都受了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这样一来，即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可以跟你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但是革命胜利之后，也就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了。

但是说实在的，包括钱端升在内的绝大部分民盟盟员，这些人在 1949 年以后的言论也好，行动也好，都是非常明显地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可是现在看起来，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恰恰也就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民盟，而民盟在知识分子中间一直很有号召力；另外，这些人大都是留学英美的大知识分子，无论是高校还是整个社会层面都很有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尽管在 1949 年后都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但是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他

们脑海中美国式的思想观念始终都存在，他们仍然希望中国能够走亲美的道路。

所以现在看起来，当时中共领导人都把民盟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来看待，捧也捧民盟，杀也杀民盟。无论政策是有利还是不利于民盟，民盟在民主党派中都是首当其冲的。

反右运动的国际国内背景

反右运动中把高校作为重点，被称为"重灾区"。现在人们都知道，划右派是有指标的，当时的指标是百分之五，后来又有追补，即漏网右派的补划。但高等学校大大突破了这个指标。

50多年后，我们几位幸存者回忆当初划右派的比例时，一位掰着手指数当时四个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国际共运)共30多人中，被划为右派的共有10人。

也有人说，整风运动开始时对我们说的是16字方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也是延安整风的方针。延安整风我不知道，后来听说也有些过火，已经变成了政治斗争和抓特务"抢救失足者"了。反右运动结束后真是一片肃杀的气氛，可以说是："知不敢言，言不敢尽，言者有罪，闻者动怒"！

反右20年后，虽然早已摘掉右派帽子，但政治待遇依然属"摘帽右派"。悲情难禁，曾在1977年6月写下一首《反右20年感怀》：

莫道系铃已解铃，风吹时闻旧时腥。
长握笔管悲难禁，强闭喉舌心欲鸣。
鬼域犹得诉罗殿，圣朝无处哭昭陵。
为何三纪用兵者，却怕书生纸上兵？

"强闭喉舌"和"欲诉无门"就是20年心情的写照。好在两年后，终于圣朝出现并给予了彻底平反。但我最后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何三纪用兵者，却怕书生纸上兵？"共产党打了三场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拥兵数百万，怎么就容不得一些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呢？

这个问题后来看的材料多了，也逐渐有些理解了。

1957年的国际背景，首先是在1956年刚刚发生过的波匈事件，尤其是匈牙利事件，给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罩上了阴影。当时我们这些到苏联学习过的留学生，都认为中国不会受到匈牙利事件影响，中国完全是靠自己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不像东欧是靠苏联红军解放而获取的政权，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像东欧那样，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的，而不是反对共产党的。匈牙利事件是知识分子闹起来的，有名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是知识分子议论国家大事的场所。反右时期一提"裴多菲俱乐部"，就指脑有反骨的知识分子。

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依靠的是工农群众，但中共的真正领导人物向来都是知识分子，有的是大知识分子，有些是小知识分子，他们更懂得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危险。三年解放战争发展那么迅速，除了战场上的摧枯拉朽外，就是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从拥蒋到反蒋。但知识分子是善于思考的，也是善于转变的，今天拥护共产党是真心的吗？还是"大势所趋"呢？不仅对党外的知识分子要打个问号，对于一直在党内的党员知识分子也要打个问号！怎样才能鉴别他们的脑后是否有"反骨"呢？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就可以"分清"，就可以"打尽"，当然领导层也不会天真地认为可以"一网打尽"，但终究可以保持政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稳定。

反右斗争是一场集中对待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其目的就是让知识分子从此"听话"，不要有"反骨"，起到这个震慑作用就可以了，所以在处理方式上采取"敌我性质的矛盾用人民内部解决的方式"，即和"地、富、反、坏"不同的处理方式，让他们继续工作，不断地改造他们，敲打他们，为这个政权服务！

法学家的忏悔问题

我记得2006年4月的时候，中国社科院的刘仁文教授写过一篇文章——《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去年巴金去世时，人们提得最多的是他晚年的代表作《随想录》。这部'文革'结束十年后推出的当代'忏悔录'，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切中了极'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痛，因而赢得热烈的回响。重温此书，却使我想

起了一个多年来郁积在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文革'结束30年来，我们法学界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忏悔、这样的讲真话？"

他说：

我手头有一本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这本当时的反面教材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啊。有的人，本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遇政治运动，就马上说"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而被他揭发的人，又反过来揭发说"到底是谁'利用'了谁"，要求他交代清楚与某某右派分子的关系，这使我想起有位法学界前辈对我说起他当时在这所大学上学时的感觉：今天台上这位老师还在批昨天被打成右派的某某老师，明天他又被打成右派了。

他接着说：

同样在这本书里，我找到了我曾经的法学所同事谢怀栻老先生被打成右派的罪证：在一次法学界的座谈会上，他指出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认为高级领导同志不重视立法工作是错误的。就因为他说出了这样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常识性的东西，就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劳动教养，一去就是二十一年。2003年，谢先生去世时，由于他的学问和人品，得到了法学界少有的一致追悼。梁慧星先生甚至尖锐地指出：在谢老面前，许多学人包括某些著名学人，都会感觉心里有愧。遗憾的是，我未曾听说过那些当年参与"整"谢老的人在谢老去世前或去世后有过丝毫的公开忏悔。

最后他说："我并不是要法学家们去掀起过去的伤疤，人人都以受害人的身份去控诉，那太肤浅。我要说的是，法学家们作为一个研究国家上层建筑、代表社会良知和正义的群体，如果不对'文革'和它以前历次运动中的人性扭曲及其暴露进行很好的清理，就等于失去一个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就不能有效地为他以后的思考指明航向。一转眼，从1976到2006，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经历过历次运动的法学家们如今大都已迈入古稀之年，作为后来者，我不希望这一段历史在法学界断裂，因而特别想恳请尊敬的老一辈法学家们告诉我及我的同辈人：你们，这一代命运坎坷的新中国法学家们，在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是如何想、如何做的吗？有没有过像巴金那种内心的隐痛觉得不说出来良心就不安呢？倘若这样做了，那真是化灾难为福音，不光是我法学界之幸，更乃我中华民族之幸。"

江平著作《我所能做的是呐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获《新京报》年度图书提名，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江平说："法治天下"是我的理想，呐喊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之所以在这里大段地引用刘仁文教授的文章，无非想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知识分子内在的软弱性、动摇性。反右政治运动能波及这么多人，就是充分利用了知识分子这个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也不例外；

二是反右运动仍然是一个禁区。右派平反以后有一段时间，诸如电影《天云山传奇》的问世，曾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后来反右运动就成为禁区。这成了共和国成立60年来最难写的一段历史。如果把它写成正面的历史，不仅伤害了几十万无辜受难的知识分子，也难以应对社会的指责；如果把它写成反面的历史，中央对右派只是要"改正"，而不是彻底的"平反"！■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刘少奇选集》文稿的遭遇

○ 马懋如

《炎黄春秋》2009 年第 7 期刊发的《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一文中讲到："为了从思想和理论上批判和清算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错误'，早在 1966 年秋冬，中央文革小组就调人成立了一个理论组，成员有杨永志、廖初江、王道明等。这个理论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筛选编了两卷本《刘少奇言论选》……" 读了这段文字，不禁想起 1967 年"文革"初，"中央文革"戚本禹派杨永志从我和闫启华同志手中拿走刘少奇文稿等材料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

"文革"前编《刘少奇选集》

"文革"前编《刘少奇选集》的全过程我不清楚。1960 年我下放安徽农村劳动，回来后，大概是 1961 年初，听我的直接领导中宣部宣传处（局级）处长王宗一同志（"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说，中央决定编《刘少奇选集》，他奉命参加了。当时还听说编《刘少奇选集》是毛主席提议的，中央同意。少奇同志谦虚，一开始就不同意编他的文集，中央决定后，他表示服从。他忙于工作，一直没有把心思放在编自己的文集上。这一工作是 1960 年开始的，由康生和陈伯达领导，参加者是编《毛泽东选集》的班子。我记得有许立群、姚溱、熊复、王宗一等同志参加，先在北京收集文稿，后去外地，最后在广州完稿。1962 年初，宗一同志工作结束回京，带回来的文稿就是在广州的最后稿，即第四稿，宗一交给我，要我保管。我见到的是八开大的白报纸铅印稿，字大，天头地脚大，便于修改用，文稿首页右上角印有"广州第四稿"的字样。宗一对我说："刘选"已编好，等少奇同志审阅定稿后出版，现在立即着手写"注释"。看来"注释"由宗一同志负责。

宗一同志叫我参加注释工作。他让我先通读文稿，提出需要写"注"的意见。我没有做过注释工作，不知从何着手，首先通读了"刘选"所有的文稿，又读了"毛选"上的"注"，学习写"注"。我根据我的理解和不理解，用铅笔在文稿上标出了要写"注"的地方，送宗一审定。他审阅后作了修改，他说准备请中央有关单位参加写。不久请了全国总工会、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以及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的同志开了一个会，把任务交给了他们，限期写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这三篇文章的"注"，由康生领导的理论小组的同志负责写，是袁尔矩和黄宗汉来联系的。还有《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等几篇，不好分给以上单位写，宗一叫我写。各单位按时写好"注释"交来，宗一看了不满意，说要大改。请了党史专家缪楚璜同志来参加修改，实际是重写。宗一亲自参加，缪楚璜同志带来两位助手，我也参加，我主要负责联络、记录、查找资料、跑腿等事务。五个人每天用半天时间集中办公，边读、边议、边改、边写，连续干了好几天完稿，铅印成一本《刘少奇选集注释稿》，共印了 30 册，分送给了康生、陆定一、周扬、陈伯达，可能还有胡乔木等领导和参加编"刘选"的有关同志，余下的由我保管，直到"文革"（1967 年）。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重新发表

1962 年 8 月 1 日，刘少奇 1939 年在延安发表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在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和党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

发表前，王宗一同志对我讲，少奇同志工作忙，没有时间审阅“刘选”的全部文稿，“刘选”暂时不能出版，中央决定先发表少奇同志所写“论党”的三篇文章，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由《红旗》杂志陆续刊出，先刊登“修养”。宗一要我将以上三篇文稿及“注”交给理论小组的同志，我记得是袁尔矩来拿的。“修养”一文很快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刊出，人民出版社及时出版了单行本，发行全国，还出了一种精装的单行本。我作为工作人员，《红旗》杂志社赠我一本精装单行本，我保留至今。少奇同志所写的另两篇有关“论党”的文章，后来未见刊出，也未听到任何信息。

《刘少奇选集》的编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的重新发表，中央、毛主席是知道的，康生、陈伯达是一清二楚的，后来（“文革”中）批“黑修养”，我很难理解。

刘少奇文稿的命运及其他

1966年“文革”开始，毛主席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被打倒了、撤销了、砸烂了。因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同志被打倒了，被迫害死了。王宗一同志也被扣上了反毛主席的罪名，含冤去世。

尚未出版的《刘少奇选集》的文稿及有关材料，王宗一同志交给我以后，我一直锁在我办公室的一个书柜里。这些材料不属任何个人所有，不应由任何个人来处理，也不是宗一同志私人对我的委托，我不能随便动。部内一般干部知道“刘选”这件事的人很少，知道我参加这一工作的人更少，当时在宣传处工作的闫启华、曹斌、王哲人、史洪是知道的。

“文革”中，我一直关注着“批刘”和“刘选”的事。

在中宣部最早点火煽动群众批判刘少奇的应该说是陈伯达。部内较早出现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批工作队的大字报，署名刘淑晏，她是陈伯达的妻子。刘淑晏并非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她身份特殊，部内的人是知道的，她写的大字报影响很大。部内很快掀起了反工作队的高潮，工作队挨批斗、被赶走。在中宣部办公楼内出现的第一张批刘少奇的“黑修养”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的大字报，署名“孺子牛”。据了解此人是陈伯达的手下，曾经是“中央文革”的“座上客”，后来是“阶下囚”，自然也就成了“文革”的受害者了。

一天，我听说，中宣部附近的沙滩大街贴出揭发有人编“刘选”的大字报，我赶去看，内容很简单，未指名道姓，看来此人可能不知内情，也许是一种试探，总之，“刘选”之事透露出去了。这张大字报很快被别的大字报覆盖，此后我没有看到附近有此类内容的大字报出现。我想，此事与康生有关，康生对此事是很心虚的，他怕外界知道。不久，北师大的红卫兵来造反，在部内一人的指点下，找我交代“刘选”的事。当时我不在办公室，来者未找到我，负责接待的人不明真相，说我是部里的小干部，不可能知道这样大的事，肯定弄错人了，我幸免于祸。后来得知，有造反派找副部长熊复交代“刘选”之事。熊复不敢讲，他说：这件事要请示周总理。不久，我们宣传处的史洪向我发难，他署名“卫东彪决死队”写大字报揭发我包庇刘少奇，骂我是刘少奇的徒子徒孙……“文革”前我和史洪同事多年，相处还可以，他总算笔下留情，大字报上未点我的名。当时部内很乱，大字报很多，这张大字报很快被别的大字报覆盖。大字报上未点我的名，我没有吭声，躲过了一劫！

1967年1月4日，“文革”中中央任命的中宣部部长陶铸同志被打倒。社会上成立了“批陶联委会”、“斗陶筹备处”两大造反组织，矛头直指陶铸同志。全国各地的各派造反组织纷纷冲进中宣部大楼，占领办公室，设立造反联络站。我的办公室在一个夜里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跳窗而入占领了。第二天一早我到办公室，看见一群男女，横七竖八倒在办公桌、椅上呼呼睡觉，我火冒三丈，和他们发生冲突，我抬出毛主席的指示——“解放小鬼”来保护自己，经过辩论，他们撤退了。我感到办公室很不安全，立即把自己的文件、书报等材料运回家中。刘少奇文稿等锁在木质书柜里很不安全，这不是我私人的东西，不能转移到家中，我和处里管机要文件的闫启华同志商量，提出寄存在她的机要室里。当时机要室门上贴了“机要重地　不得冲入”的告示，比较安

全。得到了闫启华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刘少奇文稿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心里踏实了。

“批刘”声势越来越猛。当时部内已分成两派，史洪鼓动一派的工人来抢这批文稿，未成。史洪得知文稿已不在我手中，他又生一计，写信给“中央文革”，告我包庇刘少奇，还牵连到闫启华同志。

记得在“中央文革”的穆欣来封档案之前，大概是 1967 年 4 月的一天傍晚，“中央文革” 派来了三个穿军装的人，为首的就是杨永志。早听说杨永志是“中央文革”关锋手下的红人。他通过部里的两派组织把我和闫启华叫到沙滩院内原中宣部的教育楼，杨永志一面训斥我们两人，一面拿出“中央文革”戚本禹的批示。批在“中央文革”的一份来信摘登上，上面登的是中宣部史洪的来信摘要，内容大致如下：中宣部史洪来信，揭发马懋如、闫启华包庇刘少奇，私藏刘少奇的文稿等黑材料，至今不揭发、不批判，请“中央文革”勒令她们交出，交给中宣部的造反派批判，等等。戚本禹批示：派杨永志接管。杨永志为首的三个军人和两派头头押我们两人到办公大楼交材料。杨永志一路走一路批我们，他很凶，也很得意。拿材料时，我和闫启华提出登记一下，办个手续，即请他签名，留个凭据，他说：没有必要，已有领导批示。戚本禹的批示他没有留下。当时杨永志还强行拿走了闫启华同志柜子里的一卷宗文件和王宗一同志冤死前记录的一些笔记本和文件，我和闫启华同志说，这些材料“中央文革”没有批示，你不能拿走，他不听；阻止无效，我们请他写个收据，他不写。当时杨永志还要我说出参加编“刘选”的人，我说不清楚；他还强令我将已经发出去的有关“刘选”的材料收回，交给关锋的妻子周英。我说无法收回。他威胁我说，你不要这么厉害，造反派已抓住你的把柄了，你必须收回上交。后来我找到了一本“注释稿”，可能是从王宗一的遗物中发现的，也可能是从缪楚璜同志那里收回的。当时我有一个想法，这些材料在谁手中都不好办，不如上交。我将找到的一本“注释稿”密封，请《红旗》杂志社的孙洁人转交给周英。周英当时是《红旗》“文革”的负责人，很红，我和她不相识也找不到她。

就这样，已经编好，未经本人审阅，尚未出版的《刘少奇选集》的全部文稿和“注释稿”以及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名单等材料，全部被“四人帮”弄走了，成了批判、打倒刘少奇和中宣部的重磅炸弹，成了有关同志受害的重要“罪证”。

杨永志强行拿走的一卷宗文件，内容我不清楚；王宗一同志的笔记本，是他在中宣部工作多年的记录，其中有一本记载的是“文革”，对研究党史、研究“文革”、研究宗一同志之死很有价值。宗一的夫人史葳同志曾询问过那些材料的下落。我在 2006 年第 4 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王宗一冤案四十年祭》一文提过此事，未点杨永志的名，希望他能反思，能把材料交出来。杨永志强行拿走的后两部分材料，并非执行上级命令，他是无法推卸责任的。

还有一件事，需要说一下：闫启华同志 2007 年去世，她生前曾保管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未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些材料，“文革”中打砸抢很厉害，她怕丢失，当时杨永志是作为“中央文革”的钦差大臣来的，闫启华同志请杨永志代向中央请示，有关“毛选”的材料如何保管？这批材料也被杨永志拿走了，他不肯写收条。

后来，中宣部的人员被军事管制了，我们被赶到宁夏“五·七”干校，斗、批、改、劳动四年。后来，因《刘少奇选集》文稿的事我多次差点挨整，但都因为同志们——如张镜明同志（曾任张子意副部长的秘书）、苏一萍同志（文革前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等的相助而幸免于祸。在这里向“文革”中所有帮助过我的同志们补说一声谢谢！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粉碎，“中央文革”倒台。刘少奇文稿等材料哪里去了，落到了何人之手？在我心里翻腾起来。当时刘少奇案、阎王殿案、王宗一案尚未平反，经反复思考，我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如实报告了这件事。没有得到回音，我觉得该做的事已经做了，心里也就踏实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十年浩劫，不堪回首，当事人已逐渐离去，留下的人不多了，我也老了。我们经历了“文革”的人，有生之年，有责任把那段历史如实记录下来，为研究“文革”，总结“文革”的教训，做一点事。也希望跟随“四人帮”做了坏事的人，能够反思，总结教训，做一点补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

○ 白而强

“文革”中震惊全国的“‘五·一三’冲击三军演出事件”，我是策划者之一，后来还被说成是“现场指挥”。近年来看到一些作品所涉及的“五·一三”事件提供了一些新史料和新观点，给我以很大启迪。尽管往事正在湮灭，记忆已在衰退，但是能从个人角度写出我对这一事件的残留回忆，或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提请当年的“亲历者”补充、校正，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

一、“五·一三”前的海政两派

“文革”时我是海军军乐队队员，是海政文艺单位最早的“东方红革命造反队”的头头。后来机关干部也纷纷成立群众组织，与我们同观点的一派在海军大院中被称为“红流”派。

军队里的“造反派”基本上是步地方大中学校运动形势发展步骤的后尘而发展起来的。当军内单位起来造反的时候，地方院校里最早起来“破四旧”的“联动”和最先接受工作组领导组成“文革”领导小组、后来又保工作组的以所谓“红五类”为主的学生组织都已经被“中央文革”点名压了下去，所以尽管军内文艺体育单位最早起来“造反”的某些成员家庭、社会背景甚至思潮都与地方的“联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当时的社会大形势和我们面对的与军队管理体制的矛盾等因素，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再重蹈“联动”覆辙，而只能投身于最“时尚”的“造反”大潮，并逐渐与当时最受“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走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军内最早起来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造反派”组织就逐渐接受了“中央文革”的极“左”思潮，并在“毛主席号召我前进”的思想指导下与“中央文革”支持的群众组织（如“首都三司”等）联合到了一起，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

所以，当1966年10月2日颁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否定军队的特殊化，容许军队参加“文革”的时候，我们这一派最先表示热烈拥护；1967年1月28日“不许这、不准那”的“军委八条”发布时，最先感受到压制而内心抵触的，也是我们！而当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时，我们又觉得“中央可能决心支持军内造反派”了……

从1966年6月到1967年4月，经过将近一年的造反、压制、沉默、爆发，反复的冲突，我们与北京、外地的一些“造反派”组织都建立并加强了广泛的联系，在全国、全军已经有了越来越大的名声和影响，一时间颇有些“自我感觉良好”。

而对立面组织则抓住“李、王、张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反对李、王、张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旗各自为战——“五·一三”之后形势明朗化，直属机关和文工团的若干群众组织才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海军红色联合造反总部”（时称“红联总”）。

在机关大院里，我们一直处于少数派地位；对立面虽然在外面被我们称为“臭老保”，而在大院里则有来自上上下下，特别是“李、王、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力支持，在领导系统、后勤保障等方面比我们一群毛头小子要占据很大的优势。

就在这种两军对峙的局面下，两派的头面人物都在苦心孤诣、挖空心思地寻找着打破僵局、夺取控制权的时机。

我们当时全部活动的中心，就是要争取让“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了解军内“文革”的“真实情况”，从而支持我们的造反，否定对立面的“保皇”行为，以保证“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永远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进入5月之后，双方的直接对立公开冲突暂

时沉寂，几乎占了些上风的我们借机组织了一个文艺演出队，到各个“造反派战友单位”去演出，对“战友”表示支持并借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对立面组织在各军兵种党委庇护下也在巩固阵地、整顿队伍、悄悄串联起来搞一些小型演出活动、寻找翻盘的机会。

双方都在积聚着随时可能爆发“决战”的力量……

二、我们的对立面头头郑季信的回忆

“‘五·一三’就是我策划的。没有我就没有‘五·一三’！”——当年的对头、现在的朋友郑季信在电话里对我说。

当时我们已经是少数派——我当头的“拼到底革命造反队”（后来成为“海政文工团红色联合造反舰队”的“旗舰”）当时只剩下7个人。有一天就在我家里，在场的有我、李萌茹、林丁丁、高育发、高象柱，我就提出来，快到5月了，我们可以以“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名义组织个文艺演出。大家就同意了，决定去联系其他军兵种文工团。李萌茹、张云星先联系军艺，被人家打了出来；又去工程兵文工团，又被打了出来。然后他们去找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当时他们也属于少数派，处境很困难，就同意了。接着又联系了4510（卫戍区）和北空。他们都同意联合演出。就这样最早由五个文工团决定联合演出——“纪念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我们商量演出节目，选定肖华的长征组歌，演出场地联系了北京展览馆。

我们开始组织排练以后，就传来消息说有人要来冲。我说好啊，他们敢来冲“纪念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演出，我们就好反击了！

为此，我们让张云星和空军的一个人去找总政领导汇报这个动态。他们找了（文化部副部长）李伟，李伟又转推给肖华。

当时肖华的指示是“你们也不要演，他们也不要冲”。

我们认为这简直是胡说——我们不演了他们冲什么？这不是明摆着压制我们吗？所以后来5月22日在大会堂周总理接见三军时（肖华、余立金、张秀川等领导在场），我还把肖华这个表态当面向总理告了状！

“五·一三”当天，军区郑维山，空军吴法宪、余立金，海军……都到了现场。

总后没有文工团，没参加演出，所以邱会作没去。

冲了以后，陈伯达在北京展览馆说：“也可能二十年后是一场噩梦。”

……

三、关于“五·一三”的笔记

我保存至今的一本1970年笔记本（在“牛棚”里“交代罪行、自我批判”的笔记）记载了1967年4月底、5月初我所参与的一些主要活动——

4月15日、17日，军艺开会，文体单位“受死”，京西宾馆反映王玉兰、李炳丽主持。

4月16日，三座门夺权见肖华、关峰。事先在中国京剧院见戚本禹去中央音院送传单知戚消息，晚上人大会堂首长接见。

4月17日，大院贴反对打砸抢标语。

同期组织演出队开始演出，陈得牛等支持。

4月底或3月初曾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会，舒小摸通知工农兵文艺公社打仗退出。

4月成立批刘联络站，高正路负责。

4月底知文艺公社请三军联演，和郑邦炎、郑国培去拆台。

4月下旬曾几次和郑去三座门找丁（负责文体单位）不成。

5月1日，在颐和园演出。

5月4日，在高院、北邮、科影、友谊宾馆、政治学院等地演出，半夜闹事。

5月上旬，演出为主。

5月11日，知演出事，策划冲击，告郑，去总歌，回，大院发像章大会，捣乱。

5月12日，政治学院大会，斗罗、去送旗。

5月13日，上午写大字报，中午去后勤，黄磊，郑邦炎，二炮，下午贴大字报，晚冲击。

5月14日，晨，伯达、富治等首长在北展，肖华、王力也去……

回大院，晚逃出。去总歌，到团校，窜军艺。

……

上述文字可以证明：

1.三军的“联合演出”在4月底已经开始；

2.我知道“文艺公社”请三军联合演出的消息后就立即和郑邦炎、郑国培去拆台；

3.三军要在北展演出这件事我是5月11日上午才知道，并立即与郑邦炎等策划聚集那些平时联系较多的军队文体单位造反派去冲击；

4. 在决定冲击演出前后，我不知道有任何人曾与“上级领导”、“主管部门”或者“中央（全军）文革”联系，也不知道是谁告诉“首都三司”等地方院校群众组织来参加冲击的。

四、“‘五·一三’冲击三军演出”

5月11日上午，知道三军要在北展演出的消息之后，我立即找到海政文工团“思想队”的郑邦炎商量对策。我们认为，一定要阻止三军的联合演出！一定要让中央知道，我们才是反对三军党委、反对三军保守派的“真正造反派”！于是我们俩借了两辆自行车，马上去找总政歌剧团的×××，又分别给平时联系紧密的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头头打电话，煽动他们一起去组织冲击三军演出的“革命活动”。

第二天下午（或傍晚）在海军大院西门外，可能是后勤学院（也可能是总参通讯兵部）的一间屋子里开了一个冲击三军演出的预备会。到会的人都是我们同一派的组织头头。记得有海政的我和郑邦炎、郑国培，北京军区文工团胡××，空军体工队李××、林×，高等军事学院姜××、陈××，总政歌剧团娄××，后勤学院黄×，和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测绘学院及海军护校等一些单位的代表。大家一致同意不惜动用“冲击”的手段阻止三军的演出，决不能让“老保”突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从而争取中央支持的阴谋得逞！当天我们计划了各单位出动人员数量、车辆安排、上车地点和时间，确定了第二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集合的时间。

5月13日这一天，我们都在联系组织晚上出发人员的事。中午和郑邦炎一起到总后勤学院找“星火燎原”的黄×，落实了晚上去北展由他们派车的事（他们在学院里是多数派，后勤保障比我们好，能调动一批汽车）。下午大约五点半，天色还亮，我们就登上三四辆卡车出发了！

到了北京展览馆前，尽管天色渐暗，却还是能看到偌大的北展广场上人头攒动，各色彩旗飘舞，车声、人声交织，广场旁边的通道、剧场前面的大广场、甚至剧场外面通二楼的楼梯上都挤满了来自各个单位的“造反派”！全国闻名的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的大旗一面挨着一面，与军内文艺体育单位、各地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的大旗交集在一起，这很出乎我的意料——这么多单位来了这么多人，肯定不是我们前一天开的小会所能调动来的——我们下车以后，天色灰暗已经看不清彼此的面孔，只能大声叫喊着进行“联系”，谁也不知道这么多人集在一起下一步要干什么，结果只能是大家各自为战，跟着感觉、跟着人群，拼命地往剧场方向挤上去了！

我不知道先进去的人与演员之间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我进去的时候在剧场前厅看见一群人正在追打几个人，其中最容易辨认的是八一体工队的几个大个子。我不大认识这些人，也没和他们打招呼便径直往剧场里面走，一直挤到舞台前，看见舞台上已经是我们的人在挥舞占领中央高地的大旗；乐池里空无一人，一些大型乐器胡乱丢弃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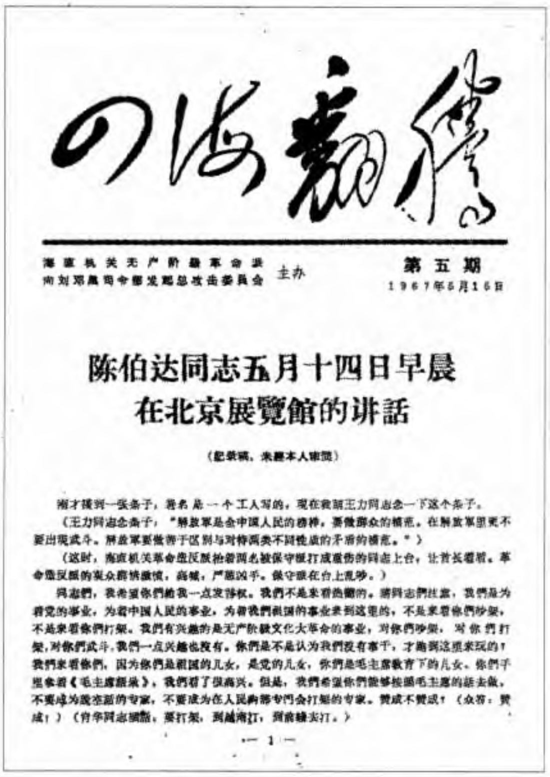
我走上舞台往下看，看见对立派的演员们和一些未走的观众三个一团、五个一伙的拥挤在舞台前乐池边，斜眼看着在舞台上疯狂呼喊的我们，时而也回报以“坚决捍卫×××革命路线”、“宣传×××思想无罪，革命造反有理”的口号，回击我们的冲击……

海政歌剧团高正路回忆说：5月13日下午三四点钟，肖华在军事博物馆二楼礼堂接见军内两派的人员。我是和海工的李××一起去的。会上肖华说了“演的不要演，冲的也不要冲”，听起来有点向着冲派。两派人员当场就争论不休，接见也就拖长了时间。肖华还让工作人员给我们发了果子面包当晚饭。接见完我跟着八一体工队的人从军博直接就去了展览馆。第一次冲上舞台以后，听说三军派已经调集大批人马将我们反围困在剧场里面，如果不立即冲破包围圈，我们就出不去了。于是，我们就赶紧聚集人马冲了出来。后来周总理和杨成武凌晨三点在大会堂接见两派代表，我是跟军艺的车一起去的。

至于我个人，现在已不太记得如何从舞台上下来，如何从剧场出来，也不记得我在这第一次冲击中扮演了什么重要的角色或是做出了什么值得记忆的行为，只记得我们的第一次冲击就以占领舞台、对立面的演出无法继续进行为标志而结束了。

五、第二次冲击

“全面胜利”的我们，挥舞着各自队伍的大旗，冲出了剧场，在混乱的人群中往北展正门前的大广场方向挤去——我们来时乘坐的汽车停在这里。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发生，可能我们的“冲击”就这样宣告“胜利成功”了！



四海翻腾

海直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
向刘邓黑司令部发起总攻击委员会 主办

第五期
1967年5月15日

陈伯达同志五月十四日早晨
在北京展覽館的讲話

（記录稿，未經本人审閱）

刚才接到一张条子，署名是一个工人写的，现在我請王力同志念一下这个条子。

（王力同志念条子：“解放軍是全中国人民的榜样，要做群众的模范。在解放軍里更不要出現武斗。解放軍要做善于区别与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模范。”）

（这时，海直机关革命造反派抬着被保守派打成重伤的同志上台，让首长看看。革命造反派的群众群情激愤，高喊，严惩凶手。保守派在台上乱吵。）

同志們，我希望你們給我一点发言权。我們不是来看热闹的。請同志們注意，我們是为着党的事业，为着中国人民的事业，为着我們祖国的事业来到这里的，不是来看你們吵架，不是来看你們打架。我們有兴趣的是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的事业，对你們吵架，对你們打架，对你們武斗，我們一点兴趣也沒有。你們是不是认为我們沒有事干，才跑到这里来玩的？我們来看你們，因为你們是祖国的儿女，是党的儿女，你們是毛主席教育下的儿女。你們手里拿着《毛主席語录》，我們看了很高兴。但是，我們希望你們能够按照毛主席的話去做，不要成为吵架的专家，不要成为在人民內部专門会打架的专家。贊成不贊成？（众答：贊成！）（肖华同志插話：要打架，到越南打，到前綫去打。）

— 1 —

1967 年 5 月 15 日出版的海直机关造反派小报——《四海翻腾》

我和赵× × 站在舞台最高层合唱台中间，鼓动群众高呼我们要见中央首长的口号。对立面的一些演员则仍然在舞台下面，不时向我们发出几声抗议。但是双方都基本脱离了接触，只是在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后来，从剧场后台传来消息：周总理要在大会堂接见我们双方的代表，让我们派人去。我们几个头头商议了一下，让海政话剧团的石静、军乐队的李希海等人去了大会堂，我们其余的人都在剧场等候消息。

这样对峙到后半夜，外面传来消息：中央首长来了！

我当时正在舞台中央，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大声指挥现场的人群在上场口给中央首长让出一条路来。首长们进来后，我又指挥舞台中间的人给首长们腾出几个座位，安排他们坐下。陈伯达、王力、肖华、谢富治等人均坐在最高一排合唱架上，我坐在下面一排（我的这些活动被人拍了照片，后来发布在三军在全国各地张贴的大宣传海报头条。我也因此被指认为“现场总指挥”）。一些对立面的演员们也聚拢到舞台前面。是陈伯达最先讲话（由王力逐句翻译）：“你们两方面可以暂时不见面，感情很冲动。不见面也好，隔开一个时候，隔开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或者十年再见面，那个时候的想法可能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就会双方握起手来，就会互相抱头痛哭，说是作了一件很错的事。”（引自《四海翻腾》第五期，海直机关× × 派主办，1967 年 5 月 15 日）。当时我的感觉，他的讲话并没有支持我们，当然也没有支持对方。

在停车广场上，我看见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的赵× × ，在我和他谈话的时候，一个人向他报告了一条消息——清华“井冈山”蒯大富转告他：林副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冲击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演出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是支持演出的！林办让我们撤走。现场的大专院校主要组织现在都要撤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林副主席受骗了！我们必须让林副主席了解部队‘文革’的真实情况！”我还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从这个对全北京公开的舞台上退出，回到军队里听从三军党委“落实林副主席指示”，就等于自投罗网。我们必须留在这里继续战斗，争取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直接向中央反映我们的声音！

于是，我们立即鼓动身边的人：“杀回剧场，争取中央首长接见！”

再上舞台时我看见的仍然是我们一派的人们占据着舞台中央的位置。这时，剧场的广播中传出了“林副主席办公室电话指示……”的声音，

在他们讲话并退场以后，天色已亮，我们也退出剧场，乘车回到海军大院了……

据高正路回忆：当晚去大会堂参加周总理接见是陈伯达一行到达剧场以后宣布的，两派的代表分开乘车，在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周总理接见了

双方代表，并批评了冲击演出的行为。海政话剧演员石× 还竭力争辩、大声哭诉，并站起身来想挤到总理身边辩论，结果被警卫人员反按在地毯上，任他使劲挣扎也不撒手，直至拖出礼堂。

这就是我参与“‘五·一三’冲击三军演出事件”的全过程。

六、对“五·一三”事件的几点认识

第一、“五·一三”事件成就了林彪及其集团，这是上了中央文件的历史事实。

现在反过去看，“文革”伊始林彪发觉“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搞垮人”之际，他所作的就是抓紧 “清理门户、扎紧篱笆”——对“企图分庭抗礼”的罗瑞卿，坚决清除！而对老四野的肖华、邱会作则是坚决保护。甚至在北京军区文工团第一次“绑架”肖华之后，林彪竟然近乎失控地发了“文革”中第一次“雷霆万钧”的脾气，将江青叫到毛家湾臭骂一顿，吓得叶群当场下跪。

紧接着他批准的“军委八条”，才是他心里的声音，也是他“文革”中第一次企图以中央文件形式控制大局的努力——任凭风起云涌，他的一亩三分地不容外人染指！

可是 4 月份“军委十条”的发布，将他严守军队阵地的努力又一次冲垮；眼见三军的黄、吴、李、邱在冲击下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可是面对毛发动的造反运动，又不便直接反对，只能坐在自己的屋子里等待时机……直等到 “五·一三”，我们一帮二十多岁的“年轻闯将”给正在瞌睡的他送去了一个枕头——

事先摸到了毛保吴法宪和毛身边的一些演员正在参加三军演出的底牌；

不听从“招呼”，不服从“首长”，竟然配合“中央文革”的意思，将指示演、冲双方“演的不要演，冲的也不要冲”的肖华抛出来，将之斥为“总政阎王殿”的头子，从此打倒；

委派叶群亲临各军兵种机关表示慰问及去医院看望三军伤员；

平时连中央会议都尽量躲着不参加的林，竟然亲自出席观看三军演出……

几步棋的结果是 :三军党委领导从此被标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

北京的“文革”形势从此被牢牢地掌握在军队手中；

“看三军联合演出”成了大批干部“亮相”到“革命路线”一边的最新形式；

一夜间，三军就可以将全北京的大字报大标语全部更换为他们拟定的内容；

由北京再到各军区、舰队、基地……由解放军直接出面发动连续几天的舆论造势，就可以左右全国的形势变化；

“全国看北京，北京看三军，三军看海军，海军看红联总”口号在全国流传；

从此，“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成了“文革”的后方保障，连“中央文革”也不得不“屈尊”听从军队的意见……

由于“亲密战友”直接指挥的军队提供了全国局势稳定的保障，使得毛可以更加放心地去“深化革命”，这就使毛本人对此局面也乐得接受下来（直至林彪“一号命令”的发布引起他再度“大权旁落”的警惕）。

一直只能暗中抵制“文革”的林彪，成了“五·一三”事件的最大赢家！

林彪集团，从此成为一支唯一能与“中央文革”抗衡，令毛也不得不倚重的政治力量。

用叶群后来得意洋洋的表白来说，就是“首长没讲一句话，就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

第二、我在被“专政”一年之后曾经对专案组长说 :我真心感谢将我“专政”起来，使我少犯了很多错误。否则，若当时年仅 23 岁的我成了胜利者，我会比现在“整”我的人想出更多的坏点子整别人，甚至从此一辈子都走上另一条道路……

这句话应该是我当时“冷思考”的结果之一。

“五·一三”事件使我与林彪集团从此“势不两立”——当年夏天我就多次跑遍驻京部队文体单位，专心致力于搜集三军的动态、情报，整理成文，甚至明确写出“林彪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军可能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的秘密报告……

这些活动又导致我成了军内第一个被 “专政”的“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尝受了七年的牛棚之苦……

这些遭遇使我不得不与热血沸腾的文化大

革命“隔离”，不得不开始冷静地观察和思考自己和他人的所作所为；在林彪“一号命令”以后又与一批受迫害的老干部一起被押解“疏散”到湖南冷水滩继续“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得以结识了一些根本不买林彪、“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账的老军人长辈朋友，接受他们的影响……在“林彪事件”后我们被解放出来，在要求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提高自己对“文革”、对极“左”、对体制……的认识，逐渐地在实践中感悟出极“左”思潮对国家、对自己的侵蚀和危害，从而又使我逐渐摆脱了“文化革命”和“中央文革”的极“左”思潮对自己思考习惯、行动习惯甚至整个世界观的影响，逐渐地站到了正确的立场上，并且为后来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比较正确的认识打下了政治基础……

第三、近年来见到网上网下有一些涉及“五·一三”事件的文章，有的说是 1967 年 4 月空政“硬骨头造反团”的刘淑媛和小邵、小李去见毛主席，然后毛的秘书徐业夫到毛家湾找叶群，叶群接见了几个女演员，直接提议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中同一观点的人串联一下搞联合演出，似乎是空政的几个演员首先提出组织“纪念演出”的倡议……

有的则说，“1967 年的元旦刚过”，“来到中南海西门”，得以面见毛泽东，痛斥反动组织“黑旗造反团”，并当场得到毛“找叶群”批示的，是小孟、田大头……

对此，我质疑——

如果真是“小孟、田大头”“1967 年的元旦刚过”就得以面见毛泽东，甚至具体谈到单位“文革”的问题，那其他文章所提及的刘淑媛等就应该是在小孟之后启动的“毛主席—叶群—吴法宪”程序。按当时的“潜规则”，先见伟大领袖者肯定要位居一派甚至一单位之首。而事实却是刘淑媛后来成了“革委会主任”，而“小孟、田大头”却在“五·一三”事件后加入了我们“冲”派的演出队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说法似乎在指向一个至今尚无人提及的事实——毛泽东事先就知道三军要联合演出并且对立面要冲击的消息，然后再指示女文工团员去找叶群……

另外，如果真的是得到叶群指示、吴法宪支持的空政文工团女演员率先去联合其他单位共同演出在先，就轮不到海政“拼到底”的人再去各单位串联；按当时万众拥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实际情况，即使海政的人是“二手”串联，其他单位也不敢公然将人“打出来”。

最具反驳力度的是——如果真是空政的几个女演员通过毛主席—叶群—吴法宪的关系促成了三军联合演出和林彪后来的大力支持，后来影响遍及全国的“老三军”就应该以空军为核心，而轮不到海军政治部“红联总”来充当三军的核心，更不会有“全国看北京，北京看三军，三军看海军，海军看红联总”口号的出现。

不过，如果说她们是在先接受海政的上门串联后再去找毛，从而“促成”演出的实现，则可能有些可信度，但在时间顺序上就必须给予澄清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五·一三”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关于 5 月的演出，周恩来曾明确指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你们联合演出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看”。这一指示是完全合乎毛泽东本来意图的。肖华和“全军文革”向下转达要联合演出的意见也并无不当。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毛的秘书徐业夫出现了——“文革”专家王年一说：“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徐业夫 1967 年 4 月间赴毛家湾，是奉命向叶群面授机宜的。徐业夫平时极少外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如果只是为了向叶群说一句‘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原本是没有必要来到毛家湾的，电话上就完全可以讲清楚。一定要到毛家湾面谈，无疑有其重要性和机密性。找的又是爱惹是生非的叶群而非林彪，这更有特异之处。”

在当时，“林彪、叶群本来没有任何必要同周恩来唱对台戏，除非得到最高方面的授意”。

如此说来，倒是毛本人一边在倡导大联合，另一边又让徐秘书去见叶群授意三军党委支持一派单独搞演出……这样一来，“五·一三”事件的总导演倒是非毛莫属了。

在目前未见当事人出面澄清事实，又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这些“戏剧性”分析只能暂时停滞在此。

（作者为海军政治部文工团乐队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李 晨）

亲历大跃进中的湖北教育革命

○ 刘绪贻 口述 宋雯 赵晓悦 整理

现在回忆，我大约是在1957年8、9月间调到湖北省高等教育局工作的。当时,大跃进的形势正在形成。

大跃进是生产战线的、社会经济建设的大跃进,也就是经济基础的大跃进。文化和教育事业作为上层建筑，需要为经济基础的大跃进服务，因此,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大革命、大跃进也是必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决议中指出,必须"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时的文化革命运动与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不同的),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是文化革命进入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

湖北教育大革命情况

湖北省委文教部确定1958年上半年以开展"双反"(反保守、反浪费)运动为中心工作。高等教育界围绕此中心,正重点研究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问题。1958年1月2日,我参加了高等教育局召开的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座谈会。

1月17日或18日,听了高等教育部刘子载副部长在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他说,几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地看了以后，对高教部说,这几年来学习苏联、院校调整成绩很大,但铺张浪费问题严重；武汉地区揭发出来的问题已很严重,但还要继续揭发,揭发得越彻底越好;看来这个问题要从高等教育部领导思想查起,我们过去办学方针把大学生培养成了大少爷,毕业后不愿到艰苦地方去工作,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要抓勤俭办校，已开展这一工作的学校要总结经验,今后作为经常工作，未开展这一工作的各校领导，都要坚决贯彻勤俭办学的方针。

2月16日，我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文教部在武昌建筑工程学校召开的现场会,听了省委许道琦书记的讲话。他说,反右以来,各校开展了劳动,反对铺张浪费,目前问题是如何把这种热情领导起来,根据建筑工程学校的经验,看来方针就是勤俭办学,但各校的情况不同,不能强求一律;要坚决贯彻这一方针,但不能单从经济观点出发;做法要大胆些,从反浪费起,到勤俭办学,勤工俭学,各校可以自搞一套。

紧接着,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加以引导。在这一运动中，我在省委文教部和高教局的组织下,前往各学校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发现典型。最后,湖北省委发现高教界"浪费"、"保守"情况的确严重,并认为培养出来的学生不红不专是"最大的浪费",对右派分子没有进行更严的打击是"最大的保守"。

5月5日，我参加了湖北省教育工作会议，听了许道琦书记的报告，他根据上段整风的经验，和4月份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要求教育大发展大改革的精神,提出了4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指出湖北省面临一个教育事业大革命的新局面,所以要讨论教育工作上方针、方法、路线上的一些问题,并求得解决;第二,在刚开展的教育"大发展、大普及"方面,湖北省对自己的潜力要有足够的估计;第三,湖北省的勤工俭学在全国不落后，但仍须促进；第四,整风与党的领导问题。

同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订了"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时在宣传中一再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于是，盲目求快就成为普遍现象。这时，我已日益感到我正在参加的教育大革命是违反科学精神的，并对之产生不满情绪，工作上的主动性也有所减弱。

7 月 24 日起，湖北省根据 6 月份中央教育工作会议（这是接着 4 月份的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的）的精神，再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我在会上听了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报告，觉得调子实在太高。他说要在 5 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湖北，具有现代的工业、农业与文教事业。他根据毛泽东最新提法“3 年超英，10 年赶美”，自己却认为“现在看起来 2 年就可以超英，5 年就可以赶美”。高等教育方面，他认为要在“县里面都办综合大学”。这是直到现在我们国家都做不到的事，他却在上世纪 50 年代要求湖北省做到。8 月 2 日，他在会议总结时提出，教育方针必须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认为教育最终发展的方向就是半工半读。在学制问题上，他主张多轨制；在教学改革的问题上，他认为这是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次决战，要拔白旗，否则红旗插不上。关于制订教学大纲与教材的问题，他反对资产阶级专家教授所谓的系统性、科学性、完整性，认为资产阶级专家的科学性乃是指的理论，而资产阶级科学理论基本上是错误的。他认为应在党委领导下，由教师、学生合起来制订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可以先“背对背”，然后再“面对面”，特别要发挥青年教师和学生的作用；教授也可参加，他们可能有正确的东西，否则也可以树立对立面；而学生新编的教材，可能比旧教材好。他认为反右以后，不少的白旗在学生和青年教师中还是偶像，必须打倒；要让“兴无灭资”的斗争在学校取得彻底的胜利。他说党从来是团结知识分子的，但党并不认为少了哪个人，学校就办不下去，要让那些专家不要奇货可居，要揭他们的底，让他们以真面目见人。不过揭底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学校工作一定要实行党的全面领导，一直到年级和班，可以适当地发展党员。

以上这些主张、这些口号，过去也陆续提出过，王任重的这次讲话则把它们系统化了。从此以后，湖北省的教育革命虽然在 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以后，1959 年 7、8 月庐山会议前有过相当的纠偏活动，但总的趋势是大张旗鼓地、根据不足甚至没有根据地开展起来，直到 1960 年 9 月，湖北省的高等教育工作，大都是根据这次讲话的精神进行的。

湖北教育大革命反思

我到湖北省高等教育行政界的头三年，实际上就是参加了湖北省的教育大革命。对当时教育革命的做法、甚至有些提法，我认为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违反常识的；对国计民生是有害无益的。

比如，关于教育方针的问题。第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提法，并不全面，因为当时中国除了无产阶级之外，还有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如果教育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然不全面。但当时我没有质疑，更不敢公开地提出怀疑。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提法，我是同意的。我在留美期间，感到美国的科技之所以如此发达，就是知识分子“手脑并用”，而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只用脑不用手，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然科学发展不够。有鉴于此，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做到手脑并用，这一点我和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问题在于，结合有个方法的问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要使两者具有内在联系，寓教育于生产劳动，寓生产劳动于教育，而不能以生产劳动代替教育。但因当时党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特别强调速度，大家也就急于求成，或者只是增加一些不能寓教育于其中的劳动课，或者就尽量增加劳动时间，使之大大超过教学时间，造成以生产劳动代替教育的恶果。从全国来说，“据 20 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到了 1958 年 10 月，有 397 所高等学校共办工厂 7240 个，13000 多所中专、中学共办工厂 144000 个，有 22100 所学校建起小型炼铁炉、炼钢炉 86000 多座。这样，一些地方的学生和教师成了单纯的劳动力，原有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被搁置一边，用生产代替了学习，严重地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网易博客，老黄牛的日志：“1958 年教育革命中的失误和教训”）

湖北省的情况也是如此。在 1958 年 1 月 2

日的大专院校座谈会上，华中农学院林镇南提出，今后学制要改为双轨制，一年级上学期搞农学操作（秋收冬播），二年级上学期至三年级上学期每人种半亩田，三年级下学期至四年级上学期每人种一亩二分地，四年级下学期至五年级上学期要下乡劳动，培养劳动人民感情和独立工作能力。1958 年 2 月 27 日，测绘学院汇报的"双反"打算中提到，不仅行政上要与生产结合，如事务科有车，就要到市内去搞运输，教学方面也是如此，比如制图系自己印刷图纸、测量系去包工。学校共有 95 亩地，也都划分给各单位耕种，预备当年的蔬菜自给达到 50%。从这两校的事例中反映出，虽然名义上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实际情况是生产劳动已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教育，学校变成了工厂、商店，而不是办教育的学校。这是舍本逐末，只能产生"白卷英雄"张铁生，不能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关于教育大发展的问题。既然我们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么随着经济的大发展，教育也应该有大的发展，否则，它就不能为已经大发展的经济基础服务，问题是怎样把握发展的程度。当时湖北省的教育大发展是在"三面红旗"的指导下开展的，甚至可以说，教育大发展是"三面红旗"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三面红旗"特别是"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在教育大发展中都有所体现。在 1958 年 7、8 月间湖北省的教育工作会议上，王任重曾提到，到 1962 年，我国的大学生人数要达到 150 万至 200 万，而在当时只有 40 几万！他还讲："武汉地区学校究竟是发展呢？还是维持呢？我认为，先要发展，将来像母鸡下蛋一样向外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县县有大学，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乡乡有大学。"这是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的事，当时提出这种大发展的远景规划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违反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的；当时湖北省的教师人数、生源以及一切所需的教育硬件软件等，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因此，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我不得不为这种高等教育的盲目大发展，做了一些我其实并不认同的事情，但只要环境许可，我也曾消极怠工。比如，1958 年 12 月至 1959 年 1 月，我跟随省委许道琦书记下襄阳地区调查研究，在总结当地红专大学的办学经验时，我觉得成熟的典型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一篇总结也没有写。幸好许书记也不强求。我跟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下襄阳地区调查研究时，也一样交了白卷。

关于高等教育大改革的问题。1958 年 8 月 2 日，王任重在湖北省教育工作总结会议上说，教育改革是否完成标准有三条，一是方针是否贯彻，二是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改变（原是好的就改良，原是坏的就革命），三是教学方法是否改变了（要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教育方针是否贯彻，这就牵涉到党的领导问题，毛泽东认为，教育必须由党来领导才能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怀疑，现在也认可。但是现在我们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看问题、研究问题，党领导教育的结果如何呢？所谓党领导教育，具体而言，就是全国的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所有学校的各种机构的领导职务，都由党员担任。他们紧跟毛泽东，以破除迷信的名义，否定古今中外所有伟大教育家对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各种有价值的界定和理论，一切都听党也就是毛泽东的。谁敢不乖乖地服从，就被当做"白旗"拔掉，或被批判和处罚，甚至戴上反党、反毛主席的可怕帽子，影响家人戚友。在这种领导体制下，当然很难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和合格的现代公民。与此同时，在这种领导体制下，领导教育的党员们，或者由于水平低，不能正确而全面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政策，或者由于想充分表现自己紧跟毛泽东的热情，竞相扩大和提高本已过高的毛泽东对教育大革命的各种要求的标准，这就打乱、破坏、甚至消除了教育的正常社会功能，扭曲了教育的性质和意义。我认为，这是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那场教育大革命酿造出的一个真正的悲剧。

关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的改革，王任重主张大改，并希望在半年内完成。他说，不要怕资产阶级专家说我们破坏了教学大纲、教材的系统性、科学性、完整性。他们所谓的系统性就是厚古薄今的借口；科学性乃是指的理论，而资产阶级科学理论基本上是错误的；所谓完整性是把那些无用的、重复的东西乱讲一顿。

怎样改？一方面他要求在党的领导下，由教

师、学生合起来制订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另一方面又强调特别要发挥青年教师和学生的作用,教授也可参加,否则也可以树立对立面。而学生新编的教材,可能比旧教材好。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虽然武汉大学的刘仰峤跟着王任重硬说学生编的讲义比教师编的好,但是华中工学院反映,学生编的讲义教师不愿意讲,学生也不愿意听。华中工学院党委一查,原来学生编的讲义大部分都有问题。

王任重还紧跟毛泽东说,我们新老干部、工农、小知识分子要站起来,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在我们思想精神上的压力推翻,要有一种大无畏精神,不怕天地鬼神(包括洋鬼子),也不怕马克思;我们新老干部、工农、小知识分子不仅要在经济、政治上做主,而且要在思想文化上做主。我认为王任重说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在我们精神上的压力推翻,这是好事,但是这样过分夸大自己的能量,也必然会引起青年学生的狂思妄想。比如 1958 年武汉大学物理系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学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学体系。这不太荒唐吗?

关于教学方法要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实践的结果,由于急于求成,大都没有做到水乳交融的联系,只有生搬硬套的联系。比如"三结合"问题,它不是有机的结合,它搞的是上午搞劳动,下午搞教学,晚上搞科研,机械地把它们分开了。

最后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传统知识分子"三脱离"现象确实存在,也确实需要予以帮助和改造,但是绝对否定他们是不对的。而在教育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明显出了偏差。一是对于真正有学问的人,却说他们走的是白专道路,就拔他们的白旗,比如蜚声国际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就曾被当做白旗拔掉过。二是揭老知识分子的底,剥他们的两张皮,"红"皮和"专"皮。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因为不同于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反动言论,并被错划成右派,然而事实证明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华中农学院有一位植物学的教授,在被剥"专"皮时,学生们说他曾说花生是长在树上的;武汉大学的邱毅教授所编的讲义中,学生说有 70 多处错误。这都令人难以置信。三是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彻底决裂,王任重在教育工作会议上讲,"反右以后,不少白旗在学生和青年教师中还是偶像,这必须打倒。因为不拔白旗,红旗就插不上。我们要使兴无灭资斗争在学校取得彻底胜利。"省委宣传部罗明副部长也说过:"一定要做到把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拉下来,这是解决领导权的问题。"这些过"左"做法,不仅伤了许多真正学者的感情,侮辱了他们的人格,还浪费了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时间和精力。■

(作者为武汉大学老教授、美国史专家)

(责任编辑 洪振快)

(上接 58 页)地痞流氓、瘪三很多,帮会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很大,这些势力的残余和影响是不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请你们注意研究一下。我对他说起 1940 年延安时期给我平反冤案的事,刚想对他说感谢的话,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可见冤假错案任何时候都有啊!就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使人再也说不出感谢他的话来。(王伯惠《挽救我政治生命的领导人——深切怀念胡耀邦同志》,《理论导刊》2007 年第 8 期)

我认为对"四人帮"一伙的批判清算,和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试想"两个凡是"的思想、理论、政策的概括,是否也反映了封建文化、思想、理论、法制、体制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呢?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作用,这已是全党全民的共识。遗憾的是,这一讨论本应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深入下去,本应唤起中国人民时时刻刻用解放思想的思想方法关注我国的一切重大事件,可惜这一效果还不太明显。如果事实如此,那就应该承认,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有很大的不足,中国人民求真务实继续前进,还需进一步打破思想禁锢,解放思想;对起到破坏、消极作用的封建糟粕的传统文化,还需进行深刻认识;这样,才有助于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行下去。■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彭德怀和毛泽东对民主的不同看法

○　何　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争取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由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下，挺进敌后，在英勇杀敌的同时，既关心基本群众的疾苦又团结各阶层的抗日爱国人士，用民主的概念进行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使八路军能迅速立足于敌人的腹心而驰誉全国。

由苏区根据地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共产党人思想上的一个转折，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1940 年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关于苏维埃时期的许多政策，都不应再引用。尤其是苏维埃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革命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政策，例如……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消灭富农（分坏田）、与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消灭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政权中共产党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在过去也是错误的。"

如何纠正过左的错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内容是什么？1941 年 5 月 26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阐释说：

从来的革命运动都是人民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要民众、给不给民众的民主自由，对于英勇斗争中的中国，民主始终是团结与进步的基本，因为离开了民主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民主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的要看人民的政权、人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

这是为什么边区施政纲领明确的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责成当选为行政人员的共产党员应坚持执行之，并指出："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

……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对犯过错误而愿走向光明的分子采取宽大的态度，禁止不经过法定手续来逮捕、审问、处罚任何人，反对把人拖到卑鄙无耻的道路上去，用这些事实来使得人权得到充分的保证……

仅政府明令保护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够的，公务人员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还是不够的，必须人民自由珍贵这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才能获得的权利，要求它在边区得到切实的保障，并把它推到全国的范围里去。

（摘自山西档案馆）

接着，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议员谢觉哉提出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草案，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接着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制定了自己的《保障人权条例》。

这个时候，朱德总司令和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均已奉调回延安，彭德怀先是兼任、后正式担任北方局书记。这样，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重任，都落在彭德怀的身上，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42 年 12 月 18 日，彭德怀在太行区军队营级以上、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上做了一次报告，就如何坚持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谈了七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就"1943 年要贯彻民

晋察冀边区选民参加选举大会

主政治的精神与实质的教育”谈了几点：

第一点说，“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和要求，毫无疑义是和平建国与民主自由”，“战后谁个要喊‘老子要内战’或‘老子要独裁’，都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和唾弃。”“今天中国的民主，是要求国内阶级平等，要求一切被压迫阶级取得他自己主人翁应得的权利。”彭德怀在讲话中批评少数指挥员“把勤务员看做仆从……就是不民主的等级观念”等等。

第二点，“我们在敌后推行‘三三’(指根据地的民意、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进步群众、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是阶级平等的民主政治的实质”。说“今天我们党内还有不少同志缺乏真正的民主精神，还存在或多或少的封建等级观念、家长制、宗派主义等，没有民主生活的习惯，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讲视若无睹……”提出要“在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治作为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雏形”。

第三点说，“我们决心在党内和政府中推行民主教育，把推行民主教育与党内整顿三风密切联系起来。”“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因为中国人民素来没有民主习惯……”

接着彭德怀要求，“各战略区主要负责干部应该利用多种集会，讲解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把民主运用到广大群众中去，创造模范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到最后胜利。”

彭德怀报告后，《新华日报》华北版于1943年3月19日发表了其中关于民主教育的内容。文稿由总部秘书韩进根据彭德怀的报告，又按彭德怀的要求“增加点理论性”拟成。文章全文如下：

彭德怀谈民主教育

本报专访：十八集团军彭副总司令，前在中共太行分局某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对文化教育问题中关于民主教育有所论列。记者以民主教育问题，为目前各地教育界最关心问题之一，因此晋谒彭副总司令，叩询该项演说内容，当蒙接见，并对民主教育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文化教育主要的是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说来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习惯的教育，就是一切抗日人民及劳苦大众，从封建重压之下解放出来的教育，同时，在今天中国说来，又是抗日教育的一部分，目前敌人正在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为它统治殖民地的工具，因之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就是为了抗日，为了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奴化教育阴谋的。所以我们今天提倡民主教育乃是有着深刻的抗日与反封建的现实意义的。

这里要说明几个原则问题，即民主精神、民主作风、民主实质、民主制度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应有明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对广大群众进行民主教育，就无法去推动民主运动。什么是民主精神呢？简单地说来，民主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一致主张的。所谓自由，包括以下的几个要点：

一、每个人民应有思想上的自由。只有这种思想自由，才能促进文化与科学的发展。

二、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应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因为言论出版乃是表达思想的工具。

三、人民应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这种自由，可以增进人类的互助团结，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

四、人民有居住、迁徙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这些自由不应受到任何干涉。

五、在目前华北敌后农村情况说来，许多地方的农民处在半农奴状态，许多地方的工人和学徒，还受到封建习惯的束缚。他们的自由都受到损害的，在多数青年中，抗日自由有时受到顽固家长的阻碍，妇女则一般受到婚姻不自由的痛

苦。这些，在我们的民主教育中都必须联系到的。

所谓平等，在目前是政治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也就是说不分阶段、不分性别，不分民族、不分职业，在政治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根据这一了解，平等应该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一、人民在政治上，有同样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罢免权、复决权、创制权，以及对国家政府提出批评建议之权。人民这些权利，都是一律平等的。

二、人民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封建时代尚且有这种要求平等的呼声，在我们民主运动中更应注意及此，从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的规定。

三、人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目前残存的封建宗法观点，如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都对民众灌输一种尊卑观念，这就是不平等。我们要求人格上的平等，这就是说，对于每一个人的人格应当尊重。这种互相尊重的精神，就是平等精神。

四、在目前华北敌后农村情况说来，不平等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男女不平等，就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压迫贫民，师傅打徒弟、父亲打儿子、丈夫打老婆，有些军官打士兵，这都是不平等，这都是封建观点在作怪。在我们进行民主教育时，也是必须联系到的。

所谓博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剥削制度下，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心理，这是谈不上什么博爱的。但在被剥削阶级，被压迫的中国民族之间，则又要求有高度的博爱精神，这种博爱精神是可以巩固团结，增加抗战力量，使绝对多数人民更加奋发向上的，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人家的痛苦看成自己的快乐，对人有高度的同情心，这些都是博爱精神，也就是民主精神。

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就是民主精神，但是真正的彻底的自由、平等、博爱，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才能实现。那时候人民才真正是完全自由的，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平等，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仇恨心理，而真正是博爱的。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今天主要是反对封建重压下的不自由、不平等，没有博爱的现象，而我们共产党人讲来，就须以身作则，首先做起。

把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作风，用在日常工作中与日常生活中，这就是我们的民主作风。把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体现在群众斗争中，使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实际利益，这就是民主的实质。西欧各国过去的民主运动，是由这一类民主要求汇集起来而成为一个巨潮的，在西欧各国民主运动历史上，都是由工人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市民要求减轻捐税等，这些“小事情”开始的。在我们的根据地说来，使广大群众的自由不受限制，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民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在经济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也就是民主实质。所以民主实质，体现在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法令等等当中。

如果把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和民主运动分开来，这就是抽象地去了解民主，当然不会了解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联系，更不会了解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实质。

根据上述精神，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

陕甘宁边区选民参加普选

保障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使之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中，又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区分。三三制政权，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民主制度，但这并不是民主运动的全部。把民主运动看做只是三三制民主制度，甚至只看做民主制度里面的政治制度，这都是狭隘的看法。用这种看法来了解中共北方局一九四三年强调对于民主运动的号召，当然是不深刻的，也不会真正在工作中收到成效的。

关于民主教育，我只说这一点，但这决不是说民主运动只是教育工作范围里面的事情，贯彻民主精神与实质是广大群众运动的斗争过程，没有普遍的、深入的群众运动，就不会有广泛的民主运动，没有真正民主精神与实质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也就不会有真正深入的群众运动。在教育中要贯彻民主运动的精神，从思想上建立起民主精神，使之贯彻到其他工作中，特别是群众运动中去。

其次，在文化教育上，目前必须进行科学的启蒙教育，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老口号，但在今日仍未失掉其积极的战斗意义。主要在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在方式上则要求大众化、民族化。

彭德怀的文章发表后，过了两个多月，毛泽东在延安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对彭德怀这篇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提出了批评，全文如下：

德怀同志：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力，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力，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之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亦不合事实等。你前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六月六日

毛泽东在信中批评彭德怀“不以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抗日的”。其实，这一点在彭德怀文章的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地讲过了。文章中罗列的关于自由的几个要点，每一点都说明对“人民”而不是敌人的。

彭德怀没有对毛泽东的批评做答复。

但接着，延安《解放日报》在 6 月 14 日纪念第二届联合国日的一篇题名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的社论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政治代表们企图提倡法西斯主义以毒害我民族的时候，为了使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我国文化界就有一个极其严重的任务。但是如果那样设想，以为当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的是为着反封建，就会走上另一极端，犯另一种错误。当前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乃是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时一刻忽视或忘却了这个现实，就是不对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民主教育，主要的应是为着动员人民争取抗战胜利，而不是为着反封建。我们这里所说的民主教育，乃是具体的、适合中国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今后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需要的那种

1945 年彭德怀和毛泽东在一起

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了解为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应知这种民主教育，不应成为一般地反封建的教育，而只应为了抗日的目的成为一般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特殊地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否则，我们的教育就脱离现实，脱离当前的战争任务。其次，应该把这种教育，安放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的基本上，而不应把这种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词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爱、文化与科学的发展等）的基础上。在这里，我们也应紧紧地记着：民主与抗战是不可分离的，将来与现在是不可分离的。

这一段社论所批判的，明眼人一看便知。《新华日报》东北版的编辑虑及这一段从延安发出的对前方统帅的批评对我方不利，在转载时删去了其中明显针对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几句。这加重了毛泽东的不满。在 1944 年华北座谈会上批判彭德怀各种“错误”时，有人便重提这个“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问题，说彭德怀提倡的“实为旧民主”，“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相违背”。甚至说，彭德怀的谈话从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出发是“投降主义”，“未从新民主主义实际需要出发”，“实际打击了毛主席整风的实事求是思想”，是“从局部有过火斗争的情况出发”……

1959 年 7 月，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直陈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之失而被批判。毛泽东在讲话中再算旧账，把彭德怀的“民主教育谈话”又提出来批了一遍。据时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所著《庐山会议》记载，毛泽东 1959 年 8 月 1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批彭的这一段谈话如下：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许多学说、政党、阶级斗争、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站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处理工作就难了。

韩进（抗战时在华北局工作，做过彭德怀的秘书）跟你写一通，是封建主义思想，用你的名义发表申明。讲统一战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讲自由、平等、博爱，教育宗旨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旧社会流行的成语，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不同，哪有什么同罪？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忽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己所不欲，忽施于人”？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相互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对民族资产阶级亦是如此。公开讲有条件，给定息，让做事。罗隆基听不进去，发火了，1957 年发了“五·一”整风指示，“梁上君子，皮已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有制五皮不存，统统灭亡，已灭三张，剩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正在灭亡；经过合作化，三大改造，剩下不多了。皮已不存。知识分子靠那五张皮吃饭，毛乱飞，到梁上变君子，栽秧一样栽毛，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天天梁上君子，听过之后，右派猖狂进攻。说未打招呼，我是多次打了招呼啊。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在过去工作中的许多讲话被透露给红卫兵组织，作为批判的材料，其

中抗日战争时期共 23 份，有 4 篇被列为大 “毒草”，其中即有“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红卫兵在这篇文章前加的按语如下：

按语：伟大的历史文件“5·16 通知”中指出：“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党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主持的华北根据地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不经过党中央的同意，擅自发表讲话，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 “自由、平等、博爱”，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忽施于人”的反动观点，在中国人民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中，他用这一套来愚弄群众，他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同他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现将他在 1941～1943 年的几篇讲话拿出来示众，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他批倒批臭，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批斗彭德怀联络站

1967 年 8 月 21 日

红卫兵的批语，可使人增加一点对那个可悲时代的了解。

彭德怀在被罢官以后，对自己被批判的不实的罪行，进行过不屈的申诉。但对“民主教育的谈话”没有申辩，而是一再检讨。他自觉理论修养不高。但从他关于民主教育演讲的原本看，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权建设的阐述和实施并无违背之处。他的发挥是，要民主建政，必须进行民主教育，即民主的启蒙，因为他在敌后根据地，驻地相对固定，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更深入、全面，深感封建传统对底层人民思想束缚之深和敌人利用群众的封建观念实行奴化教育之害，而毛泽东说民主是为了反法西斯，是从整个战争全局来看的。

至于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民主，今天它的价值已为国人认识、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已写入宪法；“己所不欲，忽施于人”也成为举世公认的金言。

回顾 60 多年前的这一场是非，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的社会确实在进步，中国人民的思想确实在解放；但同时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彭德怀在 60 多年前提出的要进行民主建政，必须进行民主教育这一命题，今天犹未过时。■

（作者为《彭德怀全传》编写组成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介绍

1998 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是从《炎黄春秋》1991 年创刊至 1995 年计 45 期 650 万字中精心筛选出的重点文章 150 万字，编辑为五卷珍藏本，分别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该珍藏本出版后一度脱销。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精品书系五卷珍藏本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售罄之不足。

由于数量有限，恕不分卷出售，欲购从速。定价 125 元，另加邮资 12 元。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45，联系电话：010- 68532048，传真：010- 68532569.

北平和平解放幕后的苏联身影

○ 徐元宫

有关 1949 年 1 月底傅作义将军在古都北平率部和平起义的来龙去脉，国内已经有很多的回忆录、专著和文章都作了翔实的介绍和叙述，这些著述中都提及了当时的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和对敌策反工作，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及了促成傅作义将军下定决心举行和平起义的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所作的耐心细致的劝说工作和联络工作。有关傅冬菊在傅作义和平起义过程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的比较权威的评价，应当是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发表于 1979 年 1 月 24 日《人民日报》上的《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怀念刘仁同志》一文中的阐述：

"……在我军迅速完成对平津的分割包围，特别是新保安战役全歼敌嫡系三十五军之后，北平敌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北平地下党抓住时机，利用一些上层关系做工作，特别是让我地下党员、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同志，对她爸爸分析形势，宣传政策，晓以利害，指明出路，促其派出代表同我地下党直接联系，解决谈判问题……地下党通过傅作义将军的亲属包括他的女儿傅冬同志，随时了解傅的动态，几乎每天都向我前线司令部作报告。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月三十一日，我军入城，北平和平解放，使这座驰名中外的文化古城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里，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成为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范例。"

苏联驻天津总领事亚历山大·季托夫其人

聂荣臻元帅文章中所说的"傅冬同志"，就是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傅冬" 是她的笔名，因为她当时正在天津《大公报》任记者和编辑。有关傅冬菊利用其傅作义将军的女儿这一特殊身份以及报社记者兼编辑这一职业身份作掩护劝说自己的父亲站到人民一边的细节，已多有著述作了回忆和介绍，本文所介绍的则是在这一过程中傅冬菊与当时苏联驻天津总领事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季托夫秘密交往并受其影响的鲜为人知的一幕。

季托夫曾经于 1939 年 6 月至 1942 年 4 月第一次来华工作，当时他作为一名技术工作人员在重庆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工作了将近三年时间。1945 年 10 月，他第二次来华工作，此次到重庆他已经是苏联驻华大使馆的随员级外交官了。1946 年 1 月他从重庆前往北平，到刚刚开设的苏联大使馆北平代表处工作，很快北平代表处就升格为北平总领事馆，他在北平总领事馆担任秘书级外交官。1948 年 1 月初，他被调往苏联大使馆驻天津总领事馆工作，担任副领事兼全苏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全权代表。从 1948 年 10 月至 1950 年 5 月，也就是他离开中国返回苏联之前，他一直在苏联大使馆驻天津总领事馆担任总领事一职。用季托夫自己的话来说，"我在天津的工作，正好经历了中国国内战争的最后搏斗时期。正是在这里，我成为华北这一时期里许多重大事件的观察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者。"

傅冬菊与苏联驻天津总领事的最初相识

季托夫在其回忆文章中如此叙述了他同傅冬菊的相识经过："正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同傅作义率领的华北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场殊死搏斗的时候，我跟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认识了，当时她是天津《大公报》的一名记者。关于她，我只知道她的思想比较进步。我感兴趣的是有关城里的状况和人们的情绪等方面的消息，以及她对局势的评价，要知道，《大公报》可是一份颇有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报纸，而这份报纸的记者们则都是些消息灵通人士。""在跟傅冬的最初接触中，我们建立了比较良好的关系。不久，她就信任地告诉我：她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不过同党失去联系已经很长时间了。她向我讲述了她是如何成功地确认国民党特务在对她跟踪盯梢，她的稿件和物品经常有人翻动，她身边的一些人在跟她交谈的时候时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感到疑惑的问题，一些陌生人极力试图跟她结识。因此，她行为做事很矜持，回避跟她不认识的人相识。在跟傅冬的进一步交谈中，我感觉到她非常替自己父亲的命运感到担忧，因为华北的战局显然对她父亲不利，用她的话来说，她的父亲比较犹豫、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她说她的父亲自认为是孙中山的信徒并且始终信奉孙中山的思想。他想保持自己在抗日战争中所获得的民族英雄的威望，而不使这一英名有丝毫的玷污，并且他希望能作为一个敢于为了自己的祖国的自由和强盛而付出牺牲和立过功勋的人载入中国历史。傅冬告诉我，她的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很谦和，善待自己的下属和普通士兵，因此在自己的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普遍的敬重。"

根据季托夫的回忆文章来看，傅冬还对他讲述了她父亲对待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傅作义将军对于苏俄曾经给孙中山先生以及中国1920年代的解放运动所提供的援助感到很满意，当他在1930年代担任绥远省行政长官的时候，他曾想通过外蒙古跟苏联建立贸易关系，直至现在他都对苏联的生活很感兴趣。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是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坚决拥护者，抗战初期他曾经跟共产党的军队在山西省合作过。但是，1939年底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山西省和绥远省建立根据地的时候，新政权逮捕了他的亲属并且严厉地惩处了他们，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和所有财产，一些亲属还遭到殴打和侮辱，这些对傅作义将军对待中共的态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改变了傅作义将军对待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

季托夫在跟傅冬的交谈过程中感觉到，傅冬不仅在为父亲的命运感到忧虑，而且还准备对父亲有所帮助。于是，季托夫告诉傅冬：苏联非常了解她父亲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勇敢的抗日战士、武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先锋，"但是，我个人完全不理解他的表面立场，因为他站在反人民的蒋介石政权一边，而蒋介石政权没有前途并且必定要遭受失败。对此，傅冬回答说：她父亲担心中国共产党人不会饶恕他在日本投降后特别是在夺取张家口之后曾用武力跟他们干过，所以他站在蒋介石一边跟中国人民解放军鏖战。"

季托夫向傅冬指出，她父亲的这种想法大错特错，简直是给自己选择了一条走向毁灭的道路，季托夫回忆说，"当时……我冒险地建议傅冬到北平去努力地向父亲解释清楚他的失误在哪里。"

季托夫之所以在其回忆文章中称他对傅冬提出这一建议是一种"冒险"，主要是因为苏联政府在跟国民党政府签订两国友好同盟条约的时候曾经承诺只向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提供援助，而不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提供任何援助，所以苏联驻华外交机构及其外交人员都力避跟中国共产党人有什么公开的交往，以免授国民党政府以苏联政府言而无信、暗中支持中共之口实。

季托夫建议傅冬向自己的父亲傅作义解释清楚当时中国国内的实际形势和状况：中国的青年学生在掀起大规模的反美运动，他们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政策甚为不满，蒋介石的军队人心涣散、丧失战斗力，正在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在东北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纷纷率领自己的军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季托夫建议傅冬要让自己的父亲明白：摆

脱困境的唯一正确道路是跟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在华北地区实行停战尽快开始谈判。傅冬原则上同意季托夫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她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但是，她还是决定到北平去试一试，并且答应季托夫在她从北平返回天津之后将会把她劝说父亲的有关情况和结果告知季托夫。

出于对傅冬的安全的考虑，季托夫建议傅冬对他们相识和交往的情况要高度保密，不要向任何人提及，并且以后的会晤必须秘密进行。两人约定在傅冬从北平返回天津之后就秘密会晤。

季托夫与傅冬的第二次会晤

季托夫同傅冬的第二次会晤是在 1948 年 11 月中旬。季托夫在其回忆文章中指出，傅冬向他讲述了她跟自己的父亲会谈的情况，她发现自己的父亲情绪非常沮丧。父亲好不容易听完了她的劝说之后，问她是否知道共产党人已经将他认定为主要战犯之一，在中共颁布的战犯名单中他位于前列，这就意味着他已经被判决并且跟他不会有任何的和平谈判可言了。对此，傅冬指出，只要他停止武力对抗并且开始谈判，那么中共领导人肯定会改变对他的看法和态度的。傅冬还向自己的父亲讲述了她之所以这样看问题的理由：当时，在中国，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傅冬没有向自己的父亲引证季托夫的话，而是说，据她所知，苏联人认为他是一个爱国者，并且称赞他自 1930 年代中期开始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壮举。听了女儿的话之后，傅作义笑了，并且向女儿发问说，苏联朱可夫元帅在歼灭纳粹德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极其重要的功勋，女儿是否知道现在朱可夫元帅已被贬黜。

傅冬还告诉季托夫：美国人正在千方百计地拉拢她父亲，向她父亲允诺将会向他提供一切援助和支持。傅冬指出，兴许，这让她父亲产生了一种期望：借助于美国人的援助和支持，他将能成功地遏制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根据自己同父亲的交谈，傅冬得出了一个结论：她同父亲的交谈没有获得成功，她没能成功地说服父亲跟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和平谈判。

季托夫极力劝慰傅冬，说她跟她父亲的交谈仍然促使了她父亲对问题进行深思，这就已经很好了。季托夫再一次建议傅冬尽快回北平去，继续本着原先的精神劝说父亲站到人民一边。对此，傅冬回答说，她父亲担心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有国民党特务在监视，季托夫建议傅冬劝说自己的父亲预先委托自己的亲信寻找机会弄清楚：假如他同意停止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么中共对待他的态度又将会怎样。

傅冬同意尽快回到北平她父亲身边去，虽然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对他很难产生什么影响和作用。

傅冬说服父亲放弃自杀

据季托夫回忆，1948 年 11 月底或者 12 月初，傅冬突然紧急约见他。见面后，季托夫发现傅冬情绪比较激动，眼里噙着泪水，她告诉季托夫：她父亲决意自杀，因为他清楚他击退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的进攻，他又不愿意无条件投降。傅冬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季托夫再次劝她立刻回到北平她父亲身边去，并想尽一切办法打消她父亲的这一绝望念头。至少，应当告诉她父亲：自杀任何时候都不晚，但是在这之前应当动用一切办法搞清楚一旦停战中共会对他持怎样的态度，要说服他相信假如他同意跟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在华北地区实行停战开始谈判，那么中共对待他的态度是会发生改变的，特别是假如他同意率领自己的军队向人民军队投诚，那么中共对他的态度一定会发生改变。傅冬哭泣着，一直重复说她父亲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一旦决定自杀，他是会那么去做的。她不相信有说服她父亲放弃自杀的可能性。

考虑到情势的尖锐性，季托夫建议傅冬冒险主动跟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以便在其父亲的问题上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傅冬回答说，她不打算主动跟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原因是：首先，国民党特务在紧紧地跟踪监视她；其次，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在北平她不曾遇到她原先认识的共产党人。在讨论了几种方案之后，傅冬同意试着跟北平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分手之前，两人约定在她从北平返回天津之后再会面。

然而，在 1948 年，他们未能再次会面，因为天津很快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他们再次见面是在 1949 年 5 月初，此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傅冬来到天津苏联总领事馆向季托夫讲述了与她父亲相关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她非常艰难地说服了父亲放弃自杀念头并且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地下党组织跟她建立了联系，并且领导她开展工作。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她告诉自己的父亲她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并且跟北平中共地下组织保持着联系，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领导人建议他开始停战谈判。根据傅冬的叙述，她父亲听了她的话之后，沉思良久，依旧认为共产党人不会宽恕他，并且最好的结局就是将他关进监狱。再三思索之后，他问自己的女儿：她怎么能保证跟她联系的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不是国民党特务？傅冬明白了自己的父亲是在担心蒋介石的特务机构用这种方式检验他是否忠诚可靠。由于他怀疑，而傅冬又提供不了令他完全信服的保证，因为跟她取得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都是些原先她并不认识的人，于是无奈之下的傅冬便违背了她跟季托夫当初达成的不向任何人透露他们的秘密交往的约定，而将她自 1948 年秋天跟季托夫建立联系的相关情况详细地告诉了父亲。傅冬说，直到这个时候，她的父亲才稍稍平静了些，在一段时间的思索之后最终同意跟共产党人进行和平谈判。

40 多年后傅冬同意季托夫公开这段客观历史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得知女儿要到天津去跟季托夫见面，傅作义请女儿转告他对季托夫的谢意，并且想赠送给季托夫一些骏马。得知傅冬将要到前线去，季托夫赠送给她一个野战望远镜和一个军用挂包。1950 年春天，季托夫返回莫斯科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中国，关于傅冬及其后来的命运，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任何消息。而有关季托夫回国之后的情况，傅冬也是全然不知。

一直到 1989 年中苏友好协会苏方主席齐赫文斯基院士来北京参加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国际研讨会的时候，傅冬请求齐赫文斯基院士将一封信和一些礼物转交给季托夫。这位齐赫文斯基院士，曾于 1946～1949 年在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任总领事一职，他跟傅作义父女都熟识。通过齐赫文斯基的帮助，失去联系整整 40 年的傅冬和季托夫从此又恢复了通信往来，彼此了解了对方分别后的命运和现状。季托夫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同傅冬最后一次见面整整过去了 40 年之后，我于 1989 年 5 月出人意料地接到了她的来信和一些礼物，她请到北京参加纪念 1919 年五四运动 70 周年国际会议的中苏友好协会主席 С.Л. 齐赫文斯基院士转交这封信和这些礼物。她在来信中写道：'昨天，出人意料地遇到了齐赫文斯基同志，打听到了您的情况，这让我很欣喜。'"

"这些年来"，——傅冬在来信中写道，"我一直试图打听到您的消息。1949 年我随着二野南下到《云南日报》工作，还收到过您的一封信和一本画报。1951 年 3 月，我被调到《人民日报》当记者，获悉您回莫斯科去了，我曾经往莫斯科给您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后来，我请中苏友协的同志打听您的情况，他们说您被派到美国去工作了。这样，我就一直未能跟您取得联系。这 40 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经历了各种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在干校改造了 3 年……我常常回忆起解放之前我们曾经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当您再来中国的时候，我可以陪您转转，过去您在中国的时候工作太忙，没有来得及到处转转。我非常希望当我还能走动走动的时候，在近一两年能有机会到苏联去一趟，见见您，看一看苏联的建设和改革成就。在信里夹着的一张名片上，写着她当时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编辑部任副主编。"

1989 年 9 月，季托夫收到了傅冬的第二封信，傅冬在信中写道：她非常激动地阅读了季托夫的回信，"40 年前的一切，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您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以及对我本人的帮助，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记忆犹新。"由于季托夫在给傅冬的回信中曾说过他已经老了并且病得很重，所以傅冬在第二封来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您患了什么病，如果您能到中国来，我可以找中医专家给您看一看，他们会提出必要的治疗方案。假如您需要中国药物，就请写信告诉我。"

据季托夫回忆，在收到傅冬的第二封信之后

的很长时间里，他都没有收到傅冬的回音，尽管他是按照原先的地址给傅冬发出信件。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告诉傅冬：他打算撰写有关1945～1950年在华工作情况的回忆，并且询问傅冬他是否可以将他与傅冬在1948年秋天几次会晤的情况写出来。但是，对这封信以及其他包括祝贺新年和节日在内的几封信件，季托夫都没有收到回信。一直到5年之后的1994年5月，季托夫才收到了傅冬的第三封信，这封信仍然是С.Л.齐赫文斯基院士转来的，在这封信中傅冬写道：由于健康原因她已经退休了并且在北京接受治疗，她给季托夫发出过几封信和一些新年贺卡，但是没有收到过回复。假如她能恢复健康，她打算跟季托夫会面。“我相信，我们有机会见面。无论怎样，您都是我的好朋友。假如您有什么需要，我会帮助您的，请您不要客气。”接着，傅冬写道：无论是在农村的三年劳改时期，还是当我们两国关系恶化的时候，她原先的革命信念都不曾受到过影响，她一如既往地认为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不可动摇的。她还对季托夫在来信中所提出的询问作出了回答：“至于您打算撰写有关我们在天津几次会面情况的想法，我认为应当将这些情况写出来，因为这是历史，应当让世人了解这些情况。至于公开发表出版的时间，我请您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并且自己作出决定。”

季托夫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并且决定在1995年傅冬的父亲傅作义将军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发表自己的回忆文章。于是，俄罗斯史学杂志《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便出现了季托夫的回忆文章《关于1948～1950年在华工作情况的回忆》。

季托夫的这篇回忆文章向世人披露了在1948年秋冬傅冬一度跟中共地下组织失去联系、其父傅作义将军在当时的情势下犹豫不决、沮丧彷徨并决意自杀的关键时刻，作为苏联政府派驻中国工作的一名外交官，季托夫对于傅冬劝服其父傅作义将军认清形势、站到人民一边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并且节节胜利、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卓有成效的情报和策反工作以及驻华苏联外交官的积极劝说和推动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才最终实现了1949年傅作义将军北平和平起义。季托夫的回忆文章为世人披露了这一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幕。■

（作者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

（责任编辑　洪振快）

1957 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

○ 叶永和 蒋燕燕

最近我们在整理爷爷叶圣陶的日记。在 1957 年的日记中，爷爷详细记录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改革等受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批评这件事。

时任人教社社长、总编辑的叶圣陶是这次语文教材改革的主要负责人。查爷爷的日记，1952 年 9 月 1 日，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钱俊瑞副部长说，“三年以来，种种之运动已为经济建设打好基础，今后之教育主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培养成各种合格之干部。今日编定教学大纲，写撰教科书，均须在此意义上植其基。”另外提出“一切学习苏联之方针”。9 月 20 日，教育部编委会召开座谈会，对正在拟订的语文科目的教学大纲提出，苏联的教学大纲中，中学的“语法”和“文学”是分开的，课本也是分开的，语法教学的分量比较重，认为我国也应该照此办理。爷爷参加了座谈会回来，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条他对此事的看法：“凡平日留心语法者，如叔湘、莘田、声树诸君，咸谓语法非万应灵药。可以为辅助而不宜独立教学，使学生视为畏途。此大可注意也。”

当时教学改革问题中央非常重视。1953 年 5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教育问题。毛主席指出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因此，应该改编教材，编辑教学法。会议还决定成立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中学语文学习苏联，分为《文学》和《语法》是教学改革中的大事，中央派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总管这件事，还定下限期。其实爷爷对中学语文分为两科的做法并不满意，好容易才把小学的“国语”跟中学“国文”串在了一起，“课程标准草案”也才出台，中学语文教材经过选材、编辑、审定、印刷发往全国各学校，勉强按期完成，已经费了很大的工夫，怎么又要变了呢？但爷爷还是以大局为重，说决定既然已经做出，就该大家同心协力把新课本编得像个样子。把《语法》改为《汉语》，由吕叔湘和张志公负责，爷爷主抓《文学》课本，挑选的都是称得上文学作品的课文。

1955 年，高中和初中，《汉语》和《文学》课本各六册，还按册编写了教学参考材料，在全国 70 多所学校开始试用新课本。为此，爷爷还代表教育部和人教社向语文教育界同人作了《改进语文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说明这次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这个报告由几位同人执笔，后又几易其稿，讲稿写好后，还分别送给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和教育部党组审阅，可见当时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爷爷是在 7 月 1 日做的报告，听众近千人，绝大多数是中学语文教员。

工夫虽然花了很大，但是教材试用效果不理想，反馈回来的意见负面的居多，教师和学生都说负担太重，既难教，又难学。这件事在教育界反响很大。为此，毛泽东指责中宣部关于语文教材分类等问题是“教条主义”。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为了推卸责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一意孤行”。此话一出，人教社一片哗然（卢元锴：《卢芷芬先生的出版生涯》，见《出版博物馆》2010 年第 3 期）。

人教社受批评的时候，爷爷恰巧没在北京。因为 1957 年 3 月 2 日，奶奶胡墨林病逝，爷爷万分悲痛，教育部和人教社为了让爷爷缓解痛苦，以休假的名义到南方去散散心，3 月 20 日启程，5 月 17 日回京。在此期间，爷爷在南京参加了江苏省人代会。

回到北京后，爷爷听说陆定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批评了人教社语文教材改革，他很生气，在 5 月 31 日的日记中写道：“陆定一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之发言，未经调查，明其原委，意若曰此事为闭门妄为，贻害非浅”。同天，《文汇报》和《教师报》的两名记者上门来访，爷爷虽然不想

见，但又“势亦难却”。爷爷对记者们说语文分科教学的经过，“此或为外间所不及详知”，并对陆定一的批评，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过了两天（6月2日），《教师报》的记者把写好的稿子交给爷爷过目。爷爷当晚作了修订。第二天又把修改后的稿子拿到人教社，请卢芷芬、史晓风、朱文叔三位同志提意见。爷爷又用了一小时再次作了修改后，交给《教师报》。

6月4日吃过晚饭，胡乔木打电话到家里，约上门来访。爷爷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会面：

既而乔木至，告余《教师报》之一则访问报道稿已读过，系报社中之马君送与，缘其中谈改进语文教学之事，涉及乔木。次为陆定一开脱，言陆常因病离京，关于语文教学方面之讨论与措施，渠实不甚详知。至其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之发言，确有未当之处。乔木又谓语文分科、文学课本编辑之经过，外间确不甚明晓。今后最近期间，宜有所表明，使众周知。上午已讨论过，拟由一负责同志在适当场合说明此事，唯尚未有具体决定。次言既有此办法，访问报道似可不必刊载。问余可否告《教师报》《文汇报》，撤去此稿。至于何以不便批评陆定一，乔木未言，余亦不好意思问。察其颜色，听其辞气，颇有希余必允之意。余乃告以两报记者访问之经过，系他们欲知其事，非余拉他们来访。余于陆之发言确愤愤，故径语记者。今于语文改革之经过情形既有办法明告国内，余自可依乔木之意，以自己名义请报社撤回此报道稿。惟希陆定一今后于任何公开场合，自言其前此发言之失当。乔木含糊答应。以下杂谈整风，颇融洽。乔木坐一时许而去。

乔木特别叮咛，《文汇报》方面非余自请撤稿不可，不宜言及其他。彼固深恐《文汇报》就此事做文章也。

胡乔木走后，爷爷立即打电话给秘书史晓风，请他转告两报记者文章不要发表。吃晚饭时，爷爷与我父母谈起胡乔木来访所谈之事，并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二人对此事的看法。

至善于此事表示不快。满子之言颇妙，谓乔木此事，亦带冒险意味。苟余坚决不肯嘱告记者撤稿，乔木亦无可奈何。若加一按语，补叙乔木来访之事，见之于报端，则更难堪。此非明示党方鼓励人家尽量批评提意见，实皆虚假耶。满子此言，确为有见。至善则谓日来报上所载似尖锐而实空泛之批评，甚至岂有此理之批评，登出无损于党之威信，故不以为忤。余批评陆定一，中其要害，从而可见党中央亦复散漫不一致，故惧其揭发。至善之言，或亦有些道理。

六月四日，星期二。
上午到社中，与芷芬、晓风谈一时许。于是至文改会开会。……而大家必嘤嘤言之，直至午后一点乃散，意殊可厌。
饭後方睡，而胡乔木来电话，谓欲来访。既而乔木至，告余"教师报"之一则访问报道稿已读过，系报社中之马君送与，缘其中谈改进语文教学之事，涉及乔木。次为陆定一开脱，言陆常因病离京，关于语文教学方面之讨论与措施，渠实不甚详知。至其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之发言，确有未当之处。乔木又谓语文分科、文学课本编辑之经过，外间确不甚明晓。今後最近期间，宜有所表明，使众周知。上午已讨论过，拟由一负责同志在适当场合说明此事，惟尚未有具体决定。次言既有此办法，访问报道似可不必刊载。问余可否告"教师报""文汇报"，[redacted]撤去此稿。至于何以不便批评陆定一，乔木未言，余亦不好意思问。察其颜色，听其辞气，颇有希余必允之意。余乃告以两报记者访问之经过，系他们欲知其事，非余拉他们来访。余于陆之发言确愤愤，故径语记者。今于语文

叶圣陶日记

第二天爷爷到了人教社，把昨天晚上胡乔木来谈的情形告诉卢芷芬和史晓风。上午开社务会议时，爷爷又把记者来访与胡乔木希望不要登访问报道之事告诉了参加会议的几位党员副社长。

两天后爷爷和卢芷芬谈起此事，爷爷记下了谈话内容：

芷芬为余言，渠曾为陆定一设想，知余在报上发表谈话，应即有所表示，自认其批评不符事实，唯可言明于语文教学讨论之经过，确未详知，而今日所行之办法，则不以为然云云。如是则昭示于众，高级领导能接受批评，为整风运动树一嘉范，同时仍不失批评语文教学现况之初意。乃陆定一不出此途，而令乔木来就余婉商，希余撤回其谈话，实为失态之举。芷芬此言，甚有见地。余亦思之渐明确，乔木之来，渠实失其立场。（6月7日，日记）

6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邀爷爷谈话，为胡乔木来访作解释。爷爷在日记中写道：

大意谓余与党向为朋友，党固深知余，故乔木来找余。乔木之来意，不在党怕受批评（人家批评重于余者至多），而在为余着想。其一，恐人家

利用余之谈话。目前阶级斗争复炽，已露端倪，发言反对共产党者不少，甚有匿名信件，于其时而余发表谈话，甚易使人混淆。其二，余之社会地位，恐因此而有损云云。余当即告董，余一时想不清楚，容徐徐思之。唯乔木来时，并未言及此意，则为实情。及于董为别，思索其事。其一，余只批评陆定一之不明实况而乱作批评，并批评宣传部部内不通声气，与一般机关同病，并未反对共产党，与日来报上之怪论完全不同。人家于余之谈话，无法妄事利用，苟人家强欲利用，责固不在余。若谓余亦有作怪论者同样之见解，则余将与之公开辩论，使公众定其是非。其二，余之社会地位何足惜。人家苟知余欲言而不言，虽非受威胁，终为不坚强，恐更将看不起余矣。如为写匿名信者知之，亦可致一匿名信于余也。总之，董之解释，非唯不能使余释然，益且更增一重痕迹。

第二天是星期日，爷爷一早到人教社与戴伯韬、辛安亭、吴伯箫、朱文叔、刘薰宇五位社领导谈对前一天“纯才所言之想法，认为其言殊无道理，以好意度之，只能认为不善于说话，亦即不善于思索”。大家都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尽力劝慰爷爷。爷爷认为安亭说得比较中肯，他在日记中记道：

安亭谓余之意在批评陆定一与宣传部，今彼方已知其事，当谋改进，则余之目的已达。至于对人对事提出批评，为顾及其效果与影响，宜考虑表达之方式与场合。在党内作批评，往往如是，某种批评于大会中提出，另一种批评于小组中提出，亦有私人晤谈时提出者，总之务求批评生效。且不生不良影响。乔木之来意，或者即本此旨。余当即答安亭，其言余表同意。

这次谈话，大家总算是说服了爷爷，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现在看起来，当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胡乔木找爷爷谈话，可能是为了保护他，唯恐言多必失，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有些话又不便直说，所以欲言又止。

爷爷因其“名”，未被打成“右派”。但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反右”运动中，因教材改革的这场风波，被打成“右派”的有 14 人之多（《卢芷芬先生的出版生涯》）。■

（作者叶永和为叶圣陶之孙子，原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退休工人；蒋燕燕为叶永和之妻，原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退休工程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来 信 摘 登

对《我向中央告省委》一文的补充

读《炎黄春秋》2010 年第 11 期梁文斌先生《我向中央告省委》一文感触颇深。这里对《我向中央告省委》一文做点补充。

1961 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部接到梁信后，派了中央调查组赴安徽调查。当时的中央调查组是以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王维纲带队，可以说是逆风行船。但王维纲有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国民党死牢越狱的经历，不负中央重托，终将安徽灾情大白于天下。

王维纲 1984 年逝世后，郑天翔等人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人民法官的典范》一文以示缅怀之情。文中提到王维纲在安徽放着安排好的地方不去，突然拐向未被布置的区域，年届花甲，风里来，雨里去，睡高粱叶垫的小床，终于感动了老百姓，说当年的老八路回来了。

当反面意见告到中央，查问“居心”时，是时任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一语道破天机，说：是何居心，想当右派嘛。

当时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同在北京西单北大街 98 号办公。

北京　祝江白

“全党楷模”，当之无愧

《炎黄春秋》2011 年第 1 期刊载的《人生·人格·人心》一文系胡启立在去年 11 月 20 日北京地区举行的纪念耀邦同志诞辰 95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节选。这是一篇切中时弊、感人至深、振奋人心的绝佳好文。但愿此文能广泛传播，唤醒许许多多沉湎于物质生活的党的各级干部的良知。耀邦是平凡而伟大的，他的平凡和伟大集中表现在他终其一生毫不减退的良知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气魄上。中国的未来首先寄托在不断产生的千千万万像耀邦一样思想和行动的党的干部身上。耀邦是“上无愧于天地，下无愧于父老乡亲”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耀邦赞誉周恩来同志是“全党楷模”，耀邦自己便是“光明磊落、无私无愧”的“全党楷模”。他的精神将永远感召全党和全国青年。

L.X.H.（曾在团中央工作的老干部）

胡耀邦为何要反封建专制主义

○ 胡德平

我的父亲胡耀邦是湖南省浏阳人，家境贫寒。浏阳地处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的中心——湘赣边界浏阳文家市地区，他读书的里仁学校校长陈世乔，是个既有学识又有理论素质的新派学者，父亲从小就受他的影响。虽然只读到浏阳初中二年级，但已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他在革命队伍里读书之多、之刻苦，是不多见的。所以陆定一伯伯就说他是个"大知识分子"。

我根据他的教诲谈谈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

无需繁琐考证，打倒"四人帮"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党对"四人帮"的批判，是把他们说成新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是右得不能再右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终极目的是复辟资本主义！

自1957年反右，直至批判"四人帮"，任何政治运动，任何党内斗争，任何意识形态的交锋，只要给对方戴上资产阶级路线、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那么把他打倒在地，他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在此罪名下，谁都有口难辩，也无人为你辩解。几十万右派分子是这样，彭德怀元帅是这样，刘少奇主席是这样，无数的冤假错案也是这样。我们难道还能给"四人帮"戴上这顶帽子吗？难道不用这项罪名，就不足以置"四人帮"的理论、路线于"死地"？我认为，如果今天还不给"四人帮"摘下这顶帽子，"四人帮"代表的意识形态和反动势力就可能复活，他们在地下就可能讪笑今天：资产阶级奉行市场经济，今日中国也搞市场经济。我们"四人帮"则是极力维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不给市场以一寸生息之地！资本主义有资本家阶级，今日中国也有大量的私营企业，这是不折不扣的新生资产阶级，今天竟叫他们是什么"新的社会阶层"，我们"四人帮"则是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既要在经济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又要在上层建筑中实行专政，还要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资本主义社会是两极分化，贫富对立。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欧洲、日本。我们"四人帮"竭力维护的分配制度，你说它是"大锅饭"也好，"铁饭碗"也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反正都是一视同仁，既平均又平等的。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是雇佣劳动者，工作没有保障，有人数众多的失业大军。"四人帮"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发展全民企业唯恐不多，唯恐不大，唯恐不公，绝无失业可言。今日中国则是工人下岗，农民失地，比比皆是！如此等等，怎么反说我们"四人帮"是资产阶级呢！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关系，和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乃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否定个性就否定了我党领导的社会制度的阶段性，妄图毕其功于一役，其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用一句当代人的话就是"原教旨主义"。否定共性，就是否定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用毛泽东同志20世纪40年代的话来说就是民粹主义。对"四人帮"一伙的本质和对国内外的影响还需深入认识，在大好形势下，不能麻痹大意。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来的东方落后大国来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何时进入社会主义？怎样成为合格、优秀的社会主义？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面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的人民、民族内心深处所真正关心与祈求彻底弄清的问题。人民群众的这一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不容任何怀疑。

怎样看待"四人帮"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所扮

演的历史角色？胡耀邦同志从“文革”的浩劫、灾难出发，并不认为“四人帮”一伙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也不认为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相反，他们一伙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发展，发生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一窍不通。他认为“四人帮”一伙是打着“防修反修”幌子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是一群破坏性极强的流氓无产者。党内一切野心家、阴谋家要想得逞，必具流氓性才得以售其奸诈。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以后，胡耀邦同志十分重视对“四人帮”所代表的反动势力的批判，他于当年12月8日给青年朋友——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罗炤回信：

现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是批判“四人帮”。这是一场关系我国革命前途的伟大斗争。要知道，把这一小撮丧尽人心的坏蛋拉下马来，打翻在地，这是一举成功的事情，但要从各方面把这帮蛀虫们多年来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行揭深揭透，批深批透，从而把我国革命引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还须作极其艰苦的努力。你的这个作品（注：即罗炤写的评谭嗣同文章），同这个任务联系得不密切。这是否合乎“时宜”？

在胡耀邦同志心目中，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康、梁、孙、黄，都是他极其尊敬的历史伟人（包括毛泽东同志和孙中山先生共同的老师郑观应老先生，他的儿子在延安和胡耀邦同志还一起工作过），尤其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对谭嗣同也不例外，如他在回罗炤信中写道：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即使充满着唯心主义的糟粕，但这个人毕竟是我国十九世纪末思想界的一个先驱，他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那种一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后来革命者的斗志。

“四人帮”一伙的反动势力一直大批党内所谓的民主派，在“四人帮”嘴里，民主派一变而又为党内的“走资派”，其实“四人帮”这伙人，连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够格。

1974年，在“批林批孔”的闹剧中，胡耀邦同志就说过：批孔批儒尊崇法家的运动，是“文革”思想路线的破产。在打倒“四人帮”后，他的这一思想继续深化，1977年3月，他和吴江同志谈话时说道：

我一直是你的读者，关于法家学说那篇文章写得好（注：指《现代复辟派和古代变革史——“四人帮”是怎样利用批儒评法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一文）。揭露“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做得对，封建主义在我们这里还很有市场呢！理论就是要联系实际才有人爱看。

同年5月，对中央党校的同志谈到如何认识“四人帮”这一历史现象时，他先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影响谈起：

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主席从抗大讲《实践论》，进行延安整风，到1956年《论十大关系》，锋芒主要对准教条主义、对准斯大林。虽然没有公开地点斯大林的名，但党内高级干部都知道，批王明、批教条主义，背后就是批斯大林。那时方向对，革命和建设就顺利，党和国家就兴旺发达。1957年主席的锋芒转了，从反“左”，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下转到“反右”，对准了资本主义，对准了铁托、赫鲁晓夫。到写《九评》时他就转不回来了。

从国内问题来看“四人帮”，他认为：

国内根源我看也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和“正在走的走资派”。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搞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什么宫廷政变，什么吕后、武则天，什么法家，那还不是封建的？王洪文是流氓无产阶级。分析“四人帮”的基础，要找一点马克思论封建主义、论流氓无产阶级的东西出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讲了这些。

这一年，陕西咸阳地委党校校长王伯惠同志，在中央党校找到胡耀邦同志，要求把某部队占据的地委党校校址归还党校。王伯惠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说：

他（胡耀邦）飞速地看了一下，就用红铅笔写上“请小平同志阅处”，下面写上他的名字，就交给秘书处理去了。然后他把椅子倒过来，两腿骑在椅座上，两手托在椅背的上面，把下巴放在两个手背上，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话。……他说，你们是搞理论工作的，请研究一下产生“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上海这个地方，过去（下转42页）

1955 年肃反扩大化的教训

○ 李维民

2010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重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全面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要求“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使党史成果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史学界，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学者，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对我们党的历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譬如，对于新中国建立后进行的政治运动，从“反右派”至“文革”十年，都有许多很充分踏实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 1955 年开始进行的肃反运动，至今还缺乏深入的研究。

凡在 1955 年肃反中挨过整，在 1957 年整风鸣放中提过意见的，在反右派运动中几乎都以攻击肃反的罪名打成右派分子。也有不少历史清白，表现一贯很好，肃反运动中还是积极分子的，例如当年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团职少校陈挺，只因对肃反中的问题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那时他就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应从运动的实践和运动的效果去考察”，结果在 1957 年“反右”运动中，被作为主要罪状，打成右派分子，撤职降级、剥夺军衔，开除党籍和军籍。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党一直没有对肃反运动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一味满足于肃反的必要和成绩，而忽视肃反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教训。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不能认真地认识和总结历史的错误教训，就必然会重犯这类错误，我们党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上世纪 50 年代的肃反运动，既不否定它的必要和成绩，又不回避运动中的偏差和错误，这不仅是对历史、对党和人民应有的负责态度，对于做好当前和今后公检法方面的工作，也有现实的意义。

1955 年开始进行的肃反运动的必要性和成绩，多年来在史书、文件甚至文艺作品中已有充分的表述。为节省篇幅，本文没有对肃反运动作全面评述，主要是拾遗补缺，写过去很少提及的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和问题，可能有一定片面性，希望方家和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正。

“宁左勿右”导致对敌情过分的估计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 1950 年到 1953 年在全国进行的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反革命势力受到沉重打击；1953 年朝鲜停战后，国内生产繁荣，社会安定，秩序良好，并没有特别严重的敌情。但是，1955 年 4 月 3 日，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突然被当做反革命分子逮捕。据杨尚昆回忆：“1955 年 4 月 4 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毛主席特别批评了党内存在‘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他强调，今后必须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在大家注意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再注意防‘左’。以潘汉年来说，多年在党内，大家同他熟悉的不少，是与老虎睡过觉，是瞎了眼睛。……毛主席还说，因为党在过去肃反问题上曾犯过错误，以后采取九条方针生了效，因而形成了一种右的偏向，总是原谅自己而失去应有的警惕，今后必须改正。一时全场气氛十分紧张，事先对此毫无精神准备的中央委员们，包括我在内，听了都大吃一惊。”（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2001 年《党的文献》第 1、2 期）两天前，潘汉年还

是 3 月 31 日才结束的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副团长，两天后的 4 月 3 日，毛泽东仅仅看了潘汉年写的一份材料，就把潘当做反革命投入监狱，这不能不令人吃惊。

潘汉年被捕入狱后，周恩来曾交代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转告副总参谋长兼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组织个小组，调查潘汉年的问题。李克农等经过调查后，曾提出五大反证：(一) 中央一再发出过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 潘汉年当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都有正式报告；(三) 潘汉年向中央提供过德军准备进攻苏联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等有重要价值的战略决策情报；(四) 我们党组织的机密一直没有泄露，直到上海解放；(五) 潘汉年所属的当年起着绝密现实作用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是知道的。李克农提出的这五个反证，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党中央慎重考虑。可惜，当时没有采纳李克农的意见。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还公开宣布潘汉年“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 CC 派人物”。(同上) 因潘案受株连，先后被逮捕的有七八十人。1963 年，潘汉年以反革命罪被判 15 年徒刑，“文革”中再次被捕入狱，1977 年 4 月含冤去世，直到 1982 年 8 月才得到平反昭雪。

在潘汉年事发的同时，对文学理论家胡风的批判步步升级。两个月内，胡风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升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再升为“反党集团”，最后定为“反革命集团”。1955 年 3 月中共中央的指示还说：“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可是两个月后，对胡风属于文艺思想方面的问题，就当做政治斗争，胡风和路翎、绿原、阿垅、芦甸、张中晓、欧阳庄、牛汉等大批作家都被钦定为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1955 年 5、6 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 5000 多字的 20 个按语。之后又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了 3700 字的序言和按语，断定：“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关于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刚刚见报，胡风就被逮捕；一大批被定为胡风分子的进步作家也被投入监狱。1965 年胡风被判处 14 年徒刑，1969 年又改判无期徒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平反。

毛泽东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的序言中说：“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他还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仅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 (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 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 于是，一场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在 1955 年夏天两个多月内，毛泽东亲自批转的中央机关、军队系统和北京、上海、广东、河北等地的肃反报告 20 多件，这些报告的中心内容都是“坚决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7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的。”这个估计过分夸大了当时的敌情。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洛阳拖拉机厂 48 名工程师和四级以上技术员中，有 13 人成为重点斗争对象。肃反运动后期各单位落实政策的结果证明，原来当反革命打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反革命。

在我们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从红军时期的反 AB 团，抗日战争时期的“肃托”和抢救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的三查三整，都出现过宁左勿右思想导致的错误。1955 年的肃反运动，一开始又是反对右倾，批判“宁右勿左”，实际上还是“宁左勿右”。潘汉年、胡风两案，就是“宁左勿右”思想造成的恶果。这两个冤假错案，都是违背宪法和法律，不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由个人说了算的结果。有学者认为“个人说了算类似于私设公堂”。我认

为这话有一定道理。这两大冤假错案，引发和直接影响了全国的肃反运动，因而在肃反运动中，也就难免不重复类似的错误。

百分之五的指标，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毛泽东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又说反革命分子“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各单位就把百分之五当做一种指标。一个100人的单位，如果打不出5个反革命分子，就是完不成任务，就被认为是右倾，这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在政治运动中作计划、定指标，并非从肃反运动开始，在1950年开始的镇反中，就有限定在多少时间内杀多少人的计划指标；“三反”运动中更有打“老虎”的指标。1952年1月24日，毛泽东就指示过：“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战争年代下达歼敌数量指标，是根据敌我双方兵力的多少、强弱，战场条件和态势的优劣，和几十年作战的经验等多种因素提出的。把这种方法用于和平时期抓反革命、打“老虎”，自然缺乏科学性。因为这比在战场上两军作战复杂得多。和平时期无论政治上的反革命，还是经济上的贪污犯，都是隐蔽的，而且各地情况又不相同，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各种不同情况的指标。1955年和1956年参加内部肃反运动的各级干部和公职人员，共有1430万人，如要按百分之五计算，就要打出71万个反革命分子，这还不包括社会上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指标是脱离实际的，缺乏科学依据的。1955年7月20日，陕西省委关于肃反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反映过“对可否逮捕的限界不清，因而在将要进入大批逮捕时，唯恐难以按计划完成，产生了急于凑数的思想”。这种百分之五的指标，不仅在肃反运动中，而且在后来的“反右”等政治运动中继续使用，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政策界限不清，冤枉了许多好人

195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曾经提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但是肃反运动的实际情况是：为了肃清一切特务分子，冤枉了许许多多好人，其主要原因是政策界限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2月曾公布过《惩治反革命条例》，但是，什么人可以定为反革命分子，界限一直不很清楚。1979年7月修订刑法时，对反革命罪进行了比较具体的界定，但执行起来仍有很多困难，所以1997年修订《刑法》时，把难以具体界定的反革命罪取消了，改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

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由于政策界限不清，认定反革命分子，像认定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样，随意性很大。在书信或日记中找到几句错误的话，或者并无错误而是被曲解的话，就能定为反革命分子。在反胡风中出现的搜查书信，逼交日记；没有根据，大胆怀疑；大会批判，小会硬逼；为了上纲，断章取义的做法，成为肃反运动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那些批判胡风的按语，成为肃反运动中斗争“反革命分子”经常使用的有力武器。

还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就向全国人民公布过对待反革命“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对俘虏更有“缴枪不杀”的政策。但是在肃反运动中，违背这一政策方针的，并非个别现象。有些起义的军官，或被俘虏的军官，吸收在我们的军校中任教，本应属于“立功受奖”或“胁从不问”的。解放后又没有发现新的罪行，在肃反中也因为历史上的问题，被斗争，被关押，有的甚至被枪毙。

有些一般性的问题，例如，有的人上中学时集体参加过三青团，并未参加什么活动，而且早有交代，肃反中又当成严重问题穷追不舍，甚至逼出人命。因此而背上政治包袱，几十年不得解脱的，更是难以数计。古时，当袁绍大军压境，曹操危在旦夕时，有些曹营中的人与袁绍暗通书信，曹操获胜后，毅然将缴获的这些书信付之一炬，为后人所称道。我们共产党人，在取得胜利、夺得政权后，应当比曹操有更宽广的气度和胸怀。然而，在肃反中，只根据一个人的错误推断，就能制造出潘汉年、胡风这样的冤假错案，以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绝不应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少数的个

漫谈“中产阶级”

○ 周有光

中国有了新兴中产阶级了吗？

《凤凰周刊》2010 年第 33 期发表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中国为何没有新的“中产阶级”》。周刊记者访问在复旦大学作客的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古德曼教授，谈论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崛起问题。摘要如下：

周刊记者：大约从 2000 年开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崛起。请问，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是怎么看待中国出现中产阶级这一现象的？

古德曼：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富裕消费者，但是，他们与其说是中产阶级，不如说是财富新贵。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国外称中间阶级）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很多中国企业家现在主管的企业都是从党政工作中发展出来的。干部退休时，他们的子女变成商人，继承父辈的地方关系和势力。权钱交易常常坦率到了让我瞠目结舌的地步。有一位煤老板受访时候告诉我，他不仅把自己公司的一半股份送给当地政府，而且还得准备加入共产党，他现在考虑在县党委会上“买”一个领导职位。

周刊记者：你的意思是，中国所谓的新型中产阶级，很大程度只是执政党的造物，而不是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成果。

古德曼：你总结得很好。中国的财富新贵不是新的中产阶级，而是未来的统治阶级。

发达国家的中间阶级

市场竞争的国家，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全国财富的分配自然地形成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是大资本家，人数很少，他们所得是利润，生活富裕。中层是各种知识劳动者（专业管理人员科技工程师、自由职业者），人数不断增长，构成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所得是薪金，生活安适。这一阶层被称为中间阶级，不称中产阶级。下层是工农体力劳动者。他们所得是工资，生活紧凑；技术自动化，工农人数从全国大多数减少成为全国极少数，“蓝领”变为“白领”。

中间阶级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知识分子是中间阶级的主体。他们各有专业，自食其力，贡献一技之长，换取安适的生活。衣食住行、弃旧换新，仰事俯畜、不虞匮乏。但是，他们积蓄不多，是安适阶级，不是富裕阶级。中间阶级的力量不是财富，而是知识。他们运用知识创造财富，不是利用权力巧取财富。

中产阶级一波三折：否认、承认、错认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存在中产阶级，不过处于幼稚状态。请看陈明远的重要著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等。其中详尽地叙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薪金收入，这实际上是研究民国时期中产阶级的经济生活。当时

别现象。

1957 年的“反右派”和 1966 年以后的十年“文革”，可以说是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恶性发展。正因为对历史上的反 AB 团、抢救运动、肃托和肃反中的错误，一直没有进行过严肃的检查和总结，没有认真吸取这些沉痛的教训，才酿成十年“文革”那样惨痛的灾难。■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原副部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现年 105 岁的周有光先生仍笔耕不辍

没有中产阶级的说法，可是中产阶级已经存在，无名而有实。

（一）中产阶级：幼年时代

鲁迅，是什么阶级？中产阶级。陈著详细列出他在中华民国时期的薪金收入：⑴ 教育部当公务员，起初津贴每月 60 银元，不久定为 200 银元，后来增至 300 银元。⑵ 1926 年，任厦门大学教授，月薪 400 银元；1927 年，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月薪 500 银元。⑶ 1927～1931 年，大学院特约撰稿员，月薪 300 银元。⑷ 写作、翻译和编辑：1932 年后每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 4 万多元。⑸ 从广州到上海，北新书局版税每月 200 银元；大学院撰稿员月薪 300 银元，合计每月收入 500 银元。鲁迅的收入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般待遇，代表当时的中产阶级。

1927 年，中华民国规定教育界的待遇：⑴ 教授月薪 400～600 银元，合今人民币 12000～18000 元。⑵ 副教授月薪 260～400 银元，合今人民币 7800～12000 元。⑶ 讲师、中学教师月薪 160～260 银元，合今人民币 4800～7800 元。⑷ 助教月薪 80～160 银元，合今人民币 2400～4800 元。⑸ 小学教师月薪 40～120 银元，合今人民币 1200～3600 元。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高于今天，这在当时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常态。

（二）工资改革：否认中产阶级

1953 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开始否认中产阶级。1949 年上海解放之后，我从国外回到上海，在大学和银行工作，我的待遇按照新的标准，不再工资改革。我的大学同事和银行同事都要工资改革。

如何改革？取消原来待遇的 80%。100 元改为 20 元；200 元改为 40 元；300 元改为 60 元。“薪金”改为“工资”，脑力劳动归入体力劳动，取消“脑体”差别。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

民国时期，“薪金”明显高于“工资”。“薪金”是脑力劳动的报酬；“工资”是体力劳动的报酬。

共产主义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三）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不幸错认

改革开放，建设小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应当是谁？应当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就是中产阶级。可是迎新时候，掀起盖头，一看不是中产阶级，而是新兴权贵。古德曼教授旁观者清，坦率而明确地提醒大家：错认了！

为什么会错认？原来，进入市场经济，要经过一个难以避开的“黑洞”，叫做“原始积累”。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贵族垄断资源。印尼反共政变，出现裙带资本主义。前苏联瓦解，俄罗斯高官变巨富。中国改革开放，国营翻牌成民营。新衣冠，旧面貌。“近水楼台先得月”。■

（作者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家）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邓子恢和六十年代的包产到户试验

○　许人俊

1972 年 12 月，邓子恢在北京医院病情恶化，陷入昏迷状态。生命垂危之际，邓子恢喃喃细语：包—产—到—户—没—有—错！邓子恢为何临终还念念不忘包产到户？因为，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起，他就同包产到户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 年我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各地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深知农村家底“一穷二白”的邓子恢，头脑冷静，态度消极，不跟风，不刮风，明确反对“穷过渡”。

同年 8 月毛泽东宣布由谭震林负责农村工作，原先主管农林口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被批判为思想“右倾”、“小脚女人”，跟不上“大跃进”的步伐，毛主席劝告他靠边养病。

随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大踏步前进，全国沉浸在一片兴奋、狂热之中，到处宣传莺歌燕舞大好形势，共产风和浮夸风也趁势席卷中华大地，愈演愈烈。《人民日报》把河北徐水人民公社食堂，以及实行劳动军事化、吃饭不要钱、家务劳动集体化等作为“共产主义萌芽”大加赞扬，号召学习。

一、自留地

在虚假大好形势鼓舞下，加之受柯庆施等激进人士的影响，毛主席一时热情高涨，正在考虑让中科院研究“我国粮食多了怎么办”的课题。同时，他还认为农村农民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温床，想进一步考虑取消农村自留地的政策，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这一年 6 月 16 日下午，邓子恢到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里见到毛泽东。他俩游了一会，上岸休息，毛泽东当时突然向邓子恢提起要修改农村自留地的政策，不能全国规定自留地都要占 5%，说要准备研究一下。邓子恢深感纳闷，因为五天前（6 月 11 日），中央经过认真讨论刚刚通过了邓子恢代中央草拟的《关于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而且下发了文件，除规定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恢复自留地外，还提出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房前屋后、村旁路边的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仍然归社员私人所有，由社员个人管理经营。中央还要求各县政府要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认真执行。邓子恢认为这对于取信于民，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将大有好处。这种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文件油墨未干，如今突然要朝令夕改，他百思不解。

根据多年农村工作的经验，他深感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农业生产也并非形势喜人，匆忙取消农民的自留地极为不妥。但因为双方都在休闲游泳，像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也不便于在游泳池里展开细谈。

从中南海回家后想到此事，他越发不安，夜不能寐。反复思索后，他发现原来是由于某位领导人向毛主席反映过：浙江、福建、广东地少人多，社员留 5%自留地，会影响集体生产。好在毛主席只是说研究一下，并没有最终决定取消自留地，事情仍有商量余地。

尽管当时邓子恢已多次被批判是“小脚女人”、“右倾保守”，在一般人看来，他理应接受教训，少说为佳。但事关亿万农民切身利益，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他依然决定冒政治风险，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当天夜里他就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陈述保留自留地的必要性。他开门见山指出：“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地少人多，每人分地只有 1 亩，甚至七八分，似乎留 5%会影响集体生产。但我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

1957 年，邓子恢陪同毛主席接见昔日闽西红军女战士

自留地是按照百分比留的，不是机械规定，每人或每户几分地，分地少的地方，自留地当然也会少。根据革命前我家庭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是需要的。过去我家里大小 6 口人，每年种植菜园总是 3 分地左右。这 3 分地菜园经营得好，除了蔬菜可以自给自足外，还可以种些地瓜、大薯、毛芋等作为养猪饲料之用。所以我的经验按每人分地 5%留自留地是适当的。全国现有自留地 8000 万亩，可以解决 5 亿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 5 亿农民不再下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 5 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他还分析说：“近半年来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的中心关键，固然是由于粮食紧张，生产不足，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所致，但与农民进城抢购副食品及城市人民购买副食品寄回乡村供应其家属也有很大关系。同时，农民留一点自留地，由他自己支配，加上供给部分分配到户，这样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于防止强迫命令也有很大作用。因此，我主张关于自留地问题，中央不再改变，也不必再发通知。目前，有抵触但也只有河南、湖南两个省，已经用电话分别告复解决，不必发全国性通知。”

这封摆事实、算细账、讲道理的信，第二天就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仔细阅读邓子恢的信，从此再也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实践证明，正是这一点点自留地，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保命的“救命地”。邓子恢的那封信，可谓“为民造福，功德无量”。

二、“60 条”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步伐的加快，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各种“卫星”不断升天。8 月 20 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人民公社的成立，给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似乎共产主义将会降临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谭震林等带头参观，大加赞扬，《人民日报》发表了专题文章，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论。邓子恢读后甚感惊讶，他立即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等人赶往徐水县考察。他们发现那个共产主义试点的“高产卫星”，纯粹是弄虚作假，极为气愤，公开指责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在全党上下“拔白旗、插红旗”的强大压力下，邓子恢等刚正不阿，直言不讳，确实难能可贵。

幸好 11 月间，毛泽东头脑逐渐冷静，也觉察“人民公社乱子出了不少”，并开始着手纠正某些错误。

邓子恢一向反对在生产关系变革上搞冒进，也反对超越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搞空想社会主义。1959 年元旦刚过，他立即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有针对性地部署调整公社体制。强调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 100 户左右；生产劳动不能再搞大兵团作战；要保护社员的生活资料，不能平调；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

后偿还……

当时有人责难邓子恢“刮西北风”，他没有理会这些责难。会后，他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直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报告，明确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组要分权，按“三定一奖”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不能再搞大呼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

“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后，我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远远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拔苗助长，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各种矛盾日益暴露，突出的是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瞎指挥，侵犯社员利益，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人们形容农村“红旗遍地飘，社员在打闹，出工不出力，人人瞎胡混”。最终是地减产，人挨饿，民不聊生，到处上访告状。

1960 年 6 月，刘少奇委托正直求实的邓子恢下乡调查，摸清真情。邓子恢抱病率工作组离京，他先到山西汾阳，后到河北石家庄。他在农村走乡串户，找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到社员家中揭锅盖，看粮袋，掌握了许多真实情况。

为避免片面性，他又不顾疲倦劳累，风尘仆仆南下江苏，深入水乡无锡调查。他深感北方南方大同小异，公社内部管理混乱，一平二调，瞎指挥，矛盾众多，群众不满。亟须制定一个条例，把各项方针政策条理化、规范化，公布于众，以纠正错误，稳定民心，使农村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

邓子恢是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他立即组织写作班子，在无锡埋头苦干，反复推敲，奋斗 40 多个昼夜，终于起草了一个 66 条的《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稿），接着，召集一些省委农工部长到无锡座谈讨论，修改后正式上报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看过这个《条例》后交口称赞，急送毛泽东审阅。

此时，毛泽东正因公社化的混乱局面而心烦意乱，他也想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但未能如愿。如今看到邓子恢搞的公社内务条例，兴奋不已，立即把它作为研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这个内务条例，实际就是后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 条）的前身，所以人们常说前 66 条是后 60 条的基础；没有邓子恢的前 66 条，就不会产生后 60 条。邓子恢立了一大功，也重新赢得了毛泽东的重视和尊敬。

1961 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严肃批评党内许多领导人“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瞎说”。在那次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大声赞扬：“我这里要提一提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他搞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我看是个创举。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邓子恢同志脾气犟得很，过去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多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了，跟他统一了。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他没有份。”毛泽东还以责备口气说：“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

过去，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上是“小脚女人”、“右倾”，许多同志都甚感不公。如今毛泽东公开承认邓子恢是正确的，大家都向邓子恢热烈鼓掌，表示敬意。广西等地一些省委书记立即把这些情况当成特大喜讯，连夜通过长途电话向本省传递。邓子恢也深受鼓舞，他觉得还是毛泽东了解自己，原先的委屈情绪也一扫而光。

三、包产到户

公社 60 条下达贯彻后，农村情况有所好转。但因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农民缺少自主权，多劳不能多得。加之又遇上连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搅在一起，农村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如何才能尽快摆脱这种困境，全党上下都在关注，邓子恢更是焦虑万分，多方搜集情况。

穷则思变，各地农村为了度荒活命，在百般无奈之中竟想出了一些新招，如河南有“借地”，安徽有“责任田”，连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刘少奇的老家宁乡，也同样要求包产到户。这实际是对当时时兴的“越大越公越好”观念的否定。

民以食为天，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1961 年秋，心系农村、忧国忧民的邓子恢，尽管已 65 岁，而且长期患糖尿病，但他依然率工作组南下调查，希望找到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他坚信实践出真知，群众出智慧。他先后到河南、江西、福建农村调查研究，心中逐渐有数。

年底回京途中，路过安徽合肥作短暂停留。他早就耳闻安徽搞包产到户责任田，因为“户”字有资本主义之嫌，众人避讳，故巧妙称“责任田”。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见到邓子恢光临甚为高兴，当面向他汇报说，全省农村已有39.2%的生产队试行责任田，凡试行的生产队，社员责任心大大增强，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产量增加，效果很好。

邓子恢当即明确表态："你们的办法好，我赞成。"这是他首次接触包产到户责任田，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似乎看到了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

第二年初，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安徽包产到户责任田。曾希圣被免职，由李葆华接任，已经兴起后的责任田处于进退两难境地。

邓子恢深感纳闷：受到群众欢迎的包产到户，为什么遭到如此不公正对待？

5月，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上书邓子恢反映情况，诉说他们从1961年3月起试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增产18.3%，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但上级批评这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家想不通，要求中央放宽政策，允许人们继续试行。

邓子恢读信后心情颇为沉重。这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的工作组，正在安徽当涂县农村调查责任田问题。不久，他发回报告高度赞扬责任田，反映："责任田把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与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并说："责任田还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不顾质量，以及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争肥、争时间的矛盾。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提高。"

对农业生产和农民都有利的责任田，竟遭到一些非议，邓子恢更为困惑。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到符离集地区深入调查。

当涂县地处淮南，属于水稻区；宿县符离集地处淮北，属于杂粮区。尽管作物不同，但他们调查后发现，符离集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增产效果同样明显，群众感到越干越有奔头。当地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都反映：包产到户责任田为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找到了一条新出路，恳切要求不要给他们扣方向性错误的帽子。符离集区委甚至以全体同志名义再次上书中央，对包产到户责任田作了系统性、条理性的陈述，列举十大变化和七大理由，论证包产到户责任田方向对头、效果明显，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办法。他们甘冒风险为民请命，令人敬佩。

经过调查研究和大量数据论证，邓子恢确信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很有希望，是改革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管理体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希望之路。

为了让中央领导层有更多的人了解包产到户的真相，他特地把安徽的有关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邓小平甚至公开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四、积极推荐包产到户

1962年4月，邓子恢和张云逸两位革命老人相约到广西农村考察，听取桂林地委汇报后，一起到龙胜县进行调查。

龙胜县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交通闭塞，居住分散，人多地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在经济困难时期，那里出现不少包产到户的情况，引起邓子恢的注意。他深入山区开展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当时，他从维护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出发，明确表态指出："对待包产到户问题，要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出发。要实事求是，可以包工到组，也可以包产到组，单村独户的也可以包产到户。"

邓子恢鼓励大家"不要怕说右倾，不要怕说单干。实际上不是单干，合作化运动要坚持自愿互利，不自愿的事，势必失败。这是群众运动，不是运动群众，不能强迫命令，不能强扭硬转。"他还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增加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上。现在无效劳动很多，粮食减产，人民生活下降，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讲话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也使基层干部的忧虑消除了许多。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当时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得知我国农村工作专家邓子恢和张云逸二人到

广西龙胜县调查研究后，也立即带领一些干部前往龙胜县进行调查研究。

在深入调查中，他们面对农村包产到户的现实情况，一再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坚持自愿原则。对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能歧视打击，不能强迫命令。社会主义方向要坚持，形式可以由低到高，逐步提高，可以大同小异，允许千差万别。他们也指出：社会的进步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如果年年减产，农民思想动摇不足为怪。他们并且对龙胜县出现的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五种生产管理形式，就其性质、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解决办法。陶铸、王任重同志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讲话内容，邓子恢的讲话精神完全是一致的。

事后，陶铸、王任重在邓子恢调查研究基础上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泽东阅后亲自批示发政治局，称赞他们“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后提出的建议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短短批语中，竟连用了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字样。

邓子恢感到毛主席的态度有变化，得到了鼓舞，认为解决包产到户问题似乎出现转机，机不可失，应该趁热打铁。

1962年7月的一天夜里，邓子恢与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等兴冲冲驱车进中南海，再次向毛泽东陈述各种情况的理由，竭力推荐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毛泽东最终勉强同意“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这是邓子恢磨来磨去的一大胜利，他庆幸地笑了。

其实，尽管毛泽东私下表示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但大家也深知他并未改变其反对包产到户的基本态度。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还经常散布“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论点。因此一些好心人曾劝邓子恢对农村的包产到户少说为佳，等毛主席明确表态后再讲也不迟。

然而，耿直的邓子恢却坦然表示：“怕什么！不能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不顾农民的死活！”

1962年的7月上旬，他接到了中央将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同1961年3月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一样，这次由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出席的会议，将要研究和决定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事关亿万农民的前途和命运。邓子恢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起早贪黑为会议研究农村工作做准备。

7月17日，他又一次进中南海见毛泽东，重点自然是谈安徽农村情况。他依然竭力保荐包产到户。毛泽东表情严肃，依然一声不吭，只听不说，始终不表态。直到邓子恢起身要走时，才表示：把你们给我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他第二天把毛泽东要的材料送走后，又不顾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些同志的劝告，继续组织人员围绕安徽包产到户准备有关材料，大有“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劲头。

8月初，祖国大地骄阳似火，而北戴河却凉爽宜人。全国各路党政大员从四面八方云集这一避暑胜地。大家聚集在一起，竟无意欣赏海滨风光，反而七嘴八舌大说包产到户，气氛空前热烈。一些省委书记甚至推举广东省农业书记赵紫阳牵头，组织一个小组，起草有关包产到户的文件。邓子恢目睹人们如此热情关心包产到户，深受鼓舞，精神振奋。他顾不上休息，又兴冲冲去找毛泽东面谈。他想多给毛泽东提供一些各地的实情，劝说毛泽东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然而，这一次邓子恢不走运，因为毛泽东已拿定主意反对包产到户。面对邓子恢滔滔不绝的陈述，他毫不客气地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十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他甚至把包产到户同当时波兰的所谓自由化联系起来责备邓子恢：“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邓子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接受不了，于是据理力争，声明：搞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话不投机，两人发生了争论，不欢而散。毛主席甚至夸大其词对人说在争论中自己被邓子恢训了半天。

随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公开批评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并提到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甚至上纲上线指责他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

这一讲话如晴天霹雳，炸得全会场鸦雀无

声。原先热烈议论、支持包产到户的气氛顿时消失。随后,会议出现一边倒,迅速转入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包产到户。

陈伯达趁机兴风作浪,攻击邓子恢对合作化和公社化 “有许多荒谬说法”,“什么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实际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人攻击说“思想上最大的问题,是认为目前自耕农的生产方式最先进,他这个思想是二年一贯制,所以实际上他成了富裕中农的代表”。

邓子恢保荐包产到户,原本是为中央出谋划策、使我国尽快摆脱农业生产的困境,谁知却遭如此横祸,引来这么多恶语中伤。他始料不及,深感突然,但心底无私天地宽,他问心无愧,毫无畏惧。面对巨大的攻势,他回敬那些批判发言“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

邓子恢确实是个“犟脾气”,在北戴河中心组会议上,他当着毛泽东的面理直气壮地发问:“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由于邓子恢不屈服,不认错,于是9月份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批判邓子恢,把他批得一无是处,说他“一贯反对合作化”、“一贯主张单干”、“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民主主义者”,连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错误定性为“十年一贯制”,“没有办一件好事”。

十中全会后,中央宣布撤销农村工作部,“拆庙搬菩萨”,邓子恢被贬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邓子恢十分伤心,曾经要求告老还乡,到老家福建龙岩种地养老。毛主席没有同意,而是安排他同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一道去广东休养。

五、在广西秘密试验包产到户

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了,邓子恢的部长、副总理职务统统没有了,然而他心系农村和农民的志向始终不变。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要清查“四不清”干部“和他们在上面的根子”。邓子恢当然又成了“上面的根子”。当时,毛泽东同一些外国党领导人反复谈中国党内所谓“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修正主义,多次点了邓子恢的名,指责他身为农村工作部长和副总理,“到处乱串,刮单干风”。

邓子恢不在乎这些责难。同年11月,他主动要求到广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邓子恢之所以要求到广西去,是考虑那里位置偏僻,地处山区,条件艰苦,交通不便,远离北京,受上面影响相对要小。而且此前他多次到过那里,熟悉那里情况。何况他的老战友陶铸,当时在广西农村蹲点领导“四清”运动,两个人合得来、谈得来。更重要的是广西领导班子里许多人是他的老部下,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政治上不跟风,遇事不会为难自己。

1964年10月,邓子恢和夫人陈兰,带着几个干部和秘书一起到达广西南宁。尽管中央有关部门事先打过招呼:“邓子恢这次是来参加‘四清’,他不代表中央讲话。”但是自治区党委领导人韦国清、乔晓光等听说老领导光临,仍然前来汇报“四清”运动的准备工作情况。

邓子恢起先在广西玉林地区搞“四清”,后来又转到桂林地区参加“四清”。

他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他同广大干部同吃同住,强调尊重服从当地党组织领导,生活上绝不能特殊化,不给地方增添麻烦。1965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在桂林地区灵川县甘棠公社蹲点,领导“四清”运动。那年冬天,有一次“四清”工作团在灵川县开会。灵川县是桂林风口,冬天气温很低,风雨交加,山上一片白雪。陶铸考虑到邓子恢年岁大了,劝他不必赶来参加会议。谁知会议刚刚开始,邓子恢身着皮大衣,头戴皮帽,冒着风雪严寒,精神抖擞地赶来参加会议。大家见了既惊奇,又感动,纷纷劝他注意保重身体,他却风趣地说:“身体重要,会议也重要。我们是地委领导下工作的,不能随便请假。”

事后,他还对地委书记王祝光说:“在桂林参加‘四清’的领导同志太多了,除了陶铸和我以外还有广州军区副政委以及一批军师级干部,中南局的一些部委领导,《红旗》杂志副总编邓力群、中央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明同志,等等,大家都要在地委领导下工作,我更要做表率,不然的话你这个地委书记不好当啊!”王祝光听后,深受感动

和教育。

邓子恢在广西农村先后呆了近两年。为便于工作，他化名李建中，公开身份是科委干部。起初，他要求住到村里，同大家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桂林地委考虑到他年纪大了，吃住在下面有许多不便。经过一再劝说，他和夫人陈兰才同意安排在市区，其他随行人员都在庙岭公社二塘大队，同大家实行“三同”。好在他居住的地方，离“四清”的农村二塘大队不远，可以早出晚归，随时来往。他白天常常身穿中式布衣，头戴草帽，手摇芭蕉扇，在生产队走村串户，同基层干部和农民聊天谈家常，了解情况。他熟悉农时节气，懂得耕耙种收。社员们常把他当成农业技术员，或者当成农业教授。他还嘱咐秘书刘蓬勃从北京带来自行车，经常骑车到公社各生产大队了解情况，及时向他汇报。

这期间，他在农村目睹农业生产形式主义严重，社员们“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收工打冲锋”，完全是吃大锅饭，大呼隆，出工不出力，搞无效劳动，深感不安。他问社员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劳民伤财的状况，人们说最好还是包产到户。

后来，邓子恢又转到玉林地区参加“四清”。那时，农村一部分贫下中农生活相当艰苦，一些“四清”工作队员错误认为，这是农村阶级分化的表现。他进村调查后实事求是指出：造成这个问题，并不是敌对势力的破坏，主要是过去几年的天灾人祸，农业生产连年下降，社员收入连年减少。近两年农业生产虽然有所恢复，但是仍然未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他说：只要农业生产丰收了，农民收入增加了，群众生活就会好起来。所以，他在“四清”工作团总团、分团会议上，总是一再强调“四清”不能放松生产，反复提醒大家：毛主席把农业增产作为搞好“四清”的标准之一，我们要坚决执行。如果其他工作搞好了，生产没有搞好，大家还要留下来补课。

他经常出没田间地头，看到“队长天天派工，社员晚晚评分”，地里田间到处是人，二三十人堆在一起种地，你挤我，我挤你。电影、画报都是一堆人，表面很热闹，形式主义，虽然好看，但不中用。怎么检查农活质量，如果地里不出苗，你找谁去？他深感不安，问农民：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群众同样回答：最好是包产到户！

邓子恢让“四清”工作队党小组讨论这个问题。多数同志认为包产到户是禁区，此路不能走。于是，他积极开导大家搞生产责任制：“毛主席批包产到户，没有批责任制嘛！何况这里离北京那么远，谁知道呀！”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1965年，邓子恢拿定主意，向地委书记韦树辉打了一下招呼，说要选几个点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实际是亲自搞包产到户试验。韦树辉也知道他的用意，表示支持。

他们是冒着政治风险搞试验。为了确保试验顺利进行，双方商定绝对保密，暗中试验，只干不说，不对外泄露。于是玉林地区一场绝密的包产到户试验，在邓子恢的指导下，借助于“四清”运动的旗号，悄悄地展开了。起初生产责任制还没有敢联系产量，但农民积极性大为提高。那一年，玉林地区农业是合作化以来生产管理最好的一年，也是粮食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

邓子恢对玉林地区推行生产责任制，感到十分高兴。但是对这种生产责任制没有同产量联系起来，未能从根本上克服平均主义，又深感遗憾。他对韦树辉说：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难包的，要解决“一窝蜂”、“小锅饭”问题，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不联系产量是不行的。

不久，他看到“四清”工作团有一份文件介绍广东某地搞包产责任制的报道，立即拿给韦树辉看，并说：“你看看，说不联系产量，实际上还是联系了嘛！你批你的，下面还是照样要搞嘛！”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邓子恢在玉林地区暗地试验包产到户，原是严格保密的，但久而久之，还是传到自治区党委领导人耳朵里。

有一次，区党委副书记霍泛见到了韦树辉，很关切地询问在玉林蹲点搞“四清”的邓子恢身体情况如何？韦树辉知道霍泛与邓子恢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没有隐瞒真相，而是悄悄地透露了真情。

霍泛过去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过，他们住在同一大院，曾经朝夕相处，感情极深。霍泛一向敬佩邓子恢，得知他在“四清”中秘密试验包产到户的情况后，一直守口如瓶，同样对别人保了密。

其实，在广西知道这一秘密的人并不少，但大家都心照不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后谈起此事，霍泛十分感慨地说：“邓子恢对他认为正确

的事，即使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也是要坚持的。大家不敢去做，他去做；不能明里做，他就暗里做，除非实践证明它是错误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生产实践证明：包产到户责任制完全正确，既符合农民的心愿，也符合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律，效果极为明显。1965 年，四个试验点粮食总产 6911 万公斤，增产 1887.5 万公斤，比上年增长 37.5%。基层干部反映，这是农业合作化以来，当地田间管理质量最好、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人们都感谢那位指导他们搞试验的科委"李老头"。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全国"文革"风暴突起，邓子恢奉命匆匆离开广西，返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广西一位领导人，不无遗憾地说：邓子恢亲自主持的包产到户试验，由此停止了。如果继续下去，这一新生事物定会总结出许多好经验，对农村改革也会起到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1968 年，邓子恢在北京万寿路寓所看书

六、历史的评判

"文革"开始后，邓子恢被揪斗，造反派抓住包产到户做文章，批邓子恢一贯反对毛主席，同毛主席唱对台戏，是顽固不化的三反分子，要他低头认罪。邓子恢申辩：我从不反对毛主席，对包产到户，党内有不同看法，那是正常的，谈不上反党。他从不违心承认包产到户是错误，也拒绝低头认罪。

随着"文革"岁月的推移，年迈的邓子恢已逐渐进入风烛残年，原有的保健医疗待遇早取消了，只好到附近街道门诊部看病。由于病情加重，最后才被北京医院收留。他病卧在榻，回顾过去，许多旧事已经遗忘，唯有当年他在闽西领导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和保荐包产到户两件事深深刻在脑海里。在他生命弥留之际，"包产到户"这四个关系亿万农民命运的字眼，总是在梦呓低语中不断出现。

1972 年 12 月 10 日，邓子恢与世长辞。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但党中央还是为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老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重病在身的朱老总悲痛万分，不顾家人劝告，硬是穿着厚厚的大衣，头戴皮帽，拄着拐棍，冒着严寒，步履蹒跚地到八宝山为老战友送行。毛泽东尽管多次批评邓子恢右倾，但始终佩服他刚正不阿，称赞他是"犟脾气"、"搞阳谋，不搞阴谋"，也送了花圈。

历史是公正的，九年后的 1981 年 3 月 9 日，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正式发文指出：邓子恢"是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和他所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过去党内对他和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邓子恢矢志不渝、积极倡导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历经人间风雨后，也终于写进了中共中央当年的 1 号文件，并在中华大地普遍实行，成为推动我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子恢作为包产到户的积极倡导者和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已载入史册，为人们所纪念。■

(作者为《邓子恢传》编写组成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刘瑞龙指挥百万“民工大军”

○ 庄 重

我自1941年起，就与刘瑞龙同志在一起工作，朝夕相处。那时候，他是淮北区党委书记，淮北行署主任，我是淮北区党委报纸《人民报》副社长，后任区党委秘书。解放战争时期，他两任后勤司令，我是前线记者，又与他在一起。他是我的老领导，我与他的一家人都很熟。

2010年5月，在新四军研究会年会上，刘瑞龙的大女儿刘延淮请我写一篇文章，纪念他父亲诞辰100周年，因视力不好，直到10月份才写成。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年仅30多岁的刘瑞龙同志，率领数以百万计的“民工大军”，驰骋于华东战场，支援我军作战，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而他却默默无闻，鲜为人知。

1947年初，我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结集于山东境内大打歼灭战。刘瑞龙被任命为华野副参谋长兼后勤部司令，他与傅秋涛任主任的华东支前委员会密切配合，动员和组织人民支援前线。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同时，进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减税，减轻人民负担，努力发展生产，耕战结合，做到支前和生产两不误。

单说沂蒙山区和莱芜战役，我军经两夜三天激战，共歼敌5.6万人，仅鲁中区就有500万人民参加后勤工作，其中有50万人在战地服务。我是新华社特派记者，在陈毅司令亲自指导下，做过详细报道。（全文刊于1947年3月3日山东《大众日报》）

莱芜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扩军，扩大华野。从胶东、渤海、鲁中、鲁南4个区的地方武装部队和基干民兵团中，共抽调出33团，组建成华野的三纵、八纵、九纵和十纵。另有五个基干民兵团补充一、六、七纵队。（《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317页）

这次扩军成功，华野迅速强大起来，不但原有的几个纵队得到了补充，而且一下子增加了4个新的纵队（每个纵队约2.5万至3万人）。

十几万新兵入伍，要按照野战军编制，配备武器装备，供应粮草、弹药，设置营地、野战医院和通讯设施，等等，可以想见，作为后勤司令的刘瑞龙，任务是何等的繁重，工作是何等的艰巨！

不仅如此，后勤司令部还要按照“一兵四扶（民工）”的标准，为华野各个纵队备置“常备民工团”——担架队和运输队，以及民兵，还要根据战场的变化设置许多个兵站和办事处，等等。

扩军成功，人民支援，后勤保障有力，在紧接而来的孟良崮战役中，华野以神速的行动，一举全歼了蒋介石王牌军整编74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

淮海战役中，我遇见刘瑞龙，是在山东曲阜，他头部缠着厚厚的白色绷带。

下面内容来自我的日记。

1948年11月5日，晚上我住进“圣府”（孔府），遇见刘瑞龙、章蕴二同志。他们两人从中原经太行来此，昨晚刚到，今又要出发。10天前，刘瑞龙因晕眩而跌破了头，伤势很重，现仍包扎着。说话时，可以看出他脑神经似乎有些失常，血色不好，很黄瘦。这位老同志，一向是忘我地拼命地工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人民事业。自1945年春天以来，连这一次他因过度疲劳而晕死过3次了。这种精神，令人钦佩！

粟裕、陈士榘、张震、刘瑞龙将上车出发，我送行并预祝胜利。几位首长甚高兴，一一握别登车。刘瑞龙头上还缠着绷带，显然是强忍着伤痛上前线的。我见了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

12月4日。我与华野政治部组织部长王文轩及张海奎等同志乘专车（中吉普）上前线，因绕

道而行，经邹县、枣庄、峄县、台儿庄、运河车站、古邳，于12月6日抵达睢宁。看到苏北民工多极了！天一亮就人声沸腾。大街小巷和城外大小道路上，都充满了运粮的民工。他们多半是盐城、阜宁、灌云人，出来已22天，推的小车上是大米和淮盐。现在天气已很冷，但他们出来时，未及带棉衣，现在有很多人仍穿单衣和破短裤子，缺少鞋袜。但他们精神旺盛，个个都有必胜的信心。

12月7日，我们乘汽车经浍塘沟、时村，来到符离集（徐州南，京浦线上），当晚宿王牌坊兵站办事处。西南方和西北方，炮声不绝，炮火红光闪闪如霓。兵站运输弹药很繁忙，只有汽车30余辆，汽车驾驶员最辛苦。淮海战役开始以来30多天里，他们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能睡三四小时。兵站有时要修桥修路，任务很紧急。

12月8日，我们乘车到吴山口（在濉溪口东南8里，离襄王城20余里），当夜住在兵站赵站长处。西北方今日打了一整天，炮声密而紧，黄昏时更激烈。晚上，华野十纵来领弹药，携陈、张参谋长手令，谓十纵今多次打退敌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的冲锋，粉碎敌向大同村和鲁楼方向突围企图，弹药消耗很多，望满足十纵对弹药的需要。八纵来领弹药的同志说，昨日孙元长兵团突围时被我军全部消灭，仅八纵就俘敌1.1万多名，我64团一个团俘敌3000多。

在符离集至吴山口的路上，民工大军几路纵队向前开进，太棒了！如此雄伟，如此有秩序，如此绵长的人民的战斗行列！我应该歌颂我们伟大的民工！人民革命战争胜利万岁！

我不知道如何描写这伟大的“民工大军”。我感到无能，感到惭愧。

后来，我才知道：淮海战役中，第一线的民工总数达230万人。（还有第二线、第三线的民工），有18个民兵团共2万人。

淮海战役战场很大，纵横几百里。敌人出动兵力80万，我出动野战军60万。历时66天，歼敌55.5万。战果辉煌，史无前例。

淮海战役中，华野除了没有飞机以外，精良武器之多，大大超过敌军，大炮尤其多。我军常用一种火箭筒发射炸药，去炸毁敌人碉堡，威力无比。每放一炮，需要炸药三四十斤。因此，我军所需炮弹、炸药甚多，许多弹药要从大连、沈阳等地远道运来，还得防火、防水、防爆炸，派民兵押运保护。

华野司令部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为前线做好粮草、弹药的供应。单以口粮来说，据不完全统计，前线每个月需要原粮（毛粮）1.1亿多斤，还要动员人民将原粮加工（如将小麦磨成面粉）。

淮海战役是中野和华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华野后勤司令部同时担负着中野的后勤。为此，华野后勤司令部在徐州西之黄口，特设一个办事处，任命安徽阜阳地委书记王光宇为指挥、负责中野各部队的粮弹供应和伤员后运等项后勤工作。

华野司令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动员大批民工，协助工兵抢修铁路、公路，架设长途电话线，并保证其畅通无阻。

12月中旬，后勤司令部已迁移至徐州以南之符离集，靠近华野司令部（徐楼）。但刘瑞龙，我难得一见。因为他常年奔走于前线和后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12月19日下午，到后勤司令部刘瑞龙司令处，适逢他与万金培、周伯萍二同志谈支前工作。我旁听了许久，得知支前情况。此次山东、华中、豫皖苏区和冀鲁豫区共动员民工40万人。前线所需的粮食及油盐均已不成问题，3200万斤大米正向苏中运来，小米、白面也很多。现在要解决吃菜问题，要采办大批蔬菜、肥猪及纸烟。要争取少吃粗粮，多吃大米。随着战线向前发展，粮食要跟上去。口号是“哪里打炮向哪里运粮”。部队每人带3天口粮，米袋装满。各支前办事处运输4天粮食，共7天。（注：到淮海战役结束时，前线尚有余粮2000万斤。）

陇海路新安镇（今新沂市）到洛阳间的火车通了。明天，津浦路宿县（今宿州市）至济南也将通车。苏中的大米由运河（站）装火车运来前线。

中央决定，发给此次参战部队每人猪肉1斤、香烟5包，进行慰劳。

有23个常备民工团（胶东10个团，渤海区8个团，鲁中南3个团，另参加35军的还有2个团），于本月底以前分批参加我军各部队服务，期限6个月。每个常备民工团配500副担架、500个挑子，共3500人。部队准备欢迎，同时欢送复员的民工。

12 月 31 日，因为过新年，中午吃大米饭（自12 月 11 日以来，顿顿吃大米饭）、肉烧栗子、红烧刀鱼、黄花炒猪肝。在前线能吃着如此好的饭菜，我想起了英勇支前的百万民工大军和因伤头部裹着绷带的刘瑞龙。

中共中央决定：淮海战役后，百万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京（宁）沪杭。主要由第二野战军（原中野）和第三野战军（原华野）联合作战，由邓小平任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统筹一切”。早在 1948 年 12 月 17 日在江苏萧县蔡凹举行的总前委会议，就决定由粟裕和张震起草渡江战役作战计划。

渡江战役的正面战线很长。自长江口向西至铜陵繁昌，为三野的作战范围；铜陵、繁昌至江西九江湖口，为二野作战范围；四野自武汉南下，直取湖南、两广和海南岛。这么多的军队，还有许多随军南下的工作团队，总计约 100 多万人，后勤供应十分艰巨。长江两岸水田多，河流湖泊多，运输工具主要是船，而我军后勤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少船。

怎么办？刘瑞龙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总前委、华东局和‘三野’前委（华野改编为三野时，三野前委由陈毅、粟裕、谭震林、唐亮、刘瑞龙 5 人组成）领导华东支前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及南京、上海等城市解放后各种支前供应问题作了统一部署与安排，并且动员了广大人民大力修筑道路，疏河、开坝，架设长途电话线，筹集和运粮草军需品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山东、苏北、皖北为渡江作战动员民工达 320 多万，苏北、皖北筹集和运输到前线的粮食，有 3.4 亿多斤，山东妇女赶制的军鞋达 200 万双。

“船只和水手是渡江作战的先决条件。部队团以上领导机构都建立了船只管理机构。在各级支前机构和人民的支援下，到 4 月初，全军已搜集到各类木船 8000 多只，每一个军大约有 500 到 600 只。加上部队自己制造的运送大炮、车辆、骡马的竹筏、木排等，基本上解决了第一梯队的渡江乘载问题。这些船只和竹筏、木筏等横渡器材分配到各个分队以后，做好船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十分重要了。我们的办法就是，把部队人员和船工组织在一起，共同生活、操作；动员上万名船工，训练部队选拔的几千名水手。在船工中开展诉苦教育和团结的活动。同时，制定了船只损坏赔偿办法和船工伤亡抚恤条例，妥善安排好船工家属生活。”

后勤部门对征用的船只要进行检查修理，缺舵缺锚的配舵配锚，缺帆和桅杆的配帆配桅杆，缺篙、橹、桨和缆绳的都要一一配齐。修理船只，需要大批器材和工匠，从四面八方选调后勤部门将船只检修好了，才交与战斗部队使用。

经过两个月紧张的充分准备，二野和三野按照中央军委批准的作战计划，于 4 月 21 日准时发起渡江战役。万炮齐鸣，千帆竞发。“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4 月 23 日解放南京，5 月 3 日解放杭州，5 月 27 日解放上海。至此，长江三角洲无敌踪，蒋家王朝全面崩溃。

年轻的刘瑞龙两任后勤司令，绝非偶然。1910 年 10 月 3 日，他生于江苏南通（今南通市）。15 岁参加革命，1927 年 17 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共通（南通）海（海安）如（如皋）特委书记，与张爱萍、黄火青等创建了红十四军。后来他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创建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日本投降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兼民运部长、苏皖边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

刘瑞龙身经革命烈火长期锻炼，不仅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且成为具有将帅之才的一位“无冕大将军”。■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胡乔木在 1956～1957 年的“右派言论”

○　李慎之

1956 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胡乔木对新闻工作和宣传方针发过很多指示，倾向肯定是右的。不过，我现在已没有当时的记录，有的当时根本就没有记录，因此现在大多已无法回忆，只记得几条“尖端”的如下：

1．1956 年苏共二十大刚开完，据吴冷西传达，刘少奇不知在一次什么场合，当着胡乔木的面说：“新闻界过去有许多清规戒律，都是乔木同志定下来的，现在应该破除破除了。”在这个黑指示之下，新闻界刮起了一股“自由化”的妖风。其中由刘邓黑司令部亲自出面搞的，就有现在已无人不知的刘少奇接见当时新闻界负责人的几次讲话，这些接见都是有胡乔木在场的。胡乔木本人也曾在那年夏天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把当时新华社部主任以上的人员约十人左右，召到他家里去谈破除新闻界的清规戒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鼓吹“自由化”。我还记得，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谈到过去学习塔斯社，其实塔斯社的新闻写得很不好，干枯简单，这时，胡乔木以一种“早有所知”的神态说道，“塔斯社的新闻写成那个样子是斯大林时代政治生活的反映”。胡乔木过去是一向鼓吹学习塔斯社的，在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后，大家也总认为他是拥护对斯大林的三七开的评价的，现在一句话，既否定了塔斯社又否定了斯大林，其效果是异常恶劣的。

这次漫谈会上，也有人提到新华社应该发展国外记者网，建立世界性通讯社的问题，当时正是毛主席批评新华社“保守”，提出“要把地球管起来”以后，新华社的同志对于派国外分社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并且已经起草了一个十二年发展规划呈报总理转中央，总理还认为我们的干部培养计划太小，但是胡乔木对新华社同志所提出的问题却冷冷地说：“派国外记者不是你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而要看整个国际政治形势，人家连外交关系都不同你建立，还能让你派记者吗？”这一席话不但给大家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而且直接是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

这次漫谈会上主要的时间谈的是办报问题，胡乔木对中小城市报纸比解放前减少的情况大为惋惜，说到他家乡解放前还有一两张对开大报，解放后就都没有了，不胜感叹。对《大公报》由全国闻名的“知识分子报纸”改组为工商财贸界的专业性报纸表示后悔，甚至以他这个新闻界头子还表示“不知是怎么搞的”，这个论点与后来新闻界右派分子的论点完全是一样的。

2．1957 年 4 月下旬，吴冷西曾有一次作了“中央政策”的长篇传达，其内容主要是现已为大家揭发批判的刘少奇“八千里走马观花”以后发表的大量黑指示，而他的开场白却是胡乔木的一段话。吴冷西说：“乔木同志最近谈了一下毛主席的心情。乔木同志说：‘斯大林时代统治的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残暴的统治，如果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下去，是不会千秋万世的，毛主席最近日思夜想，就是要设法使社会主义能够千秋万世’。”胡乔木的话是我所知道的对斯大林的最恶毒的攻击，但是尤其恶毒的是，他把毛主席当时正在考虑如何“灭资兴无”（这四个字到 5 月份就公开传达了）的战略部署说成是如何反对“斯大林主义”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腕，从他这个有着“主席秘书”的身份的人嘴里说出来，真是阴险毒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胡乔木接着还肯定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两大论点，即①斯大林错杀了许多“老干部”，②1953 年苏联农业水平还低于 1913 年水平。吴冷西在当时的传达，我记得的就是如此。去年春天我看到新华社国内部庄重写的大字报，曾公布此次传达的比较完整的记录，可以向庄重调查。

打着红旗反红旗是胡乔木一贯的手法，他曾

范文澜没有"史谏"大跃进

○　朱瑞熙　　王　灿

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先生在《百年潮》1997年第5期发表《范文澜的"史谏"》一文，认为范文澜在1958年夏天写作的《中国通史简编》(共四卷，1976年以后列为《中国通史》前四册)隋唐部分时，利用描写隋炀帝的骄奢"史谏"大跃进。李新文中写到：

当我们正在"大跃进"中吹嘘"吃饭不要钱"的时候，范文澜在他的书中，详实地写出了隋炀帝的骄奢……他在书中明白地通过东市商人的口，向西域人说，"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这对当时的"大跃进"岂不是当头棒喝!我看到这里，觉得很刺眼，因对范老说："范老，你的书毛主席是一定要看的，你在这里写吃饭不要钱，而且是写隋炀帝，这样写好吗？"范老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就是要让他看嘛！我写的都是事实，有凭有据，怕什么？"随后还补充一句："要让所有的领导人都看看，中国的历史经验丰富得很，应该以史为鉴嘛！"……毛主席后来是否看到范老的这一段书，不得而知。但陈毅是看到了的。秋天，我到北京医院看病，见陈毅在那里写大字，范老在一旁赞赏……随后说起范老写的书，陈毅说："你那四卷书是不朽之作，可以传世的。你把隋炀帝的骄奢，写得活灵活现，写得太好了！隋文帝俭，隋炀帝奢，老子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当，儿子不几年就给糟蹋光了。那样的皇帝，怎么能不亡国呢？"陈毅越说声音越大，越激昂，而且很愤慨，四周的病人都围过来听，极表同情。这一幕情景，我至今未忘。

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话向我们作传达，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总是歪曲和篡改主席的原意。他多年以来就爱讲，"毛主席爱引用红楼梦里王凤姐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指我党)办事老是这样，不知什么时候可以改过来。"其实毛主席坚持革命的辩证法，从来就认为矛盾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胡乔木的附加语，纯粹是与毛主席唱反调的"合二而一论"。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话最初发表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而胡乔木上述的话，在好些年前就一再讲过。胡乔木又爱说："我们总是一条腿走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两条腿走路"。这里所说的两条腿走路也完全同后来在1958年大跃进中正式发表的这一口号(意思是几个"并举")毫无共同之处，而纯粹是一种折衷主义、调和主义，在哲学上是平衡论，"合二而一论"，在政治上就是"多元社会论与多中心论"。我上面所写的是胡乔木□ □ □ □ □ □ (原稿没复写上——编者)地讲的，是他一贯的思想。

我还记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到达平山，新华总社也从太行迁到平山以后，我们第一次到西柏坡去听胡乔木的讲话。他就"告诫"我们："不要以为革命天天都在前进，也有后退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到处都是光明，也有黑暗的地方"。这些话我们当时听了觉得很新鲜，尤其是出于他这样一个人的嘴巴，因而也觉得很"权威"。其实，这就是他一贯主张新闻报导要"全面"，要"写真实"，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实即所谓"暴露黑暗")那一整套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的张本。类似这样的话，我相信，凡是在胡乔木领导下的人是多次听到过的。凡是认他为"权威"，而想从他的话去领会"中央"意图的人，肯定都会中毒于无形。

1968年9月15日■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据我们所知，李新先生叙述的这件事似乎影响深广，不少人信以为真。如《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刊登冯锡钢先生《李新笔下的陈毅》一文，说1958年秋季，“陈毅赞赏范老，当着诸多病员的面，直斥隋炀帝的骄奢，其藉古喻今的用意是心照不宣的”。似乎范老《中国通史简编》确实“影射”大跃进。又如新近问世的朱维铮先生所著《重读近代史》（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年8月版）一书，在其中《岂可说先人闭目塞听？》一文中说：“范文澜魂归道山快四十年了，按照他在大跃进时代的‘反潮流’言论”，等等，也把子虚乌有的所谓范文澜同志1958年“影射”或“史谏”大跃进的说法当做真有其事。

我们认为，李新先生的上述说法有以下几点值得怀疑其准确性：

第一，我们不妨把范老《中国通史简编》四卷本中有关隋炀帝的描述，与1941年5月的延安本对照一下。延安本第三编《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侵入——隋统一至清鸦片战争》第一章《南北统一时代——隋》第二节《隋朝溃败》，叙述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召集诸蕃酋长到洛阳城，“诸蕃入丰都市（洛阳东市）交易，（杨）广先命整饰店肆，瞻宇如一，盛设帷帐，珍宝充积，人物华盛，连菜摊也用龙须席铺地，蕃客走过酒食店，店主邀入就座，醉饱散去，不取报酬。骗蕃客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取值，蕃客惊叹。有些蕃客知道虚伪，见缯帛缠树，说中国穷人很多，衣不蔽体，为什么不给他们，却来缠树，市人惭愧不能回答。”（《中国通史简编》，新知出版社1949年4月长春第三版，第244～246页）

延安本称西域诸国使者和商人为“蕃客”，称隋朝为“中国”，除此以外，与解放后的四卷本的内容基本相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本已经有“骗蕃客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取值，蕃客惊叹”，与四卷本说“告诉客人们，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几乎一样。难道说，早在1941年5月范老在延安就有先见之明，预先知道17年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村会出现“吃饭不要钱”这类荒唐的事？

第二，1958年夏秋，全国工农业领域的大跃进正处于如火如荼的高潮中，人们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完全信任，对此深信不疑，积极参加其中。范老身处北京，正忙于编写通史，不可能对“大跃进”有丝毫怀疑。大跃进的“恶果”，实际上要到1959年春才显现出来，可是这时有几个人能知道呢？到我们知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曾造成国内大批百姓饿死，那要迟至“文革”后的九十年代了。

第三，范老在1958年“大跃进”的大环境中，他是努力紧跟的。在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又载同年《历史教学》第6期）一文中，他说：“面临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科学工作也必须大跃进，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历史科学工作者谁都想跃进，谁都想大大的跃进，干劲是足够的，问题在于如何跃进。”于是范老联系实际到要在史学界提倡“厚今薄古”和“兴无灭资”，开展百家争鸣，史学界领导干部“要种试验田”，他说：“可能有些学术工作者懒惰不想跃进，或者跃进不得其法，领导者起示范作用，可以使懒者变勤，不得法者得法。”最后，他特别联系大跃进，说：“还有一点，也是更重要一点，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六万万人都跃进了。农民向四、五、八大跃进，工人更是了不起，十五年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要超过和赶上英国，每天看报，使人每天兴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部门有不跃进的人甚至有些还是领导工作者，那就很不好了。”

我们认为，范老说他“每天兴奋”，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话。范老身处全国“大跃进”的大环境，他自然要跟上形势。别忘记，他还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三研究所的所长。作为一所之长，1958年2月13日至15日，范老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所长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争取科学工作的大跃进”。会议第一天，院长郭沫若作《科学界的精神总动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勉励大家“鼓足干劲，多快好省，一心一德，又红又专，重视劳动，服从组织，加强合作，实现规划”。（《科学通报》1958年第6号，第164页）3月5日至12日，范老参加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心议题是“科学为生产，跃进再跃进”，会议向全国科技界提出了一个“光荣的战斗任务：科学必须为生产大跃进服务”。（同上第7号，第202页）8月，范老主持制订了《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1958—1962年工作纲要》，这是一个具体落实“大跃进”

措施的计划。其中第四条为“遵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力争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工作计划。第六条为集中所内力量，五年内写出一批分量较大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通史简编。同时写出其他专著和通俗读物 52 种、论文 450 篇。（同上第 8 号，第 6～7 页）显然，这是一个“大跃进”的科研计划。我们认为，每个人不免要受时代的局限，包括我们自己。俗语说，上什么山唱什么歌，这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范老自然也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局限，1958 年的中国大陆都在为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范老不会对此发表异议，而且他在全所五年工作计划中带头制订了“高指标”。在这种情况下，范老不会用《中国通史简编》来影射大跃进，这是可以肯定的。

第四，1958 年秋，陈毅不可能对范文澜说那样的话。因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第四卷要到 1965 年才出版。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第三编（即第三、第四卷）说明》，他是在 1957 年 6 月至 1959 年 9 月，“写完了隋、唐、五代十国的政治经济部分和吐蕃、回纥、南诏共六章。”在《说明》最后，范文澜署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证明《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第四卷是 1965 年 4 月前完稿而后交给人民出版社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记载，1965 年 4 月《中国通史简编》出版了第三卷，11 月出版了第四卷。所以，1958 年秋，如果陈毅能读到的《中国通史简编》，仅是第一、第二卷，内容写到魏晋南北朝，根本没有隋、唐、五代乃至隋炀帝的内容。由此证明，李新同志所说陈毅和范文澜的那段对话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时间有误。

第五，范老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在延安时期编写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时，由于时代的需要，他不免有些地方“借古说今”，也就是影射国民党反动派。比如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了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等等。对此，范老 1954 年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已经作了“自我检讨”，认为有关三国吴、蜀的描述“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因而都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所以，在以后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凭着对党的真诚和对毛主席的崇敬，他不会仍旧使用影射的方法来表达他对当时现实如“大跃进”的意见或不满。

第六，李新的“回忆”也有不准确之处。如在《范文澜的“史谏”》中，他还说：“在延安……范老讲‘经学’，毛主席每讲都亲自去听。”其实，范老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共讲了三次中国经学简史，毛泽东去听了前两次，后一次因生病没有去成。1940 年 9 月 5 日，毛泽东写信给范老说：“第三次演讲因病没有听到”（载《毛泽东书信选集·致范文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63 页）。这证明“每讲都亲自去听”的说法不准确。

总之，我们认为，说 1958 年范老反对大跃进，又说范老 1965 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影射大跃进，都是值得商榷的。范老 1941 年已经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叙述隋炀帝“骄奢”淫佚的主要内容了，1965 年版只是改写得更通俗、更丰满，他根本没有借此进行“史谏”的主观用意。隋炀帝“骄奢”淫佚属于统治阶级的消费，1958 年的“大跃进”则属于毛泽东的头脑发热、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前者属于消费领域，后者属于工农业生产领域，两者性质不同，根本不可类比。1954 年范老刚反思即“自我检讨”1941 年版的缺点是用过“影射”国民党反动派的手法，存在“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不可能四年刚刚过去，他又一次用“影射”手法来反对“大跃进”。我们认为，范老在 1965 年版《中国通史简编》中叙述隋炀帝“骄奢”淫佚，只是秉持他一贯的“平实”写史原则，尽可能讲清那段历史事实，并非比附 1958 年的“大跃进”。至于读者包括陈毅同志、李新同志等据此引申出何种想法，那是读者自己的事，但不可强加到范老头上。现在，虽然有人高度评价范老在中国史学上的成就以及他的高风亮节等等，这种主观愿望无可厚非，但千万不要把他写成一位超越时代的人，这就违反事实，其效果适得其反了。■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我对不起老师们

○ 周继能

一 “清理阶级队伍”

“文革”开始时我就读于广州市第 17 中 66 届高三 ⑴ 班，与同学们一样，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文革”，参加了学校的“战斗兵团”，与广州市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属同一派，与广州市另一红卫兵组织“红旗”严重对立。1968 年 7 月，已经停课三年、被折腾得奄奄一息的学校迎来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目睹了一场人间的大屠戮。

这一年 7 月 16 日，“市革命委员会” 发出通知：“对中、小学教职员工实行统一领导，分片、分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办学习班“认真清理教师的阶级队伍，把混进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顽固不化的地方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国民党残渣余孽统统挖出来”。

这个“学习班”7 月 20 日就要举办；所谓分片，就是若干个学校集中住宿在一起；时间为一个月左右。事前，各校“军训团”就发布了“四不”规定：“不准请假，不过星期天，不准串联，不准搞派性活动。”并威吓“不参加者，不发工资、开除公职、送档案给公安机关处理”。

有人以“中教红司”的名义，于 7 月 19、20 日连续发出两份“紧急声明”，试图抵制。马上，当权者做出了反应，“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了“给广州市‘中教红司’的一封公开信”，警告：“我们特郑重提醒你们：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迅速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否则，一意孤行，坚持错误，后果自负。”

其实，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对教工队伍进行的迫害，早已在进行当中了。

在此，我顺便交代自己当时担当的角色。我们几个人，是高年级学生，最主要的，出身都是工人家庭。这样，我们就缺少了“革干革军”子弟那种“皇孙贵胄”的气焰，也没有“狗崽子”那种为祖辈赎罪的负累。故此，我们组织起的“战斗兵团”，就成了“有政策水平”的一个，颇得军人掌权的各校“军训团”的倚重。而我自己，也就成了一个帮凶、一个打手。

在 7 月初，“军训团”负责人就拿出了十几个教师的档案，对我们说：“马上就要清理阶级队伍了，这部分教师，历史问题没弄清楚，你们去抄他们的家，看看有没有收获。”“这两个呢，态度不好，你们去抄，打打他们的威风。”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识到叫 “人事档案”的东西，由于 1949 年之后政治运动不断，故此每个人都有厚厚的一大本，甚至几大本。最令我至今不忘的，是不少教师档案内都有一个卷宗，上印“大西瓜”三字，并有西瓜图案，散落不少西瓜籽。(究其寓意，大概是指剔除杂质，向党交出红心)。里面的内容，全是 “我曾经说过三面红旗的坏话”、“我曾经对共产党的政策想不通” ……经请教人事秘书，才知这是 1959 年“向党交心”运动的产物，当时所谓交得越多，对党越显忠诚，墙上还详细列表公布数字，交得少自然意味着对党心怀贰志了。这时我才明白，1966 年揪斗“牛鬼蛇神”，宣读“罪状”时，那些“牛鬼蛇神”纷纷辩解“那是我向党交心时说的话”。看来，教师们是尽入彀中了。还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就是不少教师是“特嫌”。人事秘书解释说，只要有人揭发，或外单位转来一份材料，说你曾与某特务身份的人接触过，你就被列入“特嫌”名单。“谁敢把那材料撕了呢？”人事秘书说。这一下，令我顿觉世事之险恶。

我带着十多个人，两三天之内抄了十多个教师的家。

“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开始了，由于是多个学校集中在一起，我得以见到了由清晨到入夜，

那种“呼声如雷，举臂如林”的“壮观”景象。教师们或分组，或集中，谈认识、写材料、人人宣读、群众评议……到了斗争阶段，更有布置多个积极分子专攻一个“重点对象”的。由于我当时是学生，算是一个局外人，对斗争会虽然天天目睹，记述起来还是不得要领，特别缺少那种切肤的感受。到了我参加工作，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才真实感受到“政治运动”的恐怖。当时，全厂的几百个人围成一圈，要“有问题的人”站出来坦白交代，还不时由事先布置好的“积极分子”把若干“问题人物”冷然揪出。以致一些人，不知道哪一类“问题”要交代，又怕万一被人揭发就“从严”，吓得当场尿裤子。有一对本车间的夫妇，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呼喊声中，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交代了多年前接待过“地主成分”的亲戚，被当场宣布“宽大处理”，更多的人被吓瘫了……这种会，工厂开完，系统内几十个厂又集中在一个大学操场，开几万人大会。寒风冷雨，谁也不敢离开，那种恐惧的感觉，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尽管我当时年轻，没有家庭问题，但还是感到彻骨的恐惧。

不久，教师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到了“宽严处理”阶段。某天，全体教师集中，开“宽严大会”，会场周围都是军人（“军训团”），增加了几分肃杀。由“片”（如北片、南片）的“军训团”领导宣布，某校某某教师，什么问题，交代得好，获宽大处理；某校某某人，负隅顽抗，拒不交代，把他们押上来，积极分子就把这些教师揪上台。各个学校合起来也有一群，站列台前，从严处理，统统用大卡车运送到公安看守所去了。

十多天后，学校“军训团”领导吩咐我，去把那些家伙领回来吧。我一个人手持介绍信，到两个看守所（男女教师不在一个看守所），把他们领回了学习班。我从牢房观察孔往里瞄，没有床，地上密密麻麻地坐了一屋人。

其中一位姓冯的体育教师，曾带领我们排练大型团体操，为省、市大型会议表演。我把他从郊区看守所领回来，从走路到坐公交车，几个钟头，没替他提行李，也没与他交谈一句。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参加我班同学聚会，我对他有说有笑，执礼甚恭。虽然道歉的话很想开口，但始终未曾开口。1996年，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向他遗体鞠躬，道歉的话，只能在心中对他说了，可他再也听不到了；另一位从看守所领回的姓容的女教师，我曾两次抄过她的家，还推打过她。其后她移民国外。去年我托在海外的同学向她道歉，同学说，容老师住洛杉矶老人公寓，已是“老年痴呆”，她也收不到我的道歉了。

教师自杀事件开始了！

连续一个多月高强度的折磨，开始有人精神崩溃，各校均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我校第二个自杀的，是教语文的杨爱梅教师。杨老师是一位高干夫人，她的丈夫江帆，是本市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学校曾通过杨老师，把江部长请来作过“形势报告”，无非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修、反一天天烂下去”。可“文革”中江部长被揪了出来，此时正在我省北部“103队”服罪，那可是“罪大恶极”的“黑”字号才能进的地方啊！据说杨老师1949年前当过国民党政府电台的播音员，我还记得1966年她在大会上怒斥“三家村”的情景，抑扬顿挫，但把“牛鬼蛇神”念成“牛鬼神蛇”。杨老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自然难逃一劫，由于她家与我家住得极近，她还托我从家中往学习班捎粮票。家中只有三个从13岁到17岁的孩子。学习班一结束，回家不久的一个夜晚，她就在家中上吊自杀。我在学校一听说，马上赶到她家，遗体已运走。可怜哪，三个孩子都在家，杨老师半夜决定弃世，女儿就睡在旁边。据“军训团”领导蓝干事告诉我，杨老师就在出阳台的房门顶上拴根绳子上吊，由于绳子太细，她竟然掉了下来，以致蓝干事早上赶到，犹有体温。据说，13岁的女儿就睡在房间里，被她掉下来的声音惊醒了……

准确地说，我校第一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教师何佩华，1966年8月8日，即所谓“十六条”发布的那一天，这位姓何的老教师被连续几个月的打打杀杀吓破了胆，在清晨跑到学校附近的铁道上卧轨自杀，身上的五分钱硬币被火车车轮碾成杯口大……另一位教导主任1968年4月被学生殴打至死。

而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中第一个自杀的教师是教物理的伦毅老师，曾教过我。伦老师在学习班两次自杀，两次被救活。在一天斗争会后，伦老师喝下了农药（敌敌畏），被发现后送到医院救治。救活了，接回学习班再接受批

判，此时又多了一个罪名：向无产阶级政权挑战。由于身体虚弱，伦老师一个人躺在教室里地板上，趁其他人继续开斗争会之际，第二次自杀，他用玻璃片划开了肚子，把肠子拉了出来……

1968 年 10 月，停课三年的学校涌进了三届新学生。为了对他们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学校举行一个“阶级教育展览会”，我参与了筹备。其中一件事便是展出“牛鬼蛇神”的照片。我带人到了医院，站到医院病床上，跨在伦老师身体上方，为他拍了正面照。伦老师紧闭双眼，以此表示抗争……

左图就是当年到医院拍照的介绍信，介绍信的文字是我的亲笔：

二　被关在柜子里的邵老师

1968 年夏天，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疯狂阶段，这个“运动”是直指“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那些“历史复杂”的人，很快就陷入灭顶之灾。

七中原是一所教会学校，1949 年之后教会学校被称作“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邵明耀老师就是这所学校的老教师，我还知道，他的太太是一位钢琴家，也在七中任教。

我不是七中的学生，但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直接造成对邵老师的伤害。我当时是 17 中的学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骨干。1968 年夏天，得知我校有位教师加入全市性的教师组织“中教红司”，而“中教红司”是被认为“人员成分复杂”、“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教师组织，于是我们展开全面调查，而调查就是迫害的前奏了。

到七中“外调”时，主要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的一位女红卫兵接头，她比我低两个年级。七中有邵明耀、董守三等教师也参加了“中教红司”组织。我讯问过邵老师，讯问时瞪眼拍桌是肯定的了。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审讯记录本。

在当年大约 8 月份，我在文德路原市文联大楼又碰到了那位女“主义兵”，实在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盘踞在这里的。她说：“走，审审邵明耀。”在文联大楼的一个房间，“女主义兵”拉开了一个书柜的门，里面赫然坐着一个人，那就是邵明耀老师，他在瑟瑟发抖，也实在不知道红卫兵是如何把邵老师弄到这里来的。我问了一个问题，邵老师说不清楚。“女主义兵”拿起一根木板，在他的头上敲打：“你说不说，你说不说……”，邵老师不断发出哀嚎……最后，“女主义兵”拿起一块砖头，向邵老师的脚面砸去……

时间可以流逝，但是罪过永远不会磨灭。请看到此文的七中学友转达我的忏悔，起码这一次，邵老师受虐，是因我而起的。再次对邵老师道歉，我祝邵老师健康长寿！

三　对不住林老师

1968 年 5 月，我在“军训团”办公室发现了一封来信，是本市一所医院的一位护士写来的，信中反映我校林老师对她有非分之想。

林老师，是我校的化学教师，50 多岁了，一人独居，并无什么“政历”问题。我们找到了林老师的邻居（就是女护士的兄长）调查，林老师的行踪被形容得鬼鬼祟祟，说他像要投毒害人的样子。——他可是化学老师啊！阶级斗争这根弦马上就动起来了。我派了两个低年级的女同学跟踪林老师，却不料被他发现了……我们登时恼羞成怒。

事不宜迟，我们一行十多人火速行动，直扑林老师的住所。目的第一是找找“罪证”，第二是打打他的“气焰”，第三呢，确实是想在他那里弄点钱，因为搞教师的“外调”，缺乏交通费。

他不在家，我们强力撬开了门锁，翻箱倒柜……可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发泄开始了：把他的衣服倒上墨水、砸烂了柜子、书桌、在墙上写上“打倒林××”……最后，拿走了一盏台灯、一个圆规、牙膏……还有 30 元钱。很难想象，林老师回家后见到满屋凌乱会有什么感觉，可是他不敢做声——1968 年 5 月，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之时。

1968 年年末，我们将要离校了，林老师小心翼翼对“校革委会”提出被抄家的问题，“校革委会”的一位教师代表问起了我，我态度强横地拒绝回答。

1978 年，我离开学校到工厂也有十年了，一天，学校有人来到工厂，向我了解十年前的事情。——原来，当时“拨乱反正”，开始清理“文革”时的冤假错案。学校的来人说，林老师说你们打烂毁坏了他的东西，还拿走了 500 元钱……我回答说，打烂毁坏林老师的家具是事实，不过，真的只拿了 30 元，没有 500 元那么多。30 元大多用在“外调”的路费上，剩下的 9 元多我离校时亲手上交学校财务了……我在书写的材料上，第一次对林老师表达了歉意。说实话，我在当时有点紧张，500 元钱在上世纪 60 年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万一林老师一口咬定，我怎么办呢？我不由地紧张起来。我感受到了，林老师对此事的愤恨有多深。后来此事没了下文，不了了之。大概当时不少事情都这样，“文革”的“冤假错案”清理得过来吗？

林老师很早就调离该校，前年我曾经打听过他的去向，没人说得清。在此，我对林老师表达悔意，实在对不起！深深惭愧，为当初自己的兽行。

四　我对教导主任之死负有责任

1966 年 6 月，“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为了“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一下子就把七个“内部掌握”的“四类分子”的名单抛了出来，这其中就有教导处副主任庞乘风。随后，他们统统被押送回原籍。1968 年 4 月初的一天，我在学校“军训团”蓝干事的桌面上见到一份《申诉书》，是庞主任写的，内容是为自己因“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押送回乡而作的辩解与要求。

我见到这份《申诉书》，立即与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右倾翻案”的论述联系起来，(当时是“杨、余、傅事件”之后)，想到了“紧跟”。所谓“紧跟”，就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之谓也。

一天晚上，我纠集了几个“战士”到教工宿舍及学校的显眼处，刷上了几条诸如“不准庞乘风翻案”之类的标语。几天后，竟然传来了庞主任的死讯，他是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打死的。据“军训团”蓝干事说，头天晚上，“主义兵”把庞主任叫了去，一伙人围成一圈，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见人不成了，急忙从墙头拖过去，扔回家里就跑了。庞主任当天晚上就咽了气。

就这样把人打死了!开始时我是感到了某种震惊。但是，在当时打死个把“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一件完全不值一提的事，蓝干事压根就没有往上报，估计上头也不要求上报。我内心稍萌的“罪恶感”很快就平息了。为首打人者郑某，我的同届邻班同学。郑某“根正苗红”，颇得“政治”眷顾，还是在校中学生竟然去当过“四清运动政治学徒”;“文革”狂飙扫到学校，则荣任“文化革命工作队”队员之职。到了 1967 年，其母被“揪出”，据称是“叛徒”。郑某就从天上跌到了地下，同校如花似玉的妹妹，竟也因之精神失常。郑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犯下了弥天大罪。

郑某下场亦甚凄惨。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曾在某国有大公司党政部门工作，后因此事被揭发，受到了处分，随后患上了不治之症，终年不及四十岁。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一个普通的中学也变成了“绞肉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校“非正常死亡”的学生有 7 人，教师有 4 人。

我把这一秘密埋在心底 32 年，自己也从毛头小子到了花甲之人。此事再不提起，将会湮灭在冥冥之中。假如不是我当时的无知，“主义兵”或者不会知道有人在“翻案”，事情有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虽然庞主任很难躲得过随后“清理阶级队伍”的屠戮，但事情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清夜扪心，深感痛疚，我诅咒自己的过错，诅咒这一年代。愿庞主任在天之灵安息!这是一则“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故事的现代版。

上世纪 80 年代初，学校清查“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教师的情况，找到了我的一位同学，我也知道。本来最清楚前因的我，最能说清情况。但是，我怕影响自己的“前途”，怯懦的没有主动前去。虽然可以用“当时环境”作遁词，却实在是再一次对不住死者了。

我真诚地为当年所做的一切忏悔!把上面的话说出来后，心里好受了一点。■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宫市模型：重读《卖炭翁》

○ 吴 思

一、宫市与官市

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一句小序，二十句诗，铺陈渲染，核心内容就是一句话：两个宦官，“手把文书口称敕”，用“半匹红纱一丈绫”，买了卖炭翁一车千余斤木炭。

读者都能感到交易不公平，但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我最近关注市场类型问题，对此诗四个字的小序“苦宫市也”所说的“宫市”发生兴趣，便做了一些追究。

《卖炭翁》大概作于唐元和四年（809）。唐代以钱和绢为货币，宦官拿丝织品买东西很正常，问题在于给多给少。

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天宝年间（742～756），中等质量的木炭每斤约 1.5 文钱[注1]，中等质量的绢价每匹 460 文[注2]。按这种比价估算，千斤木炭价值 3.3 匹绢[注3]，而宦官只给半匹红纱一丈绫，折绢 1.5 匹[注4]，打了 4.5 折。这等差距，近似上世纪 70 年代粮食的市场价与统购价[注5]。

韩愈记载了宦官“抑买”百姓货物的历史。他说，宫市后期，“率用百钱物，置人直数千钱物”（《韩昌黎集》，外集卷柒，顺宗实录贰），竟打到一折以下，偏离正常市场的程度超过 90%。韩愈还说，带着货物进市场，甚至有空手而归的，“名为宫市，而实夺之”。

掠夺不稀罕，市场也不稀罕。名为市场而实夺之，这个市场，在理论上很稀罕。我的理论困惑是：宫市属于哪种市场？

在当代经济学中，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可以自由进出，买卖双方人数众多，每个人对价格的影响都微乎其微。这是理想中的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根据垄断者的多少，依次分为垄断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或多或少有垄断可吃。不过，市场毕竟是市场，双方可以讨价还价。即使碰上口无二价的独家垄断者，也可以退出交易，选择自由总是有的。

可是，卖炭翁既没有退出自由，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更准确地说，卖炭翁本来有自由，但被“手把文书口称敕”宦官剥夺了。文书，公文也。敕，皇帝诏令也。官家有权立法发文，扩大或压缩自由，小民不敢抗命。问题在于，纯种市场的交换手段唯有货币，如果加入权力手段，将交易者分作君臣官民，官家挟权入市，市场便有了官场味道。含有官场成分的市场，借用古汉语的词汇，可称之为官市。

恰巧，《卖炭翁》小序中的“宫市”二字，在白居易集的宋绍兴本和明万历的马元调本，以及清康熙扬州《全唐诗》本中，皆误为“官市”（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这是启发人的妙误。官市的范围大于宫市，也更具普遍性。这个词汉朝就有，指官方设立的市场。官方设立市场，自然有权规定谁能进谁不能进，什么货物能进什么货物不能进，由此可以衍生出盐铁专营、榷酒榷茶或特许经营之类环绕着强制性权力的市场。作为官市的特殊形态，宫市更进一步：强制性权力直接入市，像货币一样成为交换手段。

总之，宫市是官市的一种，是杂种市场，不是纯种市场。

无论宫市还是官市，都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描述权力关系的政治经济概念。唐代长安城南有东西两市，卖炭翁将车停在市南门外，就像今天拉白菜的牛车停在农贸市场入口附近一样，我们看到的只是寻常市场。此时宫使挟皇权降临，于是宫市降临。“宫市”二字，可读作主谓结构，意为

宫廷采购；也可读作专有名词，意为有皇权加入的市场。“官市”二字也可如此解读。官家的强制性权力加入市场，并在交易中获得价值，官市便出现了。强制性权力在交易中抵价 50%，便有五分成色的官市。抵价 90%，便有九分成色的官市。更确切地说，九分成色的官市，由九分官权和一分市场构成，其市场性的纯度很低。

二、宫市里的供求均衡

权力可以抵价了，新的成本收益计算就开始了，宫市的市场均衡问题随之出现。

韩愈描述了买方的演变。他说，旧时宫中买外边的东西，由官员主办，按市价随即付款。贞元末年（797 年前后），以宦官为使，“抑买”人家的货物，稍低于市价。末年不再行文书，安排市场采办人员（时称白望）数十百人，在东西两市和重要的热闹街坊，查看人家所卖的货物。只消宣称宫中采购，便要敛手付与，真假不复可辨，无人敢问其来头。至于价格高低，常以百钱，购买人家价值数千钱的货物，还要人家送门包并付运费。接下来，韩愈讲述了小民带着货物进市场，闹得空手而归，导致暴力抗争的故事。（《韩昌黎集》，外集卷柒，顺宗实录贰）

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三种趋势：一、弄权越来越简便。开头还要有文件，后来只需口头宣称。二、买方的人越来越多。从宦官集团扩展到市井无赖，还有冒充的。三、“抑买”的程度越来越重。

这种趋势很好理解。

以卖炭翁的故事为例。宦官“手把文书口称敕”，摆开架势一念，就可以少花一半钱，那么，弄这么一份文书用多少钱？如果像今天在办公室开一张介绍信那样简单，介绍信就会满天飞。如果开介绍信的手续严格，不妨拿烟酒甚至货币去换，用现在的话说，这叫买卖批文。如果把管印章的伙计拉入伙，合作分成，更是大好的无本生意。再进一步说，如果卖炭翁不认字，用旧文书冒充如何？干脆连旧文书也不拿，直接“口称敕”又如何？只要弄权有便宜可赚，吃权力饭的必定增加，而且吃法越来越丰富。

同时，对权势的代理人来说，弄权总是比较便宜的。有权不用白不用，便宜归自己，亏损归卖炭翁和社会秩序。卖炭翁蚁民罢了，不值一提。社会的长治久安由皇帝负责，皇帝都不在乎，难道让太监替子孙后代操心吗？

宦官掌握宫市大权后，权力管理日益宽松，加入买方集团的人越来越多。加入之后，在权力不受限制的条件下，他们必定努力压价，抑买的程度便越来越重。

卖方如何应对呢？

《新唐书·食货志二》描述了店铺老板的反应：“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

来不及关门躲避呢？白居易描述了卖炭翁的可怜样，这是“被宫市”的常规状态，官市的成色约为五六分。

韩愈描述了一位农夫对更高成色的官市的反应：农夫赶驴驮柴进城卖，被“宫市”了，宦官只给绢数尺，又让他送货进宫，还跟他要门包。汉子不肯送，说我有父母妻子，靠这个吃饭。现在我把柴白送你，不要钱回家，你还不干，我死了算了！说罢痛殴宦官。（《韩昌黎集》，外集卷柒，顺宗实录贰）

看来，官市成色越高，供求均衡越难维持。买方便宜太大，加入者越来越多；卖方吃亏太大，逃避者越来越众。发展下去，市场或者解体，或者变成战场。在这两条路之间，也可能有第三条道路，例如，限制官市的成色和范围，让倒霉者经常轮换，如同偶然遭遇抢劫。或者在市场上额外征一笔税，让全体商贩分摊抢劫损失。

却说卖柴汉子打了宦官，被街吏逮捕，报告了皇帝。德宗下令，开除肇事宦官，赐农夫绢十匹，但不肯废除宫市。德宗既保留宫市，又限制宫市成色，似乎在探索第三条道路。

三、关于宫市的政治均势

宫市虽小，背后却有两大支持者。一是皇帝，二是宦官集团。

德宗受过穷，特别在意钱财，宫市可以节省皇家开支。

宦官集团控制着信息和决策的收发通道，还掌握了禁军，权势极大，宫市便于宦官集团渔利。

不过，宫市损害了生产者和小商贩的利益，影响商品生产和流通，不利于长治久安。一般官员也不能分享宫市的好处，他们不支持宫市。

韩愈记载了皇储的一段事。当时顺宗还是皇太子，在东宫读书。有一次与众侍读和王叔文论政，谈到了宫市。太子说，寡人准备对皇帝极言此事。众人纷纷称赞，唯独王叔文不说话。众退，太子让王叔文留下，问道，为什么刚才唯独您不说话？有什么想法吗？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就是侍膳问安，不宜谈论外事。陛下（德宗）在位的时间长久，如果怀疑太子收买人心，您何以自解？太子大惊道：如果不是先生，寡人哪里能知道这一点。（《韩昌黎集》，外集卷柒，顺宗实录贰）

陈寅恪评论说："当日皇位之继承，决于内廷之阉竖，而宫市之弊害则由宦官所造成。顺宗在东宫时，所以不宜极论宫市者，亦在于此，不仅以其有收人心之嫌也。"（《元白诗笺证稿》）陈先生评论精当。招惹不起宦官，就招惹不起宫市，更何况还要顾及上意。

皇储不敢说话，肩负言论之责的谏官和御史们必须说话。谏官御史多次上疏批评宫市，皇帝却不肯听。有一次，监察御史韩愈上疏极论宫市之弊，激怒了皇帝，将他贬为阳山令。可见，想推翻宫市，言官的力量不够。

就在有关部门"附媚中官"，无人敢争的时候，京兆尹吴凑向皇帝提出了替代方案。吴凑是章敬皇后的弟弟，为人强力勤俭。作为首都最高长官，宫市就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市民的怨愤也不能不考虑。吴凑对皇帝说："小人因宫市为奸，真伪难辨。"（《新唐书·食货志二》）他建议，宫中需要的东西，责成臣办理就行了。如果不想让外臣与闻宫中事，最好挑选年高谨信的宦官为宫市令，公平交易，以免闹得纷纷扬扬。（《新唐书·列传第八十四·吴凑》）

吴凑的建议隐含三层策略。第一、包揽并保障了皇家利益，皇帝容易接受。第二、虽然取消宫市对宦官不利，但在名义上，吴凑并没有直接反对宦官的利益，只反对"真伪难辨的小人"，宦官难于反驳。第三、如果宫市无法取消，至少要找一个办事慎重的宦官负责，限制权力入市的深度。听了吴凑的建议，皇帝"颇顺可"。

另一位极有权势的人，节度使张建封，韩愈原来的上司，朝觐时也说了宫市的坏话。"德宗颇深嘉纳"。（《旧唐书·张建封传》）

德宗在位26年，钱穆对他的评语是："志大才小，心褊意忌，姑息藩镇，聚敛货财，委任宦官"（《国史大纲》）。前两条是皇帝的性格问题，姑且不论。后三条涉及三个利益主体。其一，宦官集团，支持宫市；其二，藩镇中的一位，反对宫市；其三，皇帝自家，既可以通过宫市敛财，也可以委托京兆尹办理，态度应在两可之间。宫市存废，有利有弊，就看德宗的个人偏向了。恰好户部侍郎（近似财政部副部长）苏弁入奏，德宗问到废除宫市的事。苏弁"希宦者之旨"，回答说，京师游手之徒成千上万，没有生业，靠宫市生活，废除之后怎么办？德宗听到这个答复，很喜欢，完全相信，从此再不听人谈宫市。（《新唐书·食货志二》，《旧唐书·张建封传》）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死，顺宗李诵即位。二月，罢宫市。

四、更广阔背景上的均衡

关于宫市存废的决定，大体形成于宫廷政治的范围之内，由最高权力权衡拍板，体现了朝廷上各派利益的博弈。那么，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京师受害民众呢？

民众也有可能直接发出声音，影响决策。

德宗建中三年（782），朝廷平叛军费不足，皇帝下诏向富商借钱。资产万贯以上的部分一概借走。这近似强行摊派战争公债。不够数，又查封商人粮窖和当铺钱柜，只要有钱帛粟麦，强借四分之一，"百姓为之罢市"（《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七），成千上万的市民拦住宰相哭诉。京兆少尹（近似管治安的副市长）韦桢督办此事，事情闹大了，韦桢害怕，向上级请示，钱不及百缗、粮不及五十斛者免。

由此看来，经民众一闹，权力在借贷市场的抵值可能降低。

官方大概是这样权衡的：藩镇叛乱，若用半年时间平叛，需要军费500万缗。强行向富商借钱，得罪一两千富商，可解决数年财政困难。没想到估算有误，闹到逼人上吊的程度，只搞到88万。于是扩大打击面，查封粮窖钱柜，闹到万人罢市和拦路哭诉的程度，又得110多万，总计200万（《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七）。强权大举入市，得到了这笔短期收益，即70多天的平叛军费，同时，

也造成了新的动乱，激发了更多民众的反叛意图，还损害了税基。利弊孰轻孰重？半年内得失如何？十年二十年的得失又如何？这是不同时段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权衡。如果得不偿失，便调整政策。办法之一，就是缩小打击面，放过小商小贩。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枪打出头鸟，提高闹事的组织成本。至少要把政策调整到短期收益大于短期损失的水平。

闹事是需要组织的。卖炭翁式的受害者，在时间空间中零散分布，难以自发地聚集成一股有影响的力量。在帝国体制内，民意影响决策的合法途径不多，韩愈和白居易之类的好官虽然可能成为民意代表，但能不能碰上好官，好官说话管不管用，都要碰运气。运气不好，又缺乏组织，就需要突发事件提供闹事机会。如果连机会都没有，只好静待政治均势发生变化。

建中四年（783）六月，朝廷又将市场交易税从2%提高到5%（算除陌），同时征收房产税（税间架），再次闹得民怨沸腾。十月，五千泾原士兵路过京师上前线，本指望得到点赏赐，结果只给一顿粗食。泾源军鼓噪起来，涌向皇宫抢劫。入城时，百姓惊吓逃走，叛兵大呼：你们别怕，不夺你们商货僦质（当铺抵押物）啦！不收你们房产税交易税啦！于是万民围观，德宗仓皇出逃。

皇帝逃至奉天，与叛军拥戴称帝的朱佖开战，随即反省政策得失，下罪己诏，宣布取消间架税、除陌钱和其他杂税。

由此看来，民众要影响决策，除了闹事，还可以指望需要争取民心的政治竞争格局。一般说来，适合闹事的条件或政治竞争格局很少出现。没有这些条件，只要权力愿意，市场和整个经济领域就难以抵抗其入侵。

仍以宫市为例。

宋朝鉴唐朝宫市之弊，建立杂买务，负责采办宫中所需货物，由京官和宦官共同主持。景佑中（1036左右）明令，所有货物，必须按实际价值付款，然后方可入宫。十四五年之后，宫内买小民的东西，又有“累岁不偿钱”的。宋仁宗说，现在扰民太甚。于是重申景佑之令。过了六七年，仁宗再次下诏，宫内拿金帛到杂买场购物，金帛估值，必须在三司判官的监视下“平估”，不得“抑配”小民。（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由此看来，以强凌弱，抑买抑配，近乎自然趋势。

除了宫市之外，官家依仗强权向商贩和民间购物，还有许多花样和说法，诸如科买、科率、和买、和籴等等。（金）李节诗曰：“棒头打出和籴米，丁口签来自愿军”，描绘了所谓平价购粮（和籴）的真相。

那么，迫使权力退出市场，让纯种市场诞生发展并长期维持，需要哪些充分必要条件？在中国历史中，我不知道能否找到正面答案。但我知道，现代汉语所谓的市场和经济，是日本人对英文 market 和 economy 的译名，引入中国不过110余年。在古汉语里，市场只有买卖场所之义，经济只有经世济民之义。市场和经济相对政治权力而言的独立性，以及支撑这种独立性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是历史演进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在17世纪的英国，国王、贵族和平民三方制衡，王在法下，人身和财产权利才有了高于王权的地位。

注释：

注1　据吐鲁番大谷文书3046号记载：白柽炭壹斤　上直钱叁文　次贰文（下缺），赤柽炭壹斤　上直钱壹文伍分　次壹文　（下缺）。转引自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本文取两种木炭的中等价格的平均数，即每斤炭一文五分。

注2　据吐鲁番大谷文书3097号记载：生绢壹匹　上直钱肆佰柒拾文　次肆佰陆拾文　下肆佰伍拾文。出处同上。

注3　《卖炭翁》成诗年代的绢价比天宝年间高70%以上，地点也不同，本文假定比价关系一样。

注4　唐法规定，一匹绢长四丈，宽一尺八寸。本文出现的三种纺织品的定义是：绢，平纹的生丝织物。纱，绢之轻细者。绫，薄而细且纹如冰凌的丝织物。纱的价格大体相当于绢价，绫价则数倍于绢价。本文假定一丈绫的价格等于一匹绢。

注5　“70年代中期是粮食统购价与市场价差别最大的时期，当时市价一般为统购价的2-3倍。”见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75页。■

（责任编辑　洪振快）

读《牛汉自述》

○ 管士光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是一本很好读的书,它平易、亲切、生动,一如牛汉老人给人的印象,读罢此书,掩卷长思,不意竟有许多细节跳出我的脑海,心中自忖:说这本书好读、生动,也许细节真实而丰富是其重要原因吧?于是,放弃最初的构思,索性从几个细节入手记下我的一点感想。

细节之一

“1949 年 9 月 22 日,组织上让我带二三十个青年学生打扫天安门城楼”。“拐角有绞死李大钊的绞架,我们对前辈革命领袖肃然起敬,情不自禁地带领学生们默哀了三分钟。”

牛汉先生与许多当代知名诗人一样,也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者,他一生追求光明,参加过同盟会,想去延安而不成,先后两次入党,高中毕业时因为要集体入国民党而逃离天水,后参加学运被打伤右额和胸膛,脑内淤血,被押往国民党汉中陕西第二监狱,在狱中坚持写诗,出狱后仍投身革命工作,多次险遭杀害……这样一个一心投身革命的青年,对革命先驱李大钊当然是充满了崇敬,牛汉先生成为一个著名诗人,写出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这是他一生追求光明,反对人间的不平等的必然结果;他亲身投入革命斗争,他知道胜利取得的艰辛,因此他对革命前辈充满了怀念和敬意,他的感情是那么真挚,那么深沉。

由这个细节我想到两点:其一,牛汉先生很早便投身革命,他为了革命事业真是不怕献出生命,如果不是对诗的执著,他完全可能走另一条“官途”,事实上,他是有很好的机会的,那样,也许官场会多一位官员,而诗坛却会失去一位杰出的诗人。哪一种道路更有意义呢?一定是人言言殊,各有选择,牛汉先生选择了写作并一生矢志不渝,我看这对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

其二,牛汉先生参加革命和从事写作看似两途,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都是为了追求光明,一用行动而一用语言,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他一生才不停地跋涉,不停地前行,不管遇到多么大的挫折,他总是乐观面对,永远不停下前行的脚步,即使已八十多岁的高龄,“仍在苦苦跋涉”。牛汉先生曾说:“雪峰最看重、最欣赏‘诗人’这个称号,他曾经说‘诗人’、‘诗人’,‘诗’和‘人’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开的。雪峰自己,确实无愧于‘诗人’这个称号。”同样,牛汉先生也无愧于“诗人”的称号。今天,诗人,为人为诗,还有没有那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呢?王培元先生《牛汉:“汗血诗人”》说:“牛汉的诗歌创作生涯,与他参加革命的历程几乎同时起步。1938 年,他秘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三人小组’。三年之后,就迎来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写下了《鄂尔多斯草原》、《九月的歌弦》、《走向山野》等诗……1946 年因参加学运被捕,在狱中创作了《在狱中》、《我控诉上帝》、《我憎恶的声音》等诗。”的确,革命与诗在牛汉身上是不可分的。

但是命运有时会弄些小把戏,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一个革命者,在 1955 年 5 月 14 日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的要犯,第一个被拘捕。几年前还是一个带年轻人进入天安门城楼的革命者,

几年后却成了“反革命”，历史真是滑稽，他是怎样成为反革命的？王培元先生写道：

1952年，牛汉在沈阳东北空军直属部队文化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时，曾于2月3日给胡风写过一封信，其中说过：“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重人的，人还是污损人的。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劳动。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气愤得很。”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不容辩驳地认为，这“即是说，要有几十年时间，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一下子就把青年时代便参加了共产党、舍生忘死地投身革命、坐过国民党监狱的牛汉，推到了“蒋介石王朝”一边，莫须有地诬陷他是“国民党特务”。

1957年8月被开除党籍。在会上，他大声说了七个字：“牺牲个人完成党”。这是多么无奈而痛苦！

细节之二

“1951年我在部队给艾青写了封信，告诉他我不喜欢他建国后的一些诗，说他在苏联写的诗不是真正的诗。”“1952年探亲回来去看望他（东总布胡同）。说起这件事，他说：你的信写得很率真，我一直在学习呢。一边说，一边打开抽屉，果然有这封信，搁置在一堆信的最上面。”“我曾对艾青这么说：你一生的诗，大头小尾空着肚子。‘大头’，指去延安之前写的诗。‘小尾’，指‘四人帮’垮台之后写的诗。中间几十年没有真正的好诗。他点头承认，直叹气”。艾青比牛汉大十三岁，与牛汉先生有一种介于师友之间的感情，牛汉对艾青非常尊重，他很早就读艾青的诗，比如《北方》等等。第一次见他，牛汉15岁，艾青是他的绘画老师。有一段时间，他“在报刊上专找艾青和田间的诗看”，他后来到华北大学学习，艾青是文学院副院长，正是这样一位前辈，牛汉能直言不讳地提出他的诗的不足而艾青又能认真听取，真是令人很羡慕的一种“诗友”关系。由这个细节，我又想到其他几个与艾青有关的细节，其一，牛汉先生在华北大学学习时，写了几首小诗，请艾青指教，艾青善意地说：“不要再让别人看了”，话说得很婉转，牛汉先生是明白他的意思的，可见对诗的评价他们是从来不隐晦自己的看法的；其二，1957年8月的一天，牛汉参加冯雪峰的批判会，艾青见了他关切地问：“你的事情完了吗？”当牛汉回答：“算告一段落了”后，艾青“竟然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很大很亮……几乎是用控诉的声音，大声说：‘你的问题告一段落，我的问题开始了！’”此时此刻，似乎可以听到艾青那悲壮的声音，令人感叹；其三，1976年，牛汉先生与艾青相遇于一个副食店，二人都惊叹二十年后对方竟然还活着，二人“当即拥抱”，艾青还在牛汉脸颊上亲了一下，他们顾不上再买东西，热烈地聊了起来。1993年的一天，牛汉去看艾青，当时艾青已不十分清醒，在向艾青告别时，牛汉先生“情不自禁地走到艾青身边，对他说：‘我得回报你一个吻。’他点点头，他显然没有忘记十几年前，我和他在西单副食店的那次重逢。我就在他脸颊上‘叭’地亲了一嘴。”关于艾青的细节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仅此几例便可看出诗人之间的真性情，令人感动。近来我常想，一个人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许多东西都如过眼烟云，但友人之间的真情却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当我们在最后回望走来的路，又有什么比这种真情更珍贵的呢？孔子论及朋友曾说：“友直、友谅、友多闻。”就艾青与牛汉之间的友谊说来，似可当之。

细节之三

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总编辑，是我们尊重的前辈，他与牛汉有特殊的交往，书中有专节“我和雪峰共用一张办公桌”，其中一个细节令我深思，有一次牛汉问冯雪峰：“听说你自杀过，有这回事吗？”在牛汉的追问下，冯雪峰谈了想自杀的原因：

“反右”后期，有一天，荃麟来找我，向我透露了中央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激动得流出了眼泪。我不愿离开党。荃麟对我说，“中央希望你跟党保持一致”。并向我提了一个忠告：“你要想留在党内，必须有所表现，具体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引起的问题，你应当出来澄清，承担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当时有宗派

情绪，是在鲁迅重病和不了解情况之下，你为鲁迅起草了答徐懋庸的信。”我对荃麟说：“这个问题有人早已向我质问过，我都严词拒绝，我绝不能背离历史事实。”我痛苦地考虑了好几天才答复。我意识到这中间的复杂性。荃麟是我多年的朋友，过去多次帮助我渡过难关，这次又在危难中指出了一条活路。上面选定荃麟来规劝我是很用了番心机的，他们晓得我与荃麟之间的交情，换了别人行不通，他们摸透了我的执拗脾气。当时我的右派性质已经确定无疑，党籍肯定开除。面对这个天大的难题，我真正地作难了。我深知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但也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迟早会弄明白的。但是这个曲折而严酷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我对荃麟诚恳地谈了我内心的痛苦。荃麟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了。但我知道荃麟传达的是周扬等人的话，实际上是对我进行威胁。荃麟不过是个传话的人，他做不了主。我清楚，荃麟说的中央或上边，毫无疑问是周扬。在万般无奈之下，最后我同意照办。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违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着，胃痛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有关注释。我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最后只有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我的几个孩子还小，需要我照顾。妻子没有独自为生的条件，再痛苦也该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来：历史会为我澄清一切。

1958 年的牛汉，摄于北京复外铁道部第二住宅区宿舍前，其时牛汉由拘留地释放回家不久

雪峰感到被误解的痛苦，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雪峰这一次迫于压力的结果为他一生留下了屈辱的记录，不断受到后人的责难，比如在 1980 年开会时，还有人提出问题：“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辱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如果当时冯雪峰在场，他又该说些什么呢？

被欺骗而被误解，甚至有人恶意的诋毁，这是雪峰心中难言的隐痛，他的泪水又会是什么滋味呢？被误解，特别是被自己信任和尊敬的人误解是十分痛苦的，而人生似乎总是缺不了这一课。

写到这里，我想起历来与冯雪峰之间有误解的周扬，他自有其得意之时，但也有被人误解之时，他晚年曾经说过，他有三次被自己信任和尊敬的人误解的经历。顾骧《晚年周扬》中说：“周扬同志很快进了北京医院，经诊断患脑软化症。我看到北京医院的诊断报告称：此病无法治愈，只能维持、减缓病情的发展，心情十分沉重，我简直难以相信，这突然而至的噩耗。周扬同志对他自己常常做一些精辟的概括性评价，不久前他对他女儿周密说，他一辈子先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为自己信任的人、尊敬的人所误解。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自己信任的人怀疑，被自己尊敬的人打击。现在他已经精疲力竭了。这第三次打击更加难以承受，还不在于以他为靶子的全国范围的批判，更在于他在别人软硬兼施下举措失当，所作的违心‘检讨’而带来未曾料到的影响，他为内心的懊恼、矛盾、痛苦深深地缠绕，心灵受到了重创，郁闷成疾。从此，他再也没有走出医院，直到最后结束生命。”

被人误解而又无以自明，无论是雪峰还是周扬，他们的心里都有难以言说的痛苦，相比较来说，雪峰更有被欺骗的痛苦，其心情可想而知，他

打算自杀也在情理之中。我有时想：误解和诋毁有时是难免的，不如随他去吧，太在意了，反而没有任何意思了。也许，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除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白居易诗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我总相信：时间能澄清一切。说到周扬，《牛汉自述》里有一个细节颇为有趣，也令人深思，不妨抄在这里：“出版社到部里开会，有几次我陪雪峰去参加。周扬来了，雪峰就退席，连大衣都忘了带。散会时周扬故意大声说：牛汉，别忘了把雪峰大衣带回去。”冯雪峰的郁闷，周扬的张狂，虽寥寥数语，却生动绘出，岂不知不论冯雪峰还是周扬，都不过是别人围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岂有别哉！

细节之四

1982 年的一天，牛汉去看望诗人田间，二人正谈着诗，田间好像在深思，然后突然打开门，说“我知道你站在这儿听呢！”原来田间的妻子葛文在门外院子里偷听，怕他们说什么政治话题，引来麻烦。这个细节令牛汉也感到吃惊。

这一细节凸显那个时代的荒唐和可笑。荒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好几年，但人们仍心有余悸，可见其影响之深。我们经过那个时代，祸从口出的例子见了不少，当我们说到“祸从口出”这个词时就会想到许多人和事。从《牛汉自述》里便很容易找到例子：“赵光远妻子公开为刘少奇辩护，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会审后枪毙了！赵妻被枪毙几天之后，一天半夜赵光远从集训的四楼跳楼自杀了。……他是戏剧编辑室的编辑。”而葛文在门外偷听这个细节正体现了妻子对田间的关心和爱护，田间应该感到欣慰，若是像有些家庭那样，妻子听了什么话是为了去告密，那就太可怕了。事实上，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亲人之间互不信任，为了各种目的的实施出卖的事情也并不少见。胡风事件的前后不就说明了告密的可怕吗？近来，我遇到一些事情，于此颇有感触，人心之险恶，有些是出于我的估计和预料的，过去读古诗词，至“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往往不甚了了，现在却有了新的体会，人在社会生活中，“树欲静而风不止”，谁又能在险恶的环境中一点不受影响呢？虽然时代前进了，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偷听”的环境并未根本改变，人们的心态仍然是复杂的，希望这一类情况能逐渐走向绝迹。

读罢《牛汉自述》，使我对一些人物、一些事件有了更加真切和深刻的了解，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使我深有同感：“历史是由无数细节组成的。细节的失真，历史也将混沌一片。”何启治、李晋西二位编撰整理的《牛汉自述》涉及不少大的事件，使我感慨；更记录了许多细节，令我唏嘘。我与牛汉先生工作在一个单位，他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更幸运的是我目前是牛汉先生创办的《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一员，我很喜欢牛汉先生的诗，但我向牛汉先生请益不勤，主要是怕浪费牛汉先生宝贵的时间，在与牛汉先生交往中，也有一些细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妨随手记下两例：

一次，出版社组织了一个冯雪峰纪念会，出席的除许多学者外，还有一二位高官，牛汉先生在别人发言后上台讲话，他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道来，发表了一些别人没有或不可能发表的意见，赢得与会者阵阵掌声，他讲的十分专注，十分动情，甚至连那一二位高官不知为何悄悄离席退场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更没有打断他的发言……

另一次，是 2005 年 5 月的一天，我陪着牛汉先生与几位诗人一起到绵阳的一所中学，参加正在举办的“中学生诗歌节”，在学校领导的力邀下，牛汉先生走到阶梯教室的前边，他稍一沉吟，朗诵了自己的作品《落雪的夜》，吟诵完这首诗，他向学生们介绍起写作背景，由此讲到了自己创作经历和人生历程，动情处，竟老泪纵横，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我的一位同事伏在桌上抽泣起来，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当然，还有许多类似的细节留在我的记忆中，也许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人、许多事都会淡忘，但这一类场面，这一类细节、这一类情感会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和心田……■

（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尼尔斯·卡莱比及其功能社会主义

○ 高 锋

对于瑞典社民党人来说,20 世纪 20 年代确实是个令人困惑的年代:社民党虽然已经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上台执政，但政府地位非常虚弱，不仅无法实现其党纲中规定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目标，甚至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难做到。这使得该党上下感到非常困惑。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党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926 年该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Nils Karleby)著书《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对这些根本问题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观点。曾经担任过 20 多年社民党主席和政府首相的塔盖·艾兰德(Tage Erlander,1901～1970 年)说,卡莱比的著作指出了党的理想与现实政策之间的联系,划清了社民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使人们读后思想上顿时产生“解放了”的感觉。

一、青少年时代

1892 年 6 月 18 日卡莱比生于瑞典南部斯康奈省的一个叫西卡莱比的小村子。他父亲杨松(Jonsson)是个木匠,他本名叫尼尔斯·杨松(Nils Jonsson)。因为他用老家村名作笔名多次发表文章,1917 年正式改名叫尼尔斯·卡莱比。卡莱比受其母亲影响很大,酷爱读书,以致他后来这样讲叙自己的童年,“他已经与图书融为一体,除了母亲和书籍他一无所爱”。

1907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后，在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摩社民党报《劳动报》干了一段时间,后转到《斯康奈省社民党人》报学做排字工。1912 年学徒生活结束后他来到布隆维克人民高等学校。在这个后来成为社民党党校的学校里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曾经担任过政府首相的社民党活动家桑德勒(R. Sandler)这样描述说,“一见面他给我的印象就不错。进一步接触才认识到卡莱比不仅聪明能干,而且有不多见的革命觉悟和研究者素质。”

1913 年卡莱比来到首都斯德哥尔摩当印刷工人，后来在北欧出版艺术公司作编辑部秘书。期间他目睹了工人阶级的低下地位和痛苦生活，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他视理想重于一切,“一旦理想熄灭了，生命也就会暗淡无光,好比盛夏突然变成了冬天”。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首先就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知识、有生活目标的人。为达此目的,他勤奋学习,经常与周围的工人讨论,从他们的经验中吸取营养,不断加深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1916 年 7 月 1 日卡莱比的生活发生了重要转折。他回到故乡,在斯康奈省社民党机关报做编辑,开始了其社会主义鼓动家的职业生涯。当时报纸的主编是社民党全国议员，经常在外活动。因此卡莱比从一开始就有机会为报纸撰写社论和其他重要文章。他的敏捷思路和锐利文笔很快获得同志们的尊重。1917 年他在报社年会上当选为报纸主编。同年瑞典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他又当选其机关报《自由》的主编。

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年轻的卡莱比对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非常崇拜。对于卡莱比来说,马克思的划时代贡献在于他作为社会学家第一个发现了人的作用,任何社会发展都不是脱离人类活动的外界力量作用的结果。他说,人类自己创造了历史,但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下,而是在现存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人类解放将是个逐步进行的过程。

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为工人阶级的实践所证实,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只要这个社会的本质没有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不会过时。但马克思去世后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人们必须发展马克思的思想。他说,其他

国家研究人员发现的理论不一定适于瑞典，毫无批判地照搬他人经验肯定会犯错误。因此他强调，瑞典社民党人必须注意研究本国社会的具体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瑞典实际。

卡莱比指出，瑞典统治阶级在物质生产部门、公共管理和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领导、计划等关键性岗位。对他们来说，按等级决定选举权的大小甚至有无是其统治者逻辑的表现。但工人阶级必须从各方面打破统治阶级的这种垄断，并以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革。他说，社会的观点反映了经济发展程度，普选权是这个国家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的成熟标志。争取民主的斗争实质上要在政治生活中用人性原则取代金钱原则，让活着的人取代没有生命的金钱来做决定，这就是政治民主的实质。右派拒绝普选权实质上就是要逃避这一变革。

1918 年瑞典陷入一次大战后经济危机，工业生产下降了 25%，到处都是失业和饥饿的人群。这时他在报纸上高呼 :现在是在瑞典实现民主的时候了，那些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名拒绝变革的人只会把社会推向大乱。面对声势高涨的工人运动，他欢呼说，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正在我们面前发生，阶级社会正在被粉碎。

这一年战争结束了。在国内外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社民党与自由党联合政府提出的宪法修正案在议会获得通过，实现了普选权改革，随后又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法案。但他当即指出，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困境并没有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变革必须继续。卡莱比在普选权改革案通过仅一个月后即著文指出，当人民可以管理自己时，社会平等和社会民主就成为新的目标。打破所有阶级特权，使人人获得同等机会，这就是社会民主的核心。他强调说，仅仅政治民主是不够的，必须用经济平等作补充。“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做主，那么为什么只搞一半？为什么仅仅可以决定工厂八小时工作而不能决定可以生产多少和什么产品 ?民主要求人民来决定所有关于人民生计的问题。”

在民主要求空前高涨的形势下 1920 年 2 月社民党召开第十一届党代会。由于他对党的卓越贡献，卡莱比作为赫尔辛堡市的代表与党的主要领导人布朗亭（H. Branting）、汉森（P. B. Hansson）和魏格佛斯（E. Wigforss）等一起被选入党代会决议编辑委员会。这是个对大会决议和党的纲领有着关键性影响的五人小组。在这次党代会上卡莱比当选为党中央委员。

大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决不会停止，除非社会得到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剥削被彻底消灭，阶级社会被推翻和群众性贫困得到解决”。所有这一切“只有通过废除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使之处于社会的控制和支配之下……才能实现”。大会还要求政府立即成立委员会就“社会主义化”和“工业民主”等问题进行调查，以探讨实现党的纲领的具体做法。

会后不久，社民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破裂了。在自由党领袖拒绝单独组阁的情况下，社民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决定组织首届社民党政府。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占有多数，社民党提出的地方税改革法案被议会否决。这使党的领导人对是否对国有化问题进行调查犹豫不决。卡莱比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尖锐指出，有些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政府，因此甚至不敢成立社会主义化和工业民主调查委员会，这是在给党的脸上抹黑！

在他的推动下，首届社民党政府成立不久就决定成立“社会主义化委员会”和“工业民主委员会”。桑德勒、默勒（G. M ller）和卡莱比等著名的社民党活动家参加了关系党纲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化”委员会，由桑德勒任主席，卡莱比任书记。政府在给该委员会的书面指示中批评了私有制的弊端，要求该委员会研究对交通、能源和运输等重要行业实行国家和地方管理的可能性，要求委员会就在哪些领域开始社会主义化较为实际，以何种形式较为可行等问题进行调查并向议会和政府提出建议。

三、调查与创造

调查国有化这个工作使卡莱比如鱼得水。他喜欢社会调查。社会主义化是新党纲提出的中心问题，而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也迫切要求社民党提出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经济政策。“目前社民党政策中确实存在着一个空白，这次调查结束后将使它得到填补。”卡莱比满怀信心地说。

他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国有化的调查工作中。1921 年他写出了《丹麦的社会主义化问题》。1923 年他发表了《对奥地利社会主义化的印象》。为了弥补自己知识上的缺陷，1923 年他先后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研究所和斯德哥尔摩大学进修历史、经济历史和国家经济，一年就获得了三个学士学位。同时他还对瑞典铁路国有化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研究。当其他两个社民党调查委员会成员去政府工作后，他独立承担了报告的大部分撰写工作并于 1924 年春向政府提出了调查报告。

报告主张成立一个国有公司对铁路进行管理，其主要管理政策由议会通过立法确定，但公司的领导和管理应完全独立于国家的政治组织和行政机构。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应该与私有企业有相似的简单明了的方针，即一切是为了获得最佳的纯利润"。在此前提下，要让企业拥有完全的决策自由和资本配置自由。只有这样，它才可能获得高效率。这个报告提出了组建国有企业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策建议，但社民党当时忙于其他问题的争论，而将它搁置了。报告提出的国有企业管理方针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社民党进行国有企事业改革时才真正得到重视和执行。

调查委员会书记和《时代》总编辑这两项重要工作，加上疯狂般的进修学习和贫穷的生活等使卡莱比又一次病倒了，他肺结核复发并于 1924 年上半年住进了瑞士达沃斯一家疗养院。尽管他经常卧床不起，但他还在关心党的发展和调查委员会工作。这年秋天，《时代》的另外两个编辑也参加了政府，而把编辑部工作全部交给了病中的他，使得卡莱比刚有好转的病情又产生了反复。1925 年 8 月他意识到身体再也没有痊愈的可能，就决定用其宝贵的生命对党面临的迫切理论问题做出最后的贡献。

四、创建功能社会主义

这年圣诞节他开始动手。自 1918 年担任《时代》杂志编辑以来，他积累了大量材料。他在调查工作中又获得了许多新鲜知识和经验。经过他日以继夜地加工和提炼，一本长达 300 多页的充满马克思主义智慧的文献《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诞生了。而他本人在文稿完成后不久就去世了，从而把全部生命贡献给他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民党的目标是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但什么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它与国有化主张有什么关系？卡莱比对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提出了革命性的创见："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意味着工人阶级应该全面参与社会生活，并在社会决策中拥有与其他阶级同等的权利。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与之相伴随的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取消资本阶级对财产和权力的垄断，就成为工人运动的纲领性要求，或者说武器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这并不是党的目的，而仅仅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在其他条件或情况下适当的工具。社民党人始终是财产和生产国有化的有条件的拥护者。每一个具体措施都要看其是否有利于实现党的目标。社民党人理想的目标是所有人对社会所有的利益的共同参与。这个全面参与由于各种困难和障碍在短时期内可能很难实现。但它为党的活动指出了方向，社民党人的任务是不断向它迈进。

（二）对私人财产不必没收

什么是所有权？卡莱比进而抓住这个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做出了深刻解释。所有权并非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人们"使用或者滥用某个物品的权力"，也就是不管社会需要对自己占有的物品进行支配的绝对权力。马克思把这种权力视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它不是人们生来俱有的，而是国家通过立法对这个物品支配的形式所做出的规定，因此，国家并不需要对之"进行干预"，而是可以随时而且在不断地对其进行调整。

对所有权性质的这种社会主义的定义对社民党人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只要这些变革符合工人阶级的需要，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私人财产和增加社会财产，就意味着所有权关系的重新组合。他说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和事故保险不是别的，恰恰是把使用某些生产资料的决策权从所有者手中转移到其他人手中。实际上所有社会改革，无论是出于工人阶级要求的压力或者是在现代生产发展带来的问题逼迫下进行的，只要在财产使用上造成社会决策的增加和个人影响

的减少，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变革，它们与将来可能进行的变革并无大的差别。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程度而已。

⑶ 工人阶级怎样参与社会变革

什么是国家？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必须对每个国家进行具体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权威主义统治下的国家意味着压迫。而在民主制度领导下的国家则可能是真正的自由。”工人阶级对社会的参与并不与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相挂钩，它可能以许多方式进行：国家对劳动时间和劳动保护的规定，通过税收立法、改革教育制度、工会行动、合作社工作或者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来提高工人阶级在市场上的相对购买力。工人阶级的参与和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并不排除自由价格，也不排除国家和工会组织试图影响价格形成条件的各种努力。

如果一个人想参与对某个物品的支配，他必须购买这个物品的所有权或者部分所有权；而当公众要参与对某个物品的支配时就不同了。他们既可以通过国家购买或者没收它，但也可以通过立法，重新定义对这个物品的所有权。这个立法甚至并不需要直接提及所有权就可以改变它的内容。对国家的精神和物质财产之参与是通过影响其使用的一个综合网而实现的，这不是仅仅靠某一项或几项法律或者政策规定就能做到的。例如城市规划法、卫生保健法、整个社会立法、社会分配方面的税收法等等，这些不是别的，而恰恰是一系列根据社会利益要求对所有权进行的限制性规定，或者说是对这些物品使用的非正式的参与权。

因此，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通过国家或者工会措施所进行的社会变革，以及今后将要进行的改革都意味着是对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私有制绝对权力和自由竞争制度的一种粉碎和新的社会形式的不断的成长。虽然资本主义形式仍然存在，如同在现制度下仍有些封建主义的残余一样，在未来社会主义生产制度取得统治地位情况下，仍然会有过去曾经占据过统治地位的旧东西存在。决定性的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特点的对社会财产使用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个阶级的绝对权力被打破了。

⑷ 企业追求利润是正常的

为了利润而生产就是不道德的？那为什么工人要求最高的工资或者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需要？追求利润本身并不是坏事，利润是不可缺少的，这是与劳动分工和交换相联系的。大家都追求最好结果本身就是对个别人追求的制约。如果没有这种追求，就会形成垄断，不论是涉及这个或那个生产要素，都是这样。要生产和投资就会有风险，即使是高利润在许多情况下也仅仅能弥补开支。这与抽彩相似。问题是个人还是公众承担风险？不能奉行这样的政策，只让个人去承担风险，但不让其得到相应的利润，这样只会导致停滞。

有人认为对利润追求是私人资本主义生产的指导方针，实际上任何生产都不能离开这一经济规律：产品必须由生产带来的利润来支付。不同形式的生产之所以存在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所有者不同，而取决于对它们的活动做出的不同内部规定。在某种情况下谁的利益优先取决于其实际的生产关系。如果排他性的私人利益能够让位于公共利益，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只要对其权力和活动做出正确的限制，私人企业和私人财产也可以为公众提供很好的服务。

卡莱比强调，即使“按公共需要进行的生产”也不能排除自由价格的使用，不能排除社会需要本身产生的对生产资本利润的要求。即使对公共财产，也不能为了满足民众要求而无限制地使用，因为它要受到经济现实——其他形式的社会需要的限制。他指出，社会经济学的价值规律是不能废除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对法律本身打上烙印。

⑸ 工人也在为个人工作

有人说，“工人可以为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而不需要考虑利润”。那么他们对工作和职业选择背后的考虑又是什么呢？没有多少理由可以相信修鞋的或者鞋厂工人为民众做鞋只是为了社会利益和繁荣。他或者他们的兴趣在于可能得到的收入。如果没人支付工资，工人就不会管什么社会需要。所有工薪阶层都是这样。为了社会需要而不是为自己的收入而生产，不管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空话。在这个含义上，所有工薪者都是“为利润而生产”。因此利润追求实际上是经济上非常重要的品质，就像追求一个好的社会

地位一样，这是一般人所共有的思想。

自然，诗人、发明家和其他一些人的英雄壮举并非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这只是人类中的极少数。不能因为这少数人的存在而否定绝大多数民众的正当物质利益。

（六）资本主义是可以和平改造的

“这些问题不能在资本主义秩序框架下得到解决”，人们经常在讨论中听到这类说法。仔细考虑一下这种说法也未必经得起推敲。资本主义秩序框架的本意是说这样一种制度：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唯一决定性的，所有者有着无限的权力并可以随心所欲支配自己的财产，他们不受任何国家和工会的限制，而残酷地剥削工人。在上述情况下这一说法自然是对的。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不能超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或者实际力量和条件达不到，这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在产生它们的根源没有被清除的情况下，它们是不会彻底解决的，那也是对的。但人们应该当心不要过分。

现在工人阶级通过社会立法已经赢得了对私人财产使用的实际共决权，而企业只能在相对有限的空间内实现自己的愿望。工人通过自己的组织还对工作条件争得了实际影响，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更是没有的。通过国家或者工会组织进行的每一个干预实际上都是对财产绝对主权和自由竞争制度——这正是资本主义秩序的重要基石的一个废除。一旦人们不再听天由命，而去自己动手采取适当措施去解决问题，他就在其措施干预所及范围内，突破了资本主义秩序的框架，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实际前提。当然，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不会产生，除非工人阶级能够使自己的观点占据社会统治地位。

（七）和平变革的正确方针

从整个社会的观点看来，在取得生产结果过程中，除了劳动者的牺牲之外，似乎别无其他开支。但这个牺牲包括各种人类劳动。卡莱比分析了生产要素的不同作用后指出，工人劳动并非是产品价值的唯一来源，资本利润和地租虽然不尽合理但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生产中，也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他主张在社会内部，把资本、土地与劳动一样当做独立的生产要素，把它们都当做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主张社民党采取以下方针进行变革：通过立法对所有权进行限制；尽可能地扩大公共部门和其他形式的集体生产，增加公共资本积累；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对地租和资本利润进行再分配；利用社会政策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通过教育和其他措施增加高级职业机会，减少低级工作岗位，以便实现经济平等。

上述政策使工人阶级对生产要素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参与和改革，从而也就改造了整个社会。

他指出，在现代社会里，金钱和选票都是人们施加影响的方式。同等的财力和同等的选票都是人们向往的。平等的选举权虽然并不能给人以同等的影响，但选举权可以成为购买力的补充。通过普选权人们可以赢得进行国家干预的机会，进而影响购买力的分配。

（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不是为党的工作确定某些教条和原则。其唯一任务是正确地认识实际。判断一个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它是否符合实际。严格地说，只有证明正在进行的社会发展是向着社会主义方向的，这个理论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没有第三种可能。对同一问题的所做研究的结果应该相同，不管研究人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或者无政府主义的，结论都应一样。因为客观规律是无法改变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映。它是对现实的分析和反映，它是广泛的实际经验的结果，不是独立于具体实践的东西。对事实的正确观察，加上合乎逻辑的描述，这就是社会主义理论工作。

五、功能社会主义与世界

卡莱比对一个朋友说：“我必须在死神到来之前写成这本书”。他在病中完成的这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所提出的功能社会主义理论，为瑞典社民党由结构社会主义走向功能社会主义提供了依据，使该党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中最彻底、最具革命性的理论转变。这一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年轻一代社民党人，为 1932 年瑞典社

民党提出反危机纲领、赢得大选并开始其长达 44 年的连续执政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功能社会主义的指导下，瑞典社民党在其长期执政期间坚持民主宪政，反对一党专制；在承认劳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劳资谈判和劳动市场规则变革，对私人资本功能进行了改造，使国民收入社会化，劳资分配合理化，在劳资两大阶层之间实现了权力与利益的平衡，从而成功地“驯服”并改造了资本主义，促进了瑞典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和谐发展，维护了瑞典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卡莱比的功能社会主义理论与瑞典和平发展模式也因此传播到世界，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发展。■

（作者为前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

（责任编辑　吴　思）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28.00	6.00
党员、党权与党争	王奇生	48.00	8.00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 20 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国家记忆	章东磐	9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王光美私人相册	罗海岩编著	42.00	7.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写	38.00	7.00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丁三著	32.00	7.00
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张聿温著	32.8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徐　孔	29.80	6.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主编	148.00	12.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张闻天在 1935～1938	张培森主编	17.00	6.00
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张培森著	20.00	6.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抹不去的记忆　老三届新三级	张　琦主编	48.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羡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	39.8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邓　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代购代邮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本书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何方党史笔记的集结，梳理了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澄清了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关键性的历史；第二部分是作者对师友纪念文章的汇集，建国后何方曾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及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文中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是苏联资深外交官顾达寿的回忆录。他曾多次担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等重大会晤的翻译。亲历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风云，向读者展示了中苏高层会晤以及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内幕和轶闻轶事。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 20 世纪：出生在 20 世纪，旁观北伐，见识蒋介石；红色年代里也曾经受过锻炼和改造，作为历史的参加者和见证者，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作为“历史”的个案素材，供读者检视和剖析，同时也反思历史。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使用了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和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全面系统论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

底层的叩问　立足现实的批判，坚持文化的言说，本书以鲜明的立场、尖锐的目光、泼辣的语言和独特的视角，触及当下社会经济与精神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泥人也有土性，小草也会呻吟，来自底层的叩问，来自民间的立场，来自弱势群体的目光，触动读者的心弦，让正义、良知、悲悯、同情……许多美好的词汇，不仅仅成为漂亮的书面语。

古人曰，知屋漏者在宇下。今人说，得民意者得民心。肖复兴的这本书为百姓的民意作了很好的代言。

国家记忆　本书收录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影像，首次独家、清晰、生动地展示了中缅印战场上中国军人和盟军军人的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英雄们和历史真相。本书附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原始影像 DVD 光盘。

北京市内乘车路线：公交车 13 路、21 路、32 路、65 路、68 路在三里河东口站下车，西行 50 米路北，西华饭店院内。

联系电话：010- 68532048，68539058

“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六届（海外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

许嘉璐会长致开幕词

“二十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六届（海外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2月7～9日，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大酒店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俄罗斯、德国、丹麦等国家和地区的15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

本届论坛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国际文化协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新加坡华裔馆、新加坡儒学会、新加坡南洋学会等协办。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文化共生——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交流、会通与发展”。研讨会围绕这一主题，就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多元共处与平等对话、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与世界和谐、中华文化与东南亚的社会发展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论坛会场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致开幕词，指出：中华文化和东南亚文化的交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此次新加坡论坛的举办，对于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推进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特别是新加坡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会通，推进各国人民共同建构和谐世界，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坛预备会议

新加坡炎黄国际文化协会会长林祥雄先生、马来西亚吉兰丹州政府公共行政委员会主席拿督胡山慕沙、香港浸会大学原校长吴清辉等分别致辞，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魏苇先生、文化参赞陈疆先生等出席了开幕式。

东南亚研究院董事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王赓武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西北大学原校长张岂之教授，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原主席、炎黄国际文化协会荣誉会长刘太格先生，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主任梁志明教授等做了大会主题发言。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德润主持了闭幕式，常务副会长张希清做了学术总结，常务副会长曲润海、副会长鲁谆、王震中、谭泽民出席了这次论坛。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11年第2期

江平：我的右派经历与反思

彭德怀和毛泽东对民主的不同看法

胡乔木1956～1957年的“右派言论”

我对不起老师们

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

尼尔斯·卡莱比及其功能社会主义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